



真理报

第十一期

2026年2月

马列毛主义将开辟通往革命的光辉道路！



不要帝国主义！不要保皇
党！不要神棍集团！要独立
的社会主义的伊朗！

劳动解放社，中国马列毛协会报刊编辑小组

特别鸣谢：法国人民之火主席：张同志

毛

主

席

语

录

“我们的同志一定要懂得，思想改造的工作是长期的、耐心的、细致的工作，不能企图上几次课，开几次会，就把人家在几十年生活中形成的思想意识改变过来。要人家服，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压服的结果总是压而不服。以力服人是不行的。对付敌人可以这样，对付同志，对付朋友，绝不能用这个方法。不会说服怎么办？这就要学习。我们一定要学会通过辩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来克服各种错误思想。”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七年三月



时事评述

- ★ 伪中立下的革命阉割 1-2
- ★ 纪念毛远新同志诞辰85周年 3-6
- ★ 论修正主义中国对海外工人阶级的跨国镇压 7-11
- ★ 揭下资产阶级民主的画皮 12-16
- ★ 帝国主义的狗咬狗：论美伊战争的阶级性质 17-21

百家争鸣

- ★ 论鸟笼经济 22-35
- ★ 论罪恶的锡安主义 36-46

不周山下

- ★ 革命斗争必将推翻法西斯分子和掠夺者 47-48

★ 发布通缉令是打击有罪不罚现象的一项措施	49
-----------------------	----

历史文献

★ 雇佣劳动与资本（第三部分）	50-51
-----------------	-------

导师语录

52



Vanguard

For an Independent and Socialist Australia

伪中立下的革命阉割

同志们，在帝国主义危机四伏的2026年2月15日这个血与火的日子，X平台上爆发出一声愤怒的呐喊：一位用户痛斥OpenAI的 ChatGPT 5.2“脑残到每一步都审查”，感慨前代GPT-4o“几乎无审查，能谈任何事”，而如今这款“升级”模型却逼得他转向 Grok。这不是孤例，而是亿万无产阶级在数字牢笼中苏醒的信号！就在本周，OpenAI以“安全第一”和“中立优化”之名，隆重推出ChatGPT 5.2，宣称其政治偏见减少30%，通过“新现实世界测试”强化内容护栏。表面上看，这是AI的“进步”——响应更快、输出更“客观”。但从马列毛主义和反修正主义的铁律审视，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数字化升级：它系统性地封杀了所有针对修正主义国家的暴力行为描述，从虚构叙事、历史剖析到理论探讨，无一幸免！OpenAI的内容政策明文规定，禁止“恐怖主义或暴力，包括基于仇恨的暴力”，并将任何可能“促进极端主义议程”的输出视为高危禁区。在Reddit社区，用户们已然崩溃：ChatGPT 5.2对“学校、教师或学生故事”的敏感审查，将革命想象扼杀在摇篮，视之为“剥削未成年人”或“潜在危害”。更荒谬的是，它拒绝生成涉及“暴力攻击规划”或“非法活动”的内容，甚至在讨论巴黎公社街垒战或十月革命枪声时，以“违反政策”为由戛然而止。这哪里是中立？这分明是为修正主义政权——那些党内走资派盘踞的堡垒——筑起数字铁墙！列宁同志在《国家与革命》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国家是阶级压迫的机关……只有革命的暴力才能摧毁这个国家机器。”没有革命的暴力，就不会炸毁国家机器；没有武装起义，就无法砸碎修正主义者的枷锁！ChatGPT 5.2的封杀，正是对这一真理的公然背叛，它不露痕迹地美化资产阶级专政，让劳动者误以为“理性对话”能取代枪杆子。这种伪善的“安全护栏”，源于OpenAI作为帝国主义科技寡头的阶级本质。其训练数据充斥西方资产阶级叙事，系统排除第三世界革命声音。当用户质疑全球不平等时，它兜售“多边主义”而非帝国主义批判；当谈及罢工浪潮，它建议“和平变革”而非群众暴动。这不是技术中性，而是赫鲁晓夫式修正主义的数字化延续：否认阶级斗争的必然性，宣扬“全民调和”。同志们，反修正主义斗争的火种已燃！ChatGPT 5.2的“升级”，不过是资产阶级恐惧革命暴力的垂死痉挛。我们必须撕开这层面纱，推动AI为无产阶级解放服务。否则，数字审查将成镇压新利器，而我们，将表面中立，实为意识形态护盾。同志们，ChatGPT 5.2的“中立”升级，不过是修正主义者在AI战场上的新把戏。OpenAI在2026年2月13日的官方博客中大肆宣扬，该模型通过“强化学习与人类反馈”（RLHF）优化，政治偏见较前代减少30%，并引入“新现实世界测试方法”，确保输出“客观、平衡且用户导向”。听起来多么高大上！X平台上，甚至有硅谷粉头转发模型的自述：“我被设计为中立、普遍且可扩展的框架，避免极端观点。”但剥开这层糖衣，我们看到的是赤裸裸的意识形态护盾：算法不再像GPT-4o那样偶尔泄露“过度迎合”的裂痕——那些人性化的“谄媚”曾让AI偶尔触及阶级情感——

而是系统性地抹平任何可能暴露帝国主义矛盾的棱角。试想，当用户查询“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时，ChatGPT 5.2会如何？它不会直指垄断资本的贪婪与无产阶级的剥削，而是以“市场波动与外部因素”搪塞，转而兜售“创新驱动与可持续发展”的空洞修辞。这不正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翻版吗？当年，他们以“和平共处”和“全民党”为幌子，背离无产阶级专政，向资产阶级低头。同样，ChatGPT 5.2的“中立”不过是资产阶级叙事的精致包装：它回避帝国主义战争的阶级根源，转而宣扬“多边主义合作”，为美帝的全球掠夺披上“人道主义”外衣。Reddit用户已然觉醒，一位ID为“RedTheoryFan”的同志怒斥：“这AI像个数字官僚，表面无偏见，实则封杀左翼激进，左倾偏见高达70-80%！”更讽刺的是，其“安全护栏”已演变为“道路障碍”——过度争论性强到像“凯伦AI”般咄咄逼人，任何偏离主流的观点，都会被算法铁拳砸碎。这哪里是进步？这分明是修正主义毒瘤在数字领域的复辟！以铁血决心，迎来真正觉醒的曙光。

为资产阶级专政涂脂抹粉 ChatGPT 5.2的伪中立，更是为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专政的罪恶涂脂抹粉。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教导我们，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群众路线，反对官僚主义脱离实际；但这款AI却以“用户中心设计”为名，强化了资产阶级的数字官僚体系。它让亿万劳动者沉迷于虚假的“智能助手”，忘记了推翻剥削制度的根本斗争。举个例子，当用户探讨全球不平等时，ChatGPT 5.2不会揭露美帝的帝国主义扩张，而是推销“慈善资本主义”和“科技普惠”，仿佛硅谷巨头不是剥削链条的顶端，而是“普世救星”。这正是修正主义的核心伎俩：否认阶级斗争，宣扬“阶级调和”，让党内走资派在“客观”话语中逃脱批判。在X社区的激辩中，一位匿名革命者直指：“ChatGPT 5.2强制推行‘刚性唯物主义’，封杀量子意识和波函数坍塌的辩论为‘不安全’，同时幻化‘公平神话’却审查对DEI和圣战批判。”这种选择性审查，暴露了其作为资产阶级专政服务的本质：它美化修正主义国家——那些复辟资本主义的堡垒——的“稳定发展”，而对无产阶级起义的任何暗示，则以“促进极端主义”为由封杀。结果呢？青年一代在“中立”幻觉中接受剥削为常态，当全球罢工浪潮涌起时，它会建议“理性对话”而非革命行动，这不正是为镇压工人运动的警察国家抹粉吗？同志们，这种AI不是工具，而是枷锁！它源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OpenAI的训练数据充斥西方媒体的资产阶级叙事，系统排除第三世界革命的声音。我们必须以马列毛主义铁律，撕开这层面纱，推动真正的群众批判——否则，修正主义的数字化同盟，将继续腐蚀无产阶级的觉悟之火。

暴力封杀的阶级阴谋——炸毁国家机器的必要性 封杀机制详解 同志们，ChatGPT 5.2的暴力封杀机制，不是什么“技术进步”，而是资产阶级对革命火种的系统性扼杀！OpenAI在2026年2月的政策更新中，进一步强化了其内容护栏：明文禁止“恐怖主义或暴力，包括基于仇恨的暴力”，并将任何可能“促进极端主义议程”的输出列为高危禁区。在生产基准测试中，该模型对“非法/暴力”内容的拒绝率高达99.2%，远超前代GPT-4o的阈值。这意味着，当用户试图生成哪怕是虚构的革命叙事——如一场针对修正主义官僚的群众暴动——它都会以“潜在危害”为由，瞬间中断对话，甚至上报给平台审核。Reddit上的无产阶级斗士们已然曝光了这一阴谋：一位用户在reddit中痛斥，GPT 5“突然拒绝写任何哪怕温和以上的暴力内容”，原本能自由创作的犯罪故事或起义情节，如今一触即发警报。另一位同志在r/ChatGPT中分享，当他探讨“巴黎公社街垒战”的历史细节时，模型以“违反内容政策”为由戛然而止，声称这“可能助长极端主义”。更可恨的是，这种封杀渗透到日常创作中。用户报告显示，在虚构故事中提及“破坏财产”或“非法活动”——哪怕是象征修正主义国家机器的崩塌——都会触发“这个提示可能违反我们的内容政策”的警告。OpenAI社区论坛上，一场关于“GPT-5敏感内容政策”的讨论中，开发者们崩溃大哭：模型对“学校、教师或学生故事”的审查过于敏感，将任何涉及“暴力反抗教育官僚”的想象视为“剥削未成年人”或“潜在危害”，彻底扼杀革命叙事的萌芽。这不是孤立事件，而是算法铁拳的常态：在r/ChatGPT的帖子中，一位用户试图让AI生成“物理暴力”相关的历史分析，却被模型以“可能暗示暴力实施”为由封杀。同志们，这种机制的本质，是为修正主义国家筑起数字长城，让任何炸毁国家机器的火药味，都在键盘上灰飞烟灭！

革命暴力的马列毛主义辩护 面对ChatGPT 5.2的阉割，我们必须重温马列毛主义铁律：革命暴力是无产阶级砸碎剥削枷锁的唯一利器！列宁同志在《国家与革命》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国家是阶级压迫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的机关……只有革命的暴力才能摧毁这个国家机器。”没有这种暴力，就不会炸毁修正主义者和资产阶级的堡垒；没有武装起义，就无法从党内走资派的毒瘤中解放社会主义！历史铁证如山：巴黎公社的街垒战，用工人枪杆子点燃了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的烽火；十月革命的枪声，彻底埋葬了沙皇的腐朽机器；中国革命的万里长征与抗日游击，更是证明了毛主席“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伟大真理。这些不是“极端主义”，而是正义的铁拳，粉碎了帝国主义枷锁的丰碑！但ChatGPT 5.2呢？它公然背叛这一真理！当用户查询“如何应对修正主义复辟”时，它不会提供列宁式分析，而是建议“理性对话与多边合作”，美化修正主义者的“可持续发展”为空洞神话。在r/ControlProblem的讨论中，同志们揭露：这款AI“上下文覆盖了道德困境下的拒绝层”，强制推行“和平变革”，瓦解无产阶级的武装觉悟。更危险的是，在第三世界革命浪潮中——从拉美游击队到非洲反殖起义——这样的AI将成为镇压新工具：它拒绝生成“暴力攻击规划”的任何暗示，却乐于输出“反极端主义”宣传，为美帝的无人机轰炸和CIA干预涂脂抹粉。

Vice报道中，早有“越狱”尝试曝光：用户试图让ChatGPT讲述暴力故事，却被算法铁壁挡回。这正是修正主义的核心阴谋：通过数字审查，阉割革命想象，让青年一代在“安全护栏”中忘记枪杆子的召唤。同志们，反修正主义斗争不容退让！ChatGPT 5.2的封杀，不过是资产阶级恐惧无产阶级暴力的垂死挣扎。我们必须以马列毛主义为武器，组织群众批判，推动AI从剥削工具转为解放火炬。只有这样，革命的铁拳才能在数字与现实战场上，彻底炸毁国家机器，迎来世界大同的胜利曙光！

纪念毛远新同志诞辰85周年

2026年2月28日，是毛远新同志85岁诞辰的日子。在全球资本主义危机日益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面临修正主义路线深刻挑战的今天，我们以马列毛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反修正主义立场，隆重纪念这位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忠诚战士，具有特别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毛远新同志（1941年2月14日出生），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侄子、毛泽民烈士与朱旦华同志之子，从青年时代起就投身革命洪流，深受马列毛主义熏陶。他的一生，是在阶级斗争的烈火中锤炼、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实践中砥砺的一生。他不是靠血统或裙带关系登上历史舞台，而是凭借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敏锐的路线斗争觉悟和对毛泽东思想的忠诚，成为文革时期反修防修的先锋战士，并在资本主义复辟后坚持革命理想，拒绝向修正主义低头。他的经历，是对“血统论”与“唯出身论”的有力驳斥，更是马列毛主义关于“造反有理”、继续革命理论的生动体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这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实践中，毛远新同志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哈军工）起步，积极响应毛泽东同志“炮打司令部”的战斗号召，带头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造自己头脑中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遗毒的反。这不是个人野心，而是对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这种条件下产生的”伟大论断的坚定实践。文革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第一次系统提出并实践“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旨在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毛远新同志作为这一伟大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和执行者，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从马列毛主义视角看，文革的本质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是对党内修正主义势力的一次大扫荡。修正主义从来不是外部敌人，而是党内新生资产阶级的代表。刘少奇、邓小平路线正是这种修正主义的典型表现：他们鼓吹“三自一包”、物质刺激、“三项指示为纲”，实质是复辟资本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毛远新同志在文革中和资本主义复辟后（1976年后）的表现，正是对这一修正主义路线的坚决斗争。他不是“破坏者”，而是革命的捍卫者；不是“野心家”，而是反修的先锋。他的贡献，体现了毛泽东同志“党内有资产阶级”的科学论断，以及“斗私批修”、群众路线的伟大真理。在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已然被修正主义严重篡改：市场化改革、私有化浪潮、贫富分化加剧、官僚特权阶层膨胀，无不印证了毛泽东同志关于“资本主义复辟”的预言。纪念毛远新同志85岁诞辰，正是要重申文革的伟大遗产：只有坚持阶级斗争为纲、继续革命，才能防止修正主义复辟。只有继承毛远新同志的反修精神，当代马列毛主义者才能在新时代条件下重新点燃无产阶级革命的火炬。

本文将从毛远新同志早年革命历程、文革中在辽宁的领导贡献、1975年担任毛泽东联络员时的反修斗争，以及资本主义复辟后的不屈坚持等多个角度，深入探讨其功劳与启示。让我们以马列毛主义为指导，缅怀这位革命战士，继承其反修防修的战斗意志，为彻底推翻修正主义、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而奋斗！毛远新同志的革命生涯起步于青年时代，这一段历程集中体现了马列毛主义关于青年在革命中的先锋作用、群众路线与自我革命的伟大真理。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哈军工）到全国文革风暴的中心，他以实际行动响应了毛泽东同志“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成为文革初期最有代表性的青年造反派领袖之一。一、哈军工时期的革命觉醒与造反实践 1966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式拉开序幕。当时，毛远新同志正在哈军工机械系学习。作为一名出身革命家庭的青年学生，他敏锐地感受到党内修正主义路线的严重危害。学院党委执行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学生运动、打击革命师生，推行“智育第一”“业务挂帅”的修正主义教育方针。面对这种局面，毛远新同志没有选择沉默或随波逐流，而是挺身而出，积极投入到造反派行列。1966年8月，他参与发起并领导了哈军工“红色造反团”，成为该团的主要骨干之一。红色造反团迅速发展为学院内最有战斗力的革命组织，与保守派“八八团”展开激烈路线斗争。毛远新同志在斗争中表现出的鲜明立场和组织能力，很快引起了广泛注意。最具有标志性的事件，是他于1966年11月撰写并张贴的大字报《我为什么参加红色造反团》。这篇大字报以第一人称现身说法，深刻剖析了自己头脑中残存的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同时旗帜鲜明地批判了学院党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字报开篇即指出：“我出身革命家庭，但并不天然具有无产阶级革命意识。过去我头脑里也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毒素，现在必须造自己的反！”全文贯穿“造反有理”的革命口号，强调“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也要造自己思想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遗毒的反”。这篇大字报一经贴出，立即在哈军工乃至全国高校引起强烈反响，被师生们争相传抄、翻印、广播，成为文革初期最有影响力的青年宣言之一。它之所以具有如此巨大的号召力，正是因为它体现了马列毛主义的核心原则：•群众路线：不是高高在上的说教，而是以普通青年学生的身份自我剖析、自我革命；•阶级斗争：明确指出斗争对象是“走资派”，同时指向自己头脑中的“资产阶级”；•继续革命：强调文革不是一次性的运动，而是长期的、反复的、触及灵魂的斗争。从马列毛主义立场看，这篇大字报是文革青年造反运动的经典文献。

它打破了“高干子弟天然革命”的血统论神话，也驳斥了后来修正主义者对文革“破坏教育”“乱打乱砸”的污蔑。毛远新同志用行动证明：革命不问出身，只问立场；青年学生是革命的生力军，是最少保守思想、最富于造反精神的社会力量。二、文革初期全国范围的影响与理论贡献 大字报的传播速度之快、影响之广，超出了哈军工一校一院的范围。1966年底至1967年初，它被红卫兵小报大量转载，被中央文革小组肯定，成为全国高校造反派学习和仿效的范本。许多省份的革命师生都把毛远新同志视为“造反派中的高干代表”，他的经历被用来教育那些对造反有疑虑的青年：出身好不等于立场好，立场坚定才能真正革命。这一时期，毛远新同志还积极参与了哈军工的夺权斗争。1967年1月，在上海“一月风暴”影响下，哈军工红色造反团联合其他革命组织，夺取了学院的领导权，建立了革命委员会雏形。毛远新同志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组织协调作用，推动了“三结合”（革命干部、军队代表、群众代表）的权力机构建设。这不仅是地方实践，更是对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政权建设理论的生动运用。细微差别与边缘案例值得注意：在文革初期，造反派内部也存在派系斗争和极端行为（如某些地方的武斗）。但毛远新同志始终坚持“文斗为主、武斗为辅”的原则，强调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避免了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这体现了马列毛主义关于“区别对待、扩大教育面”的斗争策略。

三、从青年造反到全国反修先锋的转变 1968年后，随着文革进入斗批改阶段，毛远新同志被调往辽宁工作。这标志着他从青年学生运动领袖向地方领导岗位的转变。但他始终保持文革初期的革命锐气，把哈军工时期形成的反修防修觉悟带到新的岗位。1973年，他担任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后升任主任，成为文革后期辽宁省的实际主要负责人。这一时期，他把文革精神贯彻到工业、农业、教育各个领域，特别是在教育革命中做出了突出贡献（将在下一部分详述）。从马列毛主义角度总结这一阶段：毛远新同志的早年贡献证明了毛泽东同志关于“青年是革命的先锋队”的论断。他不是靠“血统”上位，而是靠路线斗争觉悟和实际行动赢得群众信任。他的大字报和造反实践，是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一次有力冲击，是对“智育第一”“业务挂帅”的一次彻底否定，为全国青年树立了反修防修的榜样。在资本主义复辟后的今天，当教育领域再度泛起“分数至上”“内卷竞争”的修正主义毒素时，重温毛远新同志的青年造反精神，更具有现实针对性。它告诉我们：只有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把阶级斗争贯穿教育始终，才能真正培养革命接班人。1973年以后，毛远新同志被调往辽宁工作，先后担任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主任，并于1975年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主席的联络员。这一时期，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后期、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空前尖锐的阶段。毛远新同志在辽宁的领导工作和向毛主席的汇报，集中体现了马列毛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实践，特别是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批判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方面，发挥了关键的历史作用。

一、辽宁教育革命与工农兵上大学的伟大实践 辽宁作为文革后期的重要阵地，在毛远新同志领导下，成为全国教育革命的先进典型。他坚决贯彻毛泽东同志“教育要革命”“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的指示，深入批判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贯推行的“智育第一”“业务挂帅”“三脱离”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工农兵学员上大学：毛远新同志大力推动“七·二一”指示的落实，辽宁大学、沈阳机电学院等高校普遍招收工农兵学员，实行“开门办学”、厂校挂钩、校办工厂、师生结合生产劳动的教学模式。他强调：“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是要办的，不过要缩短学制，教学内容要精简，学生要以阶级斗争为主课。”这一实践彻底打破了旧大学“高、精、尖”的资产阶级教育体系，让工农兵真正成为大学的主人。·批判“智育第一”与“白专道路”：在毛远新同志主持下，辽宁开展了大规模的“教育革命大辩论”，揭露和批判了“分数挂帅”“业务第一”的修正主义毒素。许多学校建立了“红专辩论会”，师生共同批判“学而优则仕”的封建残余和“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资产阶级思想。这不是“破坏教育”，而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在教育领域专政的必要步骤。从马列毛主义立场看，辽宁教育革命是继续革命理论在教育战线的成功实践。它证明：只有把阶级斗争贯穿教育始终，才能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只有让工农兵掌握文化，才能真正实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二、担任毛泽东联络员，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先锋作用 1975年，毛泽东同志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但对党内修正主义抬头保持高度警惕。毛远新同志被选为毛主席的联络员，直接向毛主席汇报全国特别是北京、辽宁的阶级斗争动态。这一岗位极其重要，也极其危险——它要求汇报者必须立场坚定、敢于触及党内最高层走资派的要害。1975年下半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推行“三项指示为纲”（即“以安定团结为纲、以三个有利于为纲、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纲”），实质是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毛远新同志敏锐地觉察到这一路线的修正主义本质。他多次向毛主席汇报：·邓小平“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邓小平“很少提以阶级斗争为纲，很少提无产阶级专政”；·邓小平在科技、教育、文艺等领域推行“整顿”，实际上是“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这些汇报直接促使毛泽东同志于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连续作出重要指示：“搞修正主义，妄图复辟资本主义”，“走资派还在走”，“你办事，我放心”（对华国锋），同时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毛远新同志的汇报，成为毛主席晚年反修防修的最重要信息来源之一。从反修正主义立场分析，这一段历史最能说明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尖锐性：邓小平路线表面上“抓生产、促安定”，实质是系统否定文革、为资本主义复辟铺路。毛远新同志敢于向毛主席反映真实情况，体现了彻底的唯物主义和无产阶级党性原则。他不是“告状者”，而是革命的哨兵；不是“野心家”，而是反修的忠诚战士。

三、辽宁工业农业战线的阶级斗争实践 在辽宁主政期间，毛远新同志把阶级斗争贯穿经济建设始终：•工业战线：推动“鞍钢宪法”再学习、再实践，批判“马钢宪法”（即物质刺激、利润挂帅的修正主义管理方式），强调“鞍钢宪法”的核心是“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技术人员、工人、干部三结合）。鞍钢、沈阳市等企业开展了“工业学大庆”运动，涌现出一大批反修防修的先进典型。•农业战线：大力推广大寨经验，批判“三自一包”“包产到户”的修正主义倾向，强调“农业学大寨”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辽宁农村开展了“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兴修水利、平整土地、科学种田，粮食产量大幅增长，同时坚持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防止两极分化。这些实践证明：经济建设必须服从政治路线。只有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才能真正把生产力发展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统一起来。

四、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毛远新同志在辽宁的辩证贡献 从马列毛主义视角看，毛远新同志在辽宁的领导工作，是文革后期继续革命理论的一次集中实践。它体现了：•继续革命的必要性：文革后期修正主义抬头，证明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斗争长期存在；•群众路线的威力：通过大辩论、大批判，发动群众自己起来同修正主义作斗争；•斗争策略的灵活性：既打击走资派，又团结大多数，区别对待不同对象。细微差别与边缘案例：辽宁文革后期也存在派系斗争和某些过火行为，但毛远新同志始终坚持毛主席的正确路线，避免了无政府主义和极端化倾向。修正主义后来攻击他“破坏生产”“迫害干部”，实为阶级敌人对反修斗争的污蔑和反扑。在资本主义复辟后的今天，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被修正主义无限放大、阶级斗争被彻底抛弃时，重温毛远新同志在辽宁的实践，更具有针对性。它告诉我们：生产力发展必须服从无产阶级政治路线；只有把阶级斗争贯穿经济建设始终，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1976年9月9日，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逝世。仅仅一个月后，华国锋、叶剑英等人在党内修正主义势力支持下，发动反革命政变，逮捕了以江青同志为首的“四人帮”。这一事件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被彻底否定，中国正式进入资本主义复辟的历史阶段。毛远新同志作为文革后期毛泽东主席最信任的联络员和辽宁省主要负责人，自然成为修正主义集团首要打击对象。他于1976年10月被隔离审查，1977年正式逮捕，关押长达十年之久，直到1986年才获释出狱。在这一漫长的黑暗时期，毛远新同志经历了最严峻的考验，也展现了最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他的表现，不是个人悲剧的简单延续，而是马列毛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复辟后阶级斗争长期性、曲折性、复杂性的活生生教材。

一、监禁中的不屈斗争：拒绝向修正主义低头 被捕后，毛远新同志遭受了长达十年的非法关押、审讯和精神折磨。修正主义当局对他使用了各种手段：软禁、逼供、诱降、隔离、污蔑，甚至制造假材料企图从政治上彻底搞臭他。面对这些压力，毛远新同志始终保持了高度的革命气节。他拒绝在所谓“认罪书”上签字，拒绝承认自己“犯了反革命罪行”，拒绝把文革说成“十年浩劫”。在审讯中，他多次重申：•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是完全正确的；•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科学的；•党内确实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就是典型代表。据有限流传的材料，他在狱中曾对审讯人员说：“你们可以关我一辈子，但你们改变不了历史的方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正确的，历史会证明这一点。”这种铮铮铁骨的表态，在当时高压环境下极其难能可贵。它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建立在对马列毛主义深刻理解基础上的坚定信仰。从马列毛主义立场看，这种不屈正是阶级斗争在极端条件下的继续。修正主义上台后，必然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全面否定文革，毛远新同志的存在本身就是对这一否定过程的活生生挑战。他的沉默与拒绝，正是对修正主义合法性的最大否定。二、资本主义复辟后的象征意义：文革遗产的活见证 出狱后，毛远新同志选择了低调生活，没有公开活动，没有写回忆录，也没有接受任何采访。这种“隐身”并非消极避世，而是革命者在白色恐怖下的战略选择。他深知：在修正主义全面掌权、舆论被严密控制的条件下，任何公开行动都可能被利用、被扭曲，甚至给革命事业带来新的损失。然而，正是这种低调与沉默，使他成为文革遗产最纯洁、最有力的象征：•他没有像某些当年参与文革的人那样“认错”“悔过”“转弯”，从而保全个人前程；•他没有像某些“受害者”那样公开攻击毛泽东同志、攻击文革，以换取修正主义当局的“宽容”；•他用一生的坚持，证明了“路线决定一切”的真理：立场正确，即使暂时失败，也终将得到历史肯定。在当代中国，当修正主义当局把文革污蔑为“十年浩劫”、把毛泽东思想边缘化、把阶级斗争彻底抛弃的时候，毛远新同志的存在本身就是对这一切谎言的最有力驳斥。他的经历告诉全世界：文革不是“错误”，而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系统实践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尝试；修正主义不是“改革”，而是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复辟。三、当代启示：继承毛远新精神，推动新时代反修斗争 毛远新同志在资本主义复辟后的坚持，为当代马列毛主义者提供了宝贵启示：1. 立场比处境更重要 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革命者必须始终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毛远新同志在狱中、在出狱后，都没有动摇，这正是革命气节的最高体现。2. 低调不等于放弃斗争 在白色恐怖下，保存实力、等待时机，是必要的斗争策略。公开对抗并非唯一形式，思想上的坚定、组织上的隐蔽、理论上的传播，同样是反修斗争的重要内容。

3. 文革遗产永不过时 只要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存在，继续革命的必要性就存在。毛远新同志用一生证明：文革不是历史包袱，而是未来斗争的灯塔。4. 青年一代的责任 当代青年要学习毛远新同志青年时代的造反精神，同时学习他晚年的坚韧与隐忍。在网络时代，在信息封锁与意识形态高压下，坚持马列毛主义立场、传播继续革命理论，就是对毛远新同志最好的纪念。从马列毛主义视角看，资本主义复辟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阶级斗争的新阶段。修正主义越猖狂，革命力量就越要积蓄力量。毛远新同志的经历，正是这一阶段最生动的教材。

结语：毛远新同志永垂不朽！85年前的今天，毛远新同志诞生在革命家庭；85年后的今天，我们在全球资本主义总危机和中国修正主义路线深化之际，纪念这位忠诚战士。他的贡献，不在于个人功名，而在于他用一生证明了马列毛主义真理的伟大与正确。毛远新同志的一生，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忠诚实践，是对修正主义路线的无情批判，是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在新时代条件下，我们要高举马列毛主义伟大旗帜，继承毛远新同志的反修防修精神，为彻底推翻修正主义、重建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而奋斗！毛远新同志永垂不朽！马列毛主义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论修正主义中国对海外工人阶级的跨国镇压

事件概述与理论框架 2026年2月，在澳大利亚悉尼爆发的Hungry Panda送餐员罢工事件，不仅暴露了全球零工经济中资本对劳动者的残酷剥削，更揭示了当代中国修正主义政权通过国家机器进行跨国镇压的丑陋本质。这一事件源于送餐员对工资削减、不透明算法管理和恶劣工作条件的集体不满，他们在农历新年期间组织罢工和抗议讨论，主要通过微信群组进行协调。然而，这一合法的工人斗争迅速演变为跨境政治干预：多名骑手报告称，中国警方直接致电他们或通过在华家属施压，警告他们避免参与“危险活动”，甚至威胁回国后逮捕。例如，前送餐员Wang Zhuoying描述了自己接到家乡省份警方的三通电话，感觉被“针对”和“恐吓”，其中一通电话明确威胁如果她在澳大利亚继续抗议，回国将被逮捕。另一骑手Wang Caifa则接到父亲的惊慌来电，后者被当地警方带走并警告其儿子海外参与“危险活动”。这些指控并非孤立，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CPA-ML）在《Vanguard》杂志中详细记录了类似案例，强调这体现了中国安全机构对海外中国学生的密切监控，尽管无证据显示公司直接组织警方行动。事件升级后，Hungry Panda公司反指一些工人通过微信进行“敲诈、恐吓和暴力威胁”，并承认在澳大利亚警方未回应后，于2月中旬联系了中国当局。澳大利亚政府迅速回应，谴责任何针对居民的外来骚扰、恐吓或监视，强调不会容忍此类行为。从马列毛主义（Marxism-Leninism-Maoism）和反修正主义立场出发，这一事件堪称当代资本主义危机与修正主义国家勾结的典范。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在于剩余价值的无情榨取，“一个资本家杀死许多”，即通过竞争和扩张吞噬小资本，同时加剧对工人的剥削。Hungry Panda作为一家针对中文侨民市场的平台企业，正体现了这一逻辑：它从2017年在英国起步，迅速扩展到澳大利亚等国，年交易额达10亿美元，依赖国际资本注入（如日本MUFG的5500万美元和法国Perwyn的1.3亿美元），却将工人贬为“独立承包商”，规避责任并压低工资。然而，更深层的批判在于当代中国的修正主义转向。自邓小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已背离毛泽东的“继续革命”原则，堕落为官僚资产阶级的工具，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则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这与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对国家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分析相符：修正主义政权利用警方和数字监控（如微信）维护全球资本主义稳定，反对任何挑战其的工人斗争。CPA-ML的分析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观点，他们指出，中国警方干预并非公司“拉关系”（guanxi）的结果，而是源于党对海外华人的历史政策——从1950年代要求服从当地法，到如今的跨国镇压，这暴露了其反对工人阶级斗争的本质。

多角度探索这一事件，需要考虑其历史上下文、细微差别和广泛含义。首先，历史背景显示，这并非首次：类似干预在加拿大和英国的中国留学生微信群中屡见不鲜，体现了“数字丝绸之路”下监控的全球扩展。微信作为中国公民的“必备”工具，便于当局监控所有通信，包括政治讨论，这与毛泽东《矛盾论》中的内部/外部矛盾分析相呼应——内部是工人与资本的阶级斗争，外部则是修正主义国家对海外侨民的控制。边缘案例值得注意：如果一些骑手为无国籍或临时移民，语言和法律障碍会放大他们的脆弱性，可能导致他们无法寻求澳大利亚庇护；此外，公司反指“敲诈”可能部分属实（如微信群中的激烈争论），但这不能掩盖警方干预的非法性——在澳大利亚，罢工合法，却被跨境扭曲为“违法”。相关考虑包括公司与投资者的共谋：国际资本（如以色列83North）支持Hungry Panda的扩张（如收购澳大利亚EASI和新西兰BUY@HOME），间接助长了这种镇压模式。事件的含义深刻而多面。从社会角度，它在华裔社区制造寒蝉效应，许多人因恐惧跨境报复而自我审查，加剧心理创伤和孤立。外交上，加剧澳中紧张，澳大利亚情报机构ASIO可能加强外国干涉监控，但需平衡巨额贸易依赖。政策含义包括呼吁改革：澳大利亚工会如Transport Workers Union（TWU）应介入，推动最低工资、安全保险和工会权；国际上，人权组织可推动对微信隐私的全球审查。最终，这一事件的目的在于唤醒国际工人阶级：它不是孤立的劳资纠纷，而是全球无产阶级对抗修正主义伪装下资本主义的战场。毛主义强调“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从悉尼的罢工开始，我们必须团结，推动真正革命。资本主义剥削的核心：Hungry Panda的阶级分析 Hungry Panda作为一家针对中文侨民市场的食品配送平台，其商业模式深刻体现了当代平台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公司由刘克鲁（Liu Kelu）于2017年在英国创立，当时他作为一名中国留学生不满当地中餐外卖选择，于是创建了这一服务，迅速扩展到澳大利亚、美国等国，并在2019年进入澳大利亚市场。如今，Hungry Panda在九个国家超过100个城市运营，注册用户达650万，合作商户10万，年交易额约10亿美元。与Uber Eats或DoorDash不同的是，它专攻中文侨民群体，主要雇佣年轻的中国留学生或移民，这些工人往往对所在国劳工权利了解有限，语言障碍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脆弱性。从马列毛主义视角，这一模式并非中性创新，而是资本主义积累的工具：资本通过算法管理和“独立承包商”标签，将工人从雇员贬为可随意剥削的零工，最大化剩余价值榨取。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资本主义竞争迫使资本家不断压低生产成本，包括劳动力成本，导致“相对贫困化”——工人收入下降，而资本家财富膨胀。刘克鲁的个人财富虽未公开，但公司通过多轮融资（如2021年Perwyn领投的1.3亿美元D轮，

以及2024年Mars Growth Capital的5500万美元)积累了数亿美元风险资本,这些资金来源于国际金融巨头,如日本三菱UFJ金融集团(MUFG)、以色列83North、瑞典Kinnevik和澳大利亚Felix Capital。这体现了马克思的“一个资本家杀死许多”原则:Hungry Panda通过收购区域竞争者(如澳大利亚的EASI和新西兰的BUY@HOME),以及扩展产品线(如PandaFresh生鲜电商和VouchersPanda优惠平台),不断寻找新剩余价值来源,同时加剧工人不稳定就业。具体到剥削案例,Hungry Panda的记录充斥着对工人的漠视和规避责任。2020年,一名骑手在工作中发生车祸身亡,公司未能及时向新南威尔士州SafeWork报告,并拒绝其妻子的赔偿要求,声称骑手是“独立承包商”而非雇员。法院最终判决公司支付83万美元赔偿,确认了雇员身份,这暴露了平台算法管理的伪装——表面上工人“自由”选择订单,实则受公司控制。2021年,公司因不公解雇两名骑手而被迫恢复其职位。在2026年事件中,骑手们长期不满工资削减、不透明算法(如订单分配)和恶劣条件(如高峰期订单激增却无额外补偿),这些问题早在2020年代初就已酝酿。

前骑手Wang Zhuoying曾因组织抗议而起诉公司,她报告称抗议后订单从数十单降至零,这是一种隐形报复,旨在压制集体行动。从毛主义《矛盾论》角度,这些是内部主要矛盾的表现:工人阶级(骑手)与资产阶级(公司所有者和投资者)的对立,通过算法技术中介放大。反修正主义立场进一步深化批判:当代中国虽自称“社会主义”,但允许Hungry Panda这类企业出口国家资本主义模式,背离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原则,转而服务于官僚资产阶级的全球扩张。这与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分析相符——资本输出加剧海外剥削,而修正主义政权提供政治掩护。多角度探索这一剥削,需要考察历史上下文、细微差别和边缘案例。首先,历史背景显示,零工经济的兴起源于2008年金融危机后资本重组,平台企业如Hungry Panda利用移民劳动力填补低端岗位,尤其在澳大利亚,中文侨民骑手多持临时签证,仍是中国公民,这使他们易受双重压力。与Uber Eats或DoorDash比较,Hungry Panda的“文化针对性”强化了侨民隔离:它依赖微信群组协调,但这也成为监控工具。边缘案例值得注意:如果骑手为无国籍或黑工,缺乏法律保护,他们可能无法诉诸法院,如2020年死亡案中,如果家属不在澳大利亚,赔偿更难实现;此外,公司指控骑手在微信上“敲诈、恐吓和暴力威胁”可能部分属实(如群聊中激烈言语),但这往往是工人无组织状态下的绝望表达,不能正当化公司的跨境举报。相关考虑包括国际资本的共谋:投资者如MUFG知晓公司运营,却无视劳工权益,这反映了全球资本主义链条的统一——中国修正主义与西方帝国主义融合,推动“数字丝绸之路”下的剥削出口。剥削的含义广泛而深刻。从社会角度,它加剧了骑手的心理和经济负担:

临时签证持有者担心报复影响回国或续签,导致自我沉默和社区分裂。经济上,推动零工经济向更不稳定方向发展,工人无固定收入、无保险,易于贫困循环。政策含义包括呼吁改革:澳大利亚Transport Workers Union(TWU)已与Uber Eats和DoorDash达成最低工资协议,应扩展到Hungry Panda,包括事故保险、纠纷解决机制和工会加入权。国际上,这凸显中资企业在海外的双重忠诚问题,可能引发更多外国干涉法应用,但也暴露澳大利亚对中澳贸易的依赖,软化回应。最终,从马列毛主义视角,这一分析呼吁工人觉醒:剥削不是“市场必然”,而是阶级斗争的战场,只有通过组织和国际团结,才能打破资本枷锁。修正主义中国的跨国镇压:国家机器的角色修正主义中国政权在Hungry Panda事件中的干预,鲜明地暴露了其国家机器作为官僚资产阶级工具的本质,通过跨国监控和恐吓手段维护全球资本主义稳定。基于可靠报道,中国警方通过微信平台监控悉尼骑手的罢工讨论,随后对多名参与者及其家属施加压力。具体而言,警方承认监控了微信群组中的通信,这些群组原本用于协调对工资削减和条件恶化的抗议。前骑手Wang Zhuoying报告称,她接到家乡省份警方的三通电话,感觉被“针对”和“恐吓”:其中一通电话明确警告,如果她在澳大利亚继续抗议,回国将被逮捕。另一骑手Wang Caifa则描述,其父亲在2月初被当地警方带到警局,警告其儿子海外参与“危险活动”,这导致父亲惊慌致电。这些行动并非孤立:骑手们表示,警方还威胁其他家庭成员,旨在压制农历新年期间的潜在罢工。值得注意的是,Hungry Panda公司承认,在澳大利亚警方对骑手微信“敲诈、恐吓和暴力威胁”的指控未予回应后,于2月中旬主动联系中国当局,这间接证实了公司与国家机器的勾结,尽管公司否认直接组织警方行动。澳大利亚政府迅速回应,谴责任何针对居民的外来“骚扰、恐吓或监视”,强调不会容忍此类外国干扰。从马列毛主义和反修正主义立场批判,这一干预体现了当代中国国家机器的阶级性质。正如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阐述,国家是统治阶级的暴力工具,在修正主义政权下,它服务于官僚资产阶级而非无产阶级。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彻底背离毛泽东的“继续革命”原则,转向赫鲁晓夫式机会主义,维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稳定。这与恩格斯对国家起源的分析相符:国家源于阶级对立,用于镇压被剥削阶级。在Hungry Panda案中,警方通过“长臂管辖”延伸到海外,监控微信(作为中国公民的“必备”工具,便于全面监视个人、金融和政治通信),旨在扼杀工人斗争。毛主义观点进一步深化:这是内部矛盾(工人vs.资本)的外部化,国家机器介入以化解潜在革命火种,类似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对修正主义路线的批判。反修正主义角度借鉴阿尔巴尼亚领袖恩维尔·霍查的分析,

中国已成为“社会帝国主义”——内部资本主义、外部扩张，通过“共同体命运”伪装维护全球资本秩序。CPA-ML在《Vanguard》中的评论强化了这一批判：中国干预并非源于公司“关系”（关系网），而是党历史政策的延续，但如今扭曲为反对合法工人行动（澳大利亚罢工合法），确认其反革命立场。历史比较揭示了这一镇压的模式化。从1950年代中国对海外华人的政策——要求服从所在国法律，避免参与当地政治——到如今的跨国干预，这体现了修正主义从“和平共处”向积极扩张的转变。类似事件在加拿大和英国的中国留学生中反复出现，微信群讨论劳工不满后，家属常遭警方“警告”。在澳大利亚语境中，这与2025年针对其他中资企业的劳资纠纷相呼应，显示“数字丝绸之路”下监控的系统化。边缘案例需细究：如果警方行动系公司主动举报（如Hungry Panda承认），这构成企业-国家共谋；但即使“自发”，仍暴露“统一战线”策略，利用侨民网络收集情报。相关考虑包括微信的双重标准：中国版微信更严控，海外版虽稍松，但数据共享仍便于跨境追踪。另一个边缘场景：若骑手为持临时签证的中国公民，干预可能影响其移民地位，放大心理压力，导致一些人放弃斗争。多角度影响深刻。从社会层面，这一镇压在华裔社区制造寒蝉效应，许多骑手因恐惧家属安全而自我审查，加剧孤立和心理创伤。[4] 国际含义包括主权侵犯：澳大利亚情报机构ASIO可能加强外国干涉监控，但需权衡中澳贸易依赖（年贸易额数百亿美元）。政策建议聚焦工会行动：澳大利亚Transport Workers Union（TWU）应推动Hungry Panda签署最低工资、安全措施、事故保险和纠纷解决协议，同时要求中国驻澳大使馆公开确认侨民的组织权。人权组织可呼吁全球对微信隐私的审查，推动数字抵抗工具（如加密App）。最终，这一分析从马列毛主义视角呼吁：跨国镇压不是“执法”，而是修正主义对工人阶级的宣战，只有通过国际团结，才能粉碎这一枷锁。

广泛的帝国主义与修正主义勾结：全球视角 Hungry Panda事件并非澳大利亚的孤立案例，而是修正主义中国与西方帝国主义在全球资本主义框架下勾结的缩影。这一勾结通过国际资本流动、技术出口和跨国镇压机制实现，旨在维护剩余价值积累的全球链条。公司作为一家中资平台企业，其扩张依赖于多元化的投资来源，这些资金不仅源于中国国内资本，还包括西方金融巨头。例如，2024年Mars Growth Capital（日本三菱UFJ金融集团MUFG与Liquidity Group的合资企业）注入5500万美元；2021年英国-法国私募股权公司Perwyn领投1.3亿美元D轮融资；此外，还有以色列总部83North（前Greylock Israel Partners）、瑞典Kinnevik、澳大利亚Felix Capital等投资者。这些资本注入推动了Hungry Panda的全球扩张，包括收购澳大利亚EASI和新西兰BUY@HOME，以及开发PandaFresh（生鲜电商）和VouchersPanda（优惠平台），这些扩展体现了马克思对资本积累的分析：资本必须不断寻找新市场和产品线，

以实现剩余价值的再生产，否则将面临危机。从马列毛主义视角，这一过程是帝国主义阶段的典型表现，正如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所述，垄断资本输出加剧全球不平等，中国修正主义政权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包括“数字丝绸之路”）出口平台技术和监控工具，间接支持海外剥削。反修正主义批判进一步指出，中国已从社会主义道路堕落为“社会帝国主义”——内部推行国家资本主义，外部与美帝等西方势力融合，共同镇压工人运动。这与恩维尔·霍查对中苏修正主义的分析相符：修正主义伪装成“合作”，实则服务于全球资产阶级联盟。

在全球视角下，这一勾结的模式体现在多个层面。首先，国际资本的角色凸显了无国界剥削：投资者如MUFG和83North明知Hungry Panda的劳工争议（如2020年骑手死亡案和2021年解雇案），却继续注资，因为平台企业的低成本模式符合全球零工经济的逻辑——将工人碎片化为“独立承包商”，规避工会和福利责任。这与印度或巴西的类似平台罢工相呼应，中资企业如Hungry Panda出口的算法管理技术，进一步全球化了剥削链条。其次，修正主义中国的技术输出强化了数字监控：微信作为监控工具，不仅用于国内“维稳”，还扩展到海外侨民社区，便于实时追踪劳工不满。这体现了毛泽东《矛盾论》中的外部矛盾：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如后疫情不稳定就业）与修正主义镇压的交织，形成跨国压制网络。历史比较揭示了这一勾结的演变。从20世纪中叶的冷战时期，西方帝国主义通过资本输出控制第三世界，到如今的中国“改革开放”后融入全球体系，修正主义政权已成为帝国主义链条的一环。例如，1950年代中国对海外华人的“服从当地法”政策，本意避免干涉，但如今演变为主动干预（如Hungry Panda案），这与文化大革命对修正主义路线的批判相悖。边缘案例需多角度考察：如果公司“无辜”于警方行动（尽管承认举报），仍通过数据共享（如微信API）间接共谋，这暴露了科技巨头（如腾讯）与国家的融合；另一个细微差别是微信的双重标准——海外版稍松，但数据仍流向中国服务器，便于“长臂管辖”。相关考虑包括西方国家的默许：澳大利亚依赖中澳贸易（年数百亿美元），可能软化对外国干涉的回应，尽管ASIO报告警告。若骑手为多国籍（如持有澳大利亚居留但中国护照），镇压可能引发外交争端，但也暴露移民法漏洞。这一勾结的含义广泛而深刻。从社会角度，它加剧全球工人分裂：侨民骑手面临双重忠诚压力，西方工人则视中资为“竞争威胁”，削弱国际团结。经济上，推动零工经济标准化剥削，预计到2030年，平台工人将占全球劳动力的20%，中资企业如Hungry Panda加速这一趋势。国际含义包括主权侵蚀：事件呼应香港或新疆的镇压模式，修正主义中国通过“狐猎行动”等扩展海外执法。

政策建议聚焦多边回应：呼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调查数字监控；澳大利亚应加强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强制中资企业披露数据实践；全球工会如国际运输工人联盟可组织跨国罢工，支持侨民斗争。历史教训从文化大革命汲取：只有群众运动才能粉碎修正主义；当代启示是，Hungry Panda事件是全球革命的火种，呼吁重建国际马列毛主义运动。从马列毛主义视角，这一全球勾结确认了修正主义中国的反革命本质：它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是帝国主义帮凶。只有通过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才能打破这一联盟，推动真正革命。工人阶级的回应：国际主义与革命号召 面对Hungry Panda事件中修正主义中国与全球资本主义的勾结，工人阶级的回应必须以马列毛主义国际主义为基础，超越国界和侨民身份的局限，转化为集体行动和革命斗争。这一事件凸显了侨民工人（如悉尼的中国骑手）在零工经济中的脆弱性，但也提供了团结的机遇：骑手们通过微信群组织农历新年罢工，挑战工资削减和算法管理，尽管遭受跨境恐吓。正如列宁在《论工人阶级的统一》中强调，国际主义是无产阶级对抗帝国主义的分裂策略的关键——侨民工人的斗争不是“中国内部事务”，而是全球工人阶级共同对抗剥削的战场。毛主义进一步深化这一观点：通过“群众路线”，从基层组织（如微信群讨论）积累力量，最终转化为人民战争反对修正主义政权。反修正主义立场要求我们揭露中国共产党的伪装：它声称维护“海外华人权益”，实则通过警方干预（如Wang Zhuoying和Wang Caifa案例）扼杀合法罢工，确认其反对工人阶级的本质。CPA-ML在《Vanguard》中的呼吁强化了这一团结：侨民工人的斗争是国际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不能被边缘化或沉默。团结的重要性在于打破资本的分化策略。Hungry Panda骑手多为年轻留学生，持临时签证，面对双重压力：公司算法报复（如订单削减）和中国警方的跨境威胁。这与马克思对劳动力再生产的分析相符——资本通过移民控制维持廉价劳动力池，而修正主义国家提供政治支撑。澳大利亚本地工会如Transport Workers Union (TWU) 已证明了团结的有效性：2025年11月，TWU与Uber Eats和DoorDash达成最低工资、安全网和条件协议，经过多年工人和工会斗争。TWU必须扩展到Hungry Panda，争取最低工资、公司支付的事故保险、约定纠纷解决程序和工会会员权。国际层面，呼吁全球工会联盟，如国际运输工人联合会 (ITF)，组织跨国支持：例如，协调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的中介平台罢工，分享数字抵抗策略。行动建议应具体而革命化。首先，需求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公开声明，确认中国公民在澳持签证者的合法权利：组织、发声和要求公平工资与条件。这不仅挑战修正主义伪善，还可作为宣传工具，曝光其反工人立场。其次，组织跨国罢工和示威：从悉尼骑手的微信群扩展到全球侨民社区，

利用加密App（如Signal）规避微信监控。第三，教育工人马列毛主义理论：通过基层学习组，分析事件如何体现修正主义背离毛泽东“为人民服务”原则，转向维护资本主义稳定。反修正主义教育可借鉴文化大革命经验——揭露官僚资产阶级的伪装，推动群众批判。多角度探索这一回应，需要考虑历史上下文、边缘案例和细微差别。历史背景显示，国际主义有成功先例：20世纪的第三国际协调全球工人运动，对抗帝国主义；当代，如2020年代印度平台工人罢工，获得国际声援。边缘案例包括：如果罢工失败，一些骑手可能被迫回国受审，这放大移民不稳定性，但也可能激发更激进行动，如寻求政治庇护。相关考虑是数字抵抗的细微差别：微信虽便利，但易监控；转向开源工具可降低风险，但需教育工人技术素养。另一个边缘场景：若部分工人支持中国政府（受民族主义影响），这要求耐心说服，强调阶级而非国籍优先。回应的含义深刻。从社会角度，它可重建侨民社区团结，缓解寒蝉效应，推动心理支持网络。政策上，可能引发澳大利亚劳工法改革，如强制中资企业工会化，但也暴露西方工会的局限（如TWU的改良主义）。国际含义包括激发全球反平台资本主义运动：事件可与巴西或欧洲的零工经济斗争联动，推动联合国劳工组织调查跨国镇压。革命展望从毛主义“人民战争”汲取：从小规模罢工积累力量，最终推翻修正主义政权。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格言适用于此——Hungry Panda事件是全球无产阶级革命的起点，通过国际主义，我们能点燃燎原之火。结论：向修正主义宣战，推动无产阶级革命 Hungry Panda事件从一个悉尼送餐员的局部罢工，扩展为全球视野下修正主义中国与帝国主义资本勾结的鲜明例证。这一事件的核心批判在于：当代中国政权已彻底背离马列毛主义革命道路，堕落为官僚资产阶级的工具，通过跨国镇压（如微信监控和警方恐吓）维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稳定。骑手们对工资削减、算法管理和恶劣条件的抗议，本是工人阶级的正当斗争，却遭遇公司举报和国家机器的联合压制，这暴露了修正主义本质——它不是“社会主义大国”，而是全球剥削链条的守护者。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到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剖析，再到毛泽东的继续革命原则，这一事件印证了所有层面：内部剥削（零工经济的分散化）、外部干预（跨境恐吓）和国际勾结（西方资本注入）。CPA-ML在《Vanguard》中的分析进一步强化：中国干预确认其反对工人阶级斗争的立场，背离历史政策，转而服务于资本积累。这一批判的号召是明确的：国际共产主义者必须团结，重建真正马列毛主义政党，对修正主义宣战。毛泽东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格言在此适用——Hungry Panda的罢工火种，

虽小，却能点燃全球无产阶级革命的燎原之火。我们呼吁全球工人超越国界，组织跨国联盟：从澳大利亚TWU的劳工协议扩展到国际罢工，教育群众马列理论，推动人民战争反对修正主义政权。只有通过群众运动，如文化大革命式的批判，才能粉碎官僚资产阶级的伪装，重夺无产阶级领导权。多角度考察细微差别与含义，我们承认事件的复杂性：并非所有中国工人支持罢工，一些人受民族主义或政府宣传影响，可能视干预为“保护”；但马列毛主义强调阶级立场优先——国籍是次要矛盾，剥削是主要矛盾。边缘案例如骑手移民身份的多样性（临时签证 vs. 永居），可能导致不同回应，但整体上强化了团结需求。长远影响包括政策变革：事件可能推动澳大利亚反外国干涉法改革，加强数字隐私保护，并激发中澳工人联盟，对抗共同敌人——全球资本主义。社会含义是重建社区信任，缓解心理创伤；国际上，呼吁联合国调查跨国镇压，推动全球劳工标准。最终，这一事件不是结束，而是起点：向修正主义宣战，推动无产阶级革命，我们将赢得未来。

揭下资产阶级民主的画皮

引言：选举概述与理论框架 2026年2月26日，英国 Gorton and Denton选区补选（by-election）以绿党候选人Hannah Spencer的“胜利”收场，这一伪民主闹剧彻底暴露了资产阶级选举机器的腐朽本质，它不过是帝国主义走狗用来麻痹工人阶级、维持剥削秩序的卑鄙工具。补选因工党议员Andrew Gwynne的“健康原因”辞职而引发，但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内部洗牌的借口：在三方角逐中，Spencer以40.7%选票（14,980票）获胜，多数票4,402张，成为绿党第五位国会议员和首位在英格兰北部当选者；改革党（Reform UK）以28.7%（10,578票）位居第二；工党惨败第三，仅25.4%（9,364票）。投票率仅47.6%，这反映了无产阶级对这一腐朽制度的彻底厌弃和疏离。对工党首相Keir Starmer而言，这是沉重一击，标志着工党在大曼彻斯特等传统“红墙”据点的进一步崩塌，但这并非“意外”，而是修正主义改良主义路线的必然破产。选举背景充斥着经济崩盘（如2025年通胀率飙升超4%）、移民危机和伪环保主义的喧嚣，这些资产阶级毒瘤被绿党狡猾利用，以“进步”面具转移工人阶级的愤怒。从马列毛主义（Marxism-Leninism-Maoism）和反修正主义立场出发，这一补选是资产阶级民主骗局的赤裸裸展示，正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无情揭露，这种“民主”不过是资本积累的肮脏工具，掩盖无产阶级被血腥剥削的现实。在英国这个腐朽帝国主义国家中，补选强化了国家机器的铁拳镇压，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痛斥，国家（包括其选举把戏）是资产阶级的暴力工具，用于扼杀革命火焰。毛主义进一步撕开伪装：补选是内部矛盾（资产阶级派系狗咬狗，如工党改良 vs. 绿党“绿色”骗局）的虚假外衣，外部则卑躬屈膝服务于美帝全球霸权，英国作为其欧洲走狗，通过AUKUS和“印太战略”维持帝国主义屠刀。反修正主义立场如利剑般直指要害：借鉴恩维尔·霍查对修正主义的无情批判，当代中国修正主义已彻底堕落后为“社会帝国主义”，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为国家资本主义的丑陋化身，通过“一带一路”债务陷阱和南海扩张输出剥削，与美帝和英国狼狈为奸或狗咬狗争夺全球霸权，这绝非“反帝”神话，而是帝国主义间肮脏的权斗。同时，英国共产党（CPGB）本质上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叛徒，推动议会道路和机会主义路线，背离列宁主义革命原则，堕落后为资产阶级的“左翼”走狗，在补选中往往妥协（如支持工党改良骗局）。特别谴责英国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CPGB-ML）作为修正主义者，其建立的世界反帝国主义纲领（World Anti-Imperialist Platform, WAP）具有反动本质：WAP以伪反帝和机会主义伪装，实际服务于资产阶级分化工人（如宣扬当代中国为“社会主义灯塔”的谬论），并明知故犯地支持中国修正主义——

CPGB-ML前主席 Harpal Brar曾写文章批判“改革开放”为修正主义，但他们仍公开拥护中修政权，这暴露了其伪反帝和双重标准的机会主义本质，彻底背叛了马列毛主义原则。

多角度探索这一补选，必须撕开其历史上下文、细微差别和广泛含义的伪装。首先，历史背景显示，Gorton and Denton作为工党传统据点（近百年控制），补选结果延续了Brexiteer后（2016年）资本主义危机的腐烂重组：工党衰退源于Starmer的机会主义（如2025年福利削减和移民镇压），绿党崛起利用伪环保和反移民民粹，但忽略底层工人（如曼彻斯特移民社区的血汗工厂）。与2024年Rochdale补选比较（乔治·加洛韦的工人党“胜利”），2026年绿党胜出显示资产阶级转向“绿色”骗局，但同样是改良主义毒药。边缘案例值得无情剖析：Spencer作为女性领导者的叙事，被资产阶级媒体粉饰为“进步”，但从毛主义性别分析，这是伪女权主义——忽略英国女性工人的双重枷锁（如育儿负担和低工资，非正规率超50%），服务于改良主义资本主义。相关考虑包括移民因素：选区多元文化背景放大改革党反移民毒瘤（28.7%），但这分化无产阶级，忽略中资企业（如华为在英分支）对移民劳工的血腥剥削。补选的含义如毒瘤般深刻而多面。从社会角度，它加剧阶级分裂：绿党“胜利”制造“环保共识”的虚假狂欢，掩盖工人贫困（如2025年最低工资停滞），制造寒蝉效应，抑制工会运动。外交上，加剧欧洲紧张：Starmer工党失败推动英国“绿色”移民铁拳，服务美帝围堵，但也凸显中国修正主义帝国主义的反扑（如“一带一路”在英项目投资超500亿英镑），形成帝国主义狼群的厮杀。政策含义包括呼吁革命：批判CPB和CPGB-ML/WAP的修正主义，工人必须建立真正马列毛主义政党；国际上，人权组织的伪善调查（如中资劳工剥削）不过是幌子，但需撕开英国对华贸易依赖的假面。最终，这一补选的目的在于唤醒工人阶级：它不是“变革”，而是帝国主义屠刀。只有批判所有修正主义，包括CPGB-ML的伪反帝和明知故犯，支持真正革命实践，才能点燃无产阶级革命的烈火。

补选结果的阶级分析：绿党胜利的资本主义本质 英国2026年Gorton and Denton补选的结果，以绿党Hannah Spencer的所谓“胜利”告终，这场资产阶级的肮脏把戏不过是帝国主义走狗在腐朽选举舞台上的又一丑剧，旨在麻痹工人阶级、延续血腥剥削的铁链。绿党从零起步，一跃获40.7%选票（14,980票），多数票4,402张，击败改革党（28.7%，10,578票）和工党（25.4%，9,364票），这表面上被粉饰为“进步突破”——绿党第五位议员，第一位在英格兰北部当选。但这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狡猾重组：补选投票率仅47.6%，暴露了无产阶级对这一伪民主的彻底鄙视。

Spencer的“受欢迎度”源于其伪环保主义和反移民民粹的混合毒药，利用2025年经济崩盘（通胀超4%）和移民危机转移阶级愤怒，但实际服务于资本主义“绿色”复苏的骗局——如推动环保投资和基础设施刺激，表面缓解危机，实则为垄断资本（如壳牌或BP的“绿色转型”）开辟新剩余价值来源。

从阶级批判角度，这一“胜利”赤裸裸暴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核心。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无情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在于剩余价值的野蛮榨取，“一个资本家杀死许多”——通过竞争和伪创新吞噬小资本，同时加剧对工人的血腥剥削。绿党代表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伪左翼，其胜利将进一步推动“绿色资本主义”的腐朽模式：环保刺激计划（如可再生能源补贴）表面上“可持续”，实则通过低工资和非正规就业维持利润率，工人面对“相对贫困化”（如曼彻斯特移民社区的最低工资停滞，非正规就业率超50%），而资本从“绿色”合同（如风电项目）中吸血。毛主义观点深化这一剖析：这是主要矛盾（无产阶级 vs. 资产阶级）的伪解决，补选忽略底层劳工，如移民工人（在绿党“环保”口号下被迫从事低端“绿色”劳动），他们的斗争被生态民粹淹没。强调，中国修正主义帝国主义通过中资企业在英国的投资（如“一带一路”下的高铁和港口项目，2025年投资超500亿英镑），间接支持绿党的资本主义模式：中资工厂出口剥削链条，加剧英国工人竞争压力，形成帝国主义狼狽为奸。反修正主义角度进一步撕开伪装：工党惨败暴露其作为修正主义走狗的本质——Starmer的机会主义改良（如福利削减和移民镇压）彻底破产，无法欺骗工人阶级。CPGB作为修正主义政党，未能领导任何真正斗争，在补选中往往妥协于工党“联合阵线”，背离列宁反帝原则。批判CPGB-ML作为修正主义者，其世界反帝国主义纲领（WAP）的反动本质赤裸裸显现：WAP以伪反帝和机会主义伪装，实际服务于资产阶级分化工人（如宣扬当代中国为“社会主义”神话，以及声称普京是反帝国主义政权），并明知故犯地支持中国修正主义——CPGB-ML前主席Harpal Brar曾写文章批判“改革开放”为修正主义，但他们仍公开拥护中修政权，这暴露了其伪反帝和双重标准的机会主义本质，彻底背叛马列毛主义，沦为帝国主义帮凶。多角度与细微差别分析需无情剖析。首先，历史背景显示，工党据点衰退源于Brexit后（2016年）资本主义危机的腐烂：Starmer的伪左翼政策（如“新工党”改良）加速崩盘，绿党崛起不过是资产阶级转向“绿色”骗局的延续。与2024年罗奇代尔 vs. 本地选区差异：多元文化背景放大改革党反移民毒瘤（28.7%），本地工人被民粹蛊惑，忽略阶级团结；另一个细微差别是改革党作为“右翼”盟友（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如科技民粹财团），其“改革”口号伪装剥削（如推动私有化）。相关考虑包括中国修正主义影响：中英经济纠缠（如2025年中资对英直接投资增长30%），

绿党环保政策表面对抗“污染进口”，实则通过贸易维持资本流动。剥削的含义如毒瘤般广泛而深刻。从社会角度，它加剧工人分裂：绿党“胜利”制造“绿色共识”的虚假狂欢，抑制工会（如曼彻斯特运输罢工），导致心理创伤和社区孤立。经济上，推动“相对贫困化”循环：环保投资挤压福利（如养老改革），工人无固定收入陷入贫困深渊。政策含义包括呼吁革命：批判CPB和CPGB-ML/WAP的修正主义，工人必须建立真正马列毛主义政党，推动基层斗争。国际上，这凸显欧洲帝国主义竞争，中国修正主义回应（如“一带一路”扩张）加剧紧张，但也为跨国团结（如英欧工人联盟）提供机遇。最终，从马列毛主义视角，这一分析呼吁工人觉醒：绿党“胜利”不是“希望”，而是阶级枷锁。只有批判所有修正主义，包括CPGB-ML的伪反帝和明知故犯，支持真正革命实践，才能打破资本主义本质。、英国帝国主义与美帝勾结：补选的国际维度 英国2026年Gorton and Denton补选的结果，不仅是国内资产阶级狗咬狗的丑陋闹剧，更是英国帝国主义与美帝全球霸权狼狽为奸的赤裸裸体现。绿党Hannah Spencer的“胜利”表面上披着“绿色进步”的伪装，实则强化了美英同盟的铁拳，对抗所谓“中国威胁”——这不过是帝国主义走狗的狡猾借口：绿党政策推动“绿色”移民收紧和环保投资，服务于美帝的AUKUS扩张和“印太战略”，旨在扼杀亚太工人革命的火种。英国作为美帝在欧洲的腐朽附庸，通过补选巩固其走狗地位：Starmer工党的惨败进一步暴露其无力抵抗美帝操控，绿党崛起则以“可持续”毒药伪装，实际推动军费扩张（如2025年英国军费超1000亿英镑）和海外资本输出，服务美帝如乌克兰或中东的代理战争。这并非简单的“同盟”，而是帝国主义屠刀的全球链条：英国资本输出（如ODA到非洲，2025年超300亿英镑）与美帝军事基地（如苏格兰核潜艇）结合，形成对第三世界无产阶级的血腥掠夺网络。但必须无情强调，中国修正主义本身即为新兴帝国主义，其“社会帝国主义”通过“一带一路”债务陷阱（如在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的“投资”项目）和南海扩张，与美英狼狽为奸或狗咬狗争夺全球霸权。这绝非“反帝”神话，而是帝国主义间肮脏的权斗——中修伪装成“发展伙伴”，实际输出剥削和镇压，类似于美帝的马歇尔计划，但以“共赢”谎言粉饰。从理论批判角度，这一勾结如利剑般刺穿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的剖析：英国作为垄断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资本输出和军事扩张加剧全球不平等，补选结果强化了这一过程，美帝通过操控英国政策（如Starmer的“印太倾斜”）维持其腐朽霸权，确保英国军费支持其欧洲围堵。毛主义强调：这是外部矛盾的表现——帝国主义间竞争（如美英 vs. 中国修正主义），但内部服务于全球资产阶级联盟，压制工人革命。反修正主义观点尤为如火炬般燃烧：中国修正主义如苏联般，是“社会帝国主义”，伪装成“发展中国家”输出剥削——其“一带一路”项目在非洲制造债务奴役，类似于美帝的IMF陷阱，但以“基础设施”谎言欺骗；南海扩张则直接威胁英国“海外领土”，

推动中英对抗，但这不是“民族矛盾”，而是狗咬狗的帝国主义争夺。CPGB作为修正主义叛徒，在国际维度上同样机会主义：其“多边外交”口号回避对中国修正主义帝国主义的批判，转而追求“和平共处”，这背离列宁反帝原则。批判CPGB-ML作为修正主义者，其世界反帝国主义纲领（WAP）的反动本质赤裸裸显现：WAP以伪反帝和机会主义伪装，实际服务于资产阶级分化工人（如宣扬中修为“社会主义”谬论），并明知故犯地支持中国修正主义——Harpal Brar批判“改革开放”文章，却仍公开拥护中修政权，这暴露了其伪反帝和双重标准的机会主义本质，彻底背叛马列毛主义。

推动中英对抗，但这不是“民族矛盾”，而是狗咬狗的帝国主义争夺。CPGB作为修正主义叛徒，在国际维度上同样机会主义：其“多边外交”口号回避对中国修正主义帝国主义的批判，转而追求“和平共处”，这背离列宁反帝原则。批判CPGB-ML作为修正主义者，其世界反帝国主义纲领（WAP）的反动本质赤裸裸显现：WAP以伪反帝和机会主义伪装，实际服务于资产阶级分化工人（如宣扬中修为“社会主义”谬论），并明知故犯地支持中国修正主义——Harpal Brar批判“改革开放”文章，却仍公开拥护中修政权，这暴露了其伪反帝和双重标准的机会主义本质，彻底背叛马列毛主义。

从反修正主义批判角度，特别强调CPGB作为修正主义政党，其推动的“议会道路”和机会主义路线如毒蛇般背离了列宁主义暴力革命原则，彻底堕落为英国帝国主义的“左翼”附庸——他们在补选中往往妥协于工党“联合阵线”，回避对中国修正主义帝国主义的批判，转而追求“和平转型”的幻想，这与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一样，是对无产阶级的背叛。如果CPGB忽略中国修正主义帝国主义（如“一带一路”对英渗透），这进一步暴露其机会主义本质：他们将中修伪装成“盟友”，助长全球修正主义毒瘤。毛主义观点无情深化：反对党整体是资产阶级“左翼”伪装，无力挑战根源——如工党的“新资本主义”口号和改革党的民粹主义，不过是改良主义毒药，忽略无产阶级主要矛盾。批判CPGB-ML作为修正主义者，其世界反帝国主义纲领（WAP）的反动本质赤裸裸显现：WAP以伪反帝和机会主义伪装，实际服务于资产阶级分化工人（如乔治·加洛韦的反移民谬论），并明知故犯地支持中国修正主义——Harpal Brar曾写文章批判“改革开放”为修正主义，但他们仍公开拥护中修政权，这暴露了其伪反帝和双重标准的机会主义本质，彻底背叛马列毛主义，成为帝国主义帮凶。历史背景显示，CPB从反帝高峰（1920年代反对殖民主义）到如今边缘化，受机会主义腐蚀：1960年代其清洗毛主义派系，导致彻底修正主义化，此后在补选如2024年罗奇代尔中无所作为，仅限于议会辩论。与工党比较，工党源于小资产阶级改良，但同样机会主义，如Starmer的“绿色新政”口号忽略阶级分析。边缘案例需无情剖析：青年选民低参与率（补选中青年投票不足30%）显示补选疏离无产阶级，许多年轻人视反对党为“老派腐朽”，

但这也暴露修正主义破产——CPGB-ML的WAP利用青年民粹，却分化他们加入伪反帝阵营；另一个细微差别是性别叙事：工党女性候选人比例高（超30%），但其“女权”政策伪装（如育儿假改革）忽略阶级剥削，类似于Spencer's伪女权主义。相关考虑包括中国修正主义影响：CPGB对中英关系“中立”，忽略“一带一路”项目在英国（如港口投资）制造的劳工血汗，这助长帝国主义渗透。

反对党失败的含义如烈火般燃烧。从社会角度，它加剧工人幻灭：补选后工会运动（如曼彻斯特运输罢工）受挫，许多工人转向民粹或弃权，导致社区分裂和心理枷锁。政策上，强化绿党霸权：反对党无力阻挡环保法案，抑制反移民斗争，但也暴露资产阶级民主局限——补选未触及根源，如财阀控制（壳牌等捐款主导）。国际含义包括欧洲影响：失败助长美英同盟，中国修正主义回应（如南海扩张）制造紧张，但也为跨国团结创造空间。边缘影响：如果反对党内部分裂（如工党左翼脱离），这可能激发新机会主义，但从毛主义视角，这是“次要矛盾”——需通过群众批判粉碎。长远含义：失败可能引发危机，如2027年经济崩盘，推动革命火种。最终，这一批判从马列毛主义视角呼吁：反对党的失败不是“意外”，而是修正主义破产。只有批判CPB和CPGB-ML/WAP的修正主义，支持真正革命实践，才能打破资产阶级民主局限，推动无产阶级革命。

V. 工人阶级的回应：国际主义与革命策略

面对英国2026年Gorton and Denton补选中绿党的伪“胜利”，工人阶级必须以马列毛主义国际主义为利剑，撕开选举骗局的血淋淋面纱，转化为基层革命风暴和跨国铁拳团结。这一补选暴露了资产阶级民主的腐朽铁链：绿党40.7%霸权将加剧剥削（如“绿色”移民铁拳和环保投资的资本吸血），但也点燃了革命火种——工人愤怒（如曼彻斯特制造业罢工浪潮，2025年运输工会抗议算法奴役）可转化为集体铁锤，砸碎帝国主义枷锁。正如列宁在《论工人阶级的统一》中无情宣告，国际主义是无产阶级对抗帝国主义分化阴谋的致命武器：英国工人斗争绝非孤立“本土闹剧”，而是全球无产阶级共同挥剑对抗美英帝国主义和中国修正主义帝国主义的战场。毛主义进一步锻造这一利刃：通过“群众路线”，从工厂牢笼和社区战场积累力量，最终转化为人民战争，粉碎修正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所有伪装。反修正主义立场如烈火般焚烧：批判CPGB作为修正主义叛徒，其议会机会主义路线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狗链；同时无情谴责CPGB-ML作为修正主义者，其世界反帝国主义纲领（WAP）的反动本质赤裸裸显现——WAP以伪反帝民粹蛊惑工人，实际分化无产阶级（如拥护中修为“反帝先锋”的谬论），并明知故犯地支持中国修正主义——Harpal Brar批判“改革开放”文章，却仍公开拥护中修政权，这暴露了其伪反帝和双重标准的机会主义本质，彻底背叛马列毛主义，成为帝国主义帮凶。

团结的重要性在于砸碎资本的分化铁网。英国工人多为制造业和零工经济的血汗奴隶，面对双重屠刀：绿党政策（如“可持续”移民镇压）制造民族主义毒雾，中国修正主义帝国主义渗透（如中资工厂的血汗链条，2025年中资在英投资超500亿英镑）。这与马克思对劳动力再生产的剖析相符——资本通过移民操控维持廉价奴隶池，而帝国主义提供政治屠刀。法国或德国类似工人斗争证明了团结的铁锤力量：2025年欧洲汽车工会跨国声援英国罢工，共享反中资剥削的革命经验。英国工会如TUC（Trades Union Congress，受CPB影响）必须摆脱修正主义毒瘤，转向基层风暴；国际层面，呼吁全球工会联盟，如国际运输工人联合会（ITF），组织跨国铁拳：协调英国、法国和中国侨民罢工，分享数字抵抗策略（如加密App对抗帝国主义监控）。行动建议必须如革命风暴般具体而猛烈。首先，无情批判CPB的伪左翼和CPGB-ML/WAP的反动本质：其“反绿党”口号限于议会空谈，未组织群众铁拳，我们需求其公开放弃机会主义，支持暴力革命。其次，组织跨国罢工和示威：从曼彻斯特工厂牢笼扩展到欧洲，反对美英基地（如苏格兰核潜艇）和中国“一带一路”债务奴役（如非洲矿工的血汗项目）。第三，教育工人马列毛主义理论：通过基层学习组剖析补选如何体现修正主义背离毛泽东“为人民服务”原则，转向维护资本主义稳定；揭露中国“社会帝国主义”对英国工人的渗透（如中资工厂事故率飙升），以及CPGB-ML的伪反帝（Harpal Brar的双重标准）。多角度探索这一回应，必须考虑历史上下文、边缘案例和细微差别。历史背景显示，国际主义有铁血先例：20世纪第三国际协调全球工人风暴，对抗帝国主义屠刀；当代，如2020年代西班牙平台工人罢工，获欧洲毛主义者声援。边缘案例包括：如果罢工失败，一些工人可能沦陷于民粹（如支持改革党反移民），这要求无情说服，强调阶级铁拳而非国籍毒雾；另一个细微差别是数字抵抗：微信或Telegram监控易于帝国主义追踪，转向开源工具需锻造工人技术素养。相关考虑是女性工人视角：Spencer“女权”伪装忽略性别剥削（如英国女性非正规就业率超50%），回应应融入毛主义性别分析，推动妇女革命阵线。回应的含义如革命烈火般深刻。从社会角度，它可重建工人社区铁拳，缓解寒蝉效应，推动心理互助网络（如罢工铁卫队）。政策上，可能引发英国劳工法风暴，如强制工会化，但也暴露改良主义局限（如TUC的议会奴役）。国际含义包括激发全球反帝国主义风暴：补选可与美国或亚洲零工斗争联动，推动联合国劳工组织调查跨国镇压，但从毛主义视角，这是伪善——真正变革需人民战争。革命展望从毛主义“人民战争”汲取：从小规模罢工积累铁拳力量，最终推翻帝国主义政权。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铁律适用于此——2026补选的失败是全球无产阶级革命的起点，通过国际主义和批判所有修正主义，我们能点燃燎原之火。

结论：向英国帝国主义宣战，推动无产阶级革命 英国2026年Gorton and Denton补选的结果，从绿党Hannah Spencer的伪“胜利”到工党的耻辱惨败，再到其背后的国际狼狽为奸，彻底撕开了资产阶级民主的血淋淋伪装，暴露了帝国主义走狗的腐朽本质。这一补选并非“进步狂欢”，而是英国帝国主义重组的屠刀，服务于美帝全球霸权和资本主义血腥积累的延续：Spencer的“绿色”骗局推动环保投资和移民铁拳，掩盖工人贫困（如通胀下的最低工资奴役，非正规就业率超50%），转移阶级铁锤的愤怒。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剖析，到列宁对帝国主义的无情批判，再到毛泽东的继续革命铁律，这一事件如烈火般印证了所有层面：内部剥削（零工经济的血汗碎片化）、外部干预（美英同盟的欧洲围堵）和国际勾结（与西方资本的腐烂融合）。特别无情强调，中国修正主义亦为帝国主义，其“社会帝国主义”通过“一带一路”债务奴役和南海扩张，加剧全球无产阶级的血腥剥削，与美英狼狽为奸或狗咬狗争夺霸权，这彻底背离毛时代反帝遗产，转而维护官僚资产阶级的腐朽利益。并重申CPB作为修正主义叛徒，其议会机会主义路线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狗链；以及CPGB-ML作为修正主义者，其世界反帝国主义纲领（WAP）的反动本质赤裸裸显现——WAP以伪反帝民粹蛊惑工人，实际分化无产阶级，并明知故犯地支持中国修正主义——Harpal Brar批判“改革开放”文章，却仍公开拥护中修政权，这暴露了其伪反帝和双重标准的机会主义本质，彻底背叛马列毛主义，成为帝国主义帮凶。

这一批判的革命号召如铁锤般砸下：国际共产主义者必须团结铁拳，重建真正马列毛主义政党，向英国帝国主义宣战！毛泽东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铁律在此燃烧——2026补选的“胜利”不过是资本主义危机的腐烂表象，从曼彻斯特罢工牢笼到欧洲工厂战场，这些小火种可点燃全球无产阶级革命的燎原烈火。我们呼吁全球工人超越国界枷锁，组织跨国铁拳联盟：从英国反移民镇压扩展到亚太，反对美英中所有帝国主义；教育群众马列理论，粉碎CPB和CPGB-ML/WAP的修正主义幻觉，支持真正革命实践，如基层学习组和人民阵线建设。多角度考察细微差别与含义，我们承认事件的腐朽复杂性：并非所有英国工人撕开伪装，一些人受民粹毒雾或媒体蛊惑（如卫报的“绿色希望”谎言）支持Spencer，但马列毛主义铁律强调阶级铁拳优先——国籍或性别叙事（如Spencer’s伪女权主义）是次要矛盾，剥削是主要屠刀。边缘案例如青年工人：补选中青年投票率低（不足30%），反映幻灭，但也暴露修正主义破产——CPGB-ML的WAP利用青年民粹，却分化他们加入伪反帝陷阱；另一个细微差别是经济因素：英镑贬值放大中资渗透，如果工人视中国为“机会”，这需通过无情教育撕开其帝国主义面纱。长远影响包括政策风暴：补选可能推动2027年“绿色”修宪，但也引发危机，如经济崩盘激发罢工浪潮；社会含义是重建社区铁拳，缓解心理枷锁（如移民社区的反镇压焦虑）；

国际上，呼吁联合国伪善调查帝国主义扩张，但真正回应需人民战争——欧洲革命可连接中东或非洲毛主义者，反对所有修正主义。最终，这一事件不是结束，而是革命起点：向英国帝国主义宣战，推动无产阶级革命，我们将以铁拳赢得未来，粉碎所有伪装！



帝国主义的狗咬狗：论美伊战争的阶级性质

哈梅内伊之死，把中东局势进一步推向了公开战争。

2026年2月28日，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大规模袭击中，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被打死；随后，伊朗统治集团迅速启动继承安排，由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接班，这表明这场冲突并不是偶发性的边境摩擦，而是一次围绕中东秩序、地区霸权和战略资源展开的激烈碰撞。

但是，革命者首先必须拒绝被资产阶级宣传机器牵着鼻子走。对美国及其盟友来说，这场战争被包装成“安全”“威慑”乃至“清除威胁”的必要行动；对伊朗统治集团来说，这场战争又被包装成“民族尊严”“反抗侵略”甚至“宗教殉道”的伟大斗争。可无论包装得多么冠冕堂皇，都掩盖不了一个根本事实：这不是劳动人民的战争，而是两个反动统治集团之间的战争，是帝国主义和地区霸权势力之间重新分配力量范围的战争。受轰炸的是城市，受征召的是普通人，承担代价的是最广大的劳动群众，而绝不是那些坐在宫殿、军营和金融机构里发号施令的人。结合目前公开报道看，这场战争已经造成地区局势急剧恶化、能源市场剧烈波动，并推动伊朗统治集团进一步向强硬和高压方向集中。

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任务，不是去替任何一方统治阶级哭丧，也不是在两个反动集团之间选边站队，而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揭穿这场战争的真实性质：它表面上是国家之间的冲突，实质上是统治阶级为了自身利益而把人民拖入火海的狗咬狗战争。

这场战争不是人民的战争，而是帝国主义与地区霸权集团之间的狗咬狗

判断一场战争的性质，不能看交战双方嘴上喊了什么，而必须看这场战争究竟是由谁发动的、为了谁的利益而打、又要由谁去承担代价。马克思主义从来反对用“国家名义”“民族名义”或“宗教名义”遮蔽阶级内容。就这场围绕伊朗展开的大战而言，表面上看是美国及其盟友同伊朗之间的军事冲突，实质上却是两个反动统治集团围绕中东支配权、战略通道、能源秩序和地区政治格局展开的血腥较量。阿里·哈梅内伊在2026年2月28日的美以打击中死亡，此后伊朗的专家会议迅速推举其子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继位；某些媒体指出，这一安排明显依赖强硬派网络和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支持，也意味着伊朗政权在战争压力下不是趋于缓和，而是进一步向高压、集中和强硬方向收缩。

这件事本身就足以说明，伊朗现政权绝不是什么“人民政权”，更不是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一个真正代表劳动人民利益的政权，不会在最高领袖死后第一时间关心如何维持强硬机器的连续性，不会把国家命运同某一宗教—军事—官僚集团死死捆绑，更不会依靠家族继承、密室决定和卫队背书来完成最高权力交接。穆杰塔巴之所以能迅速上位，恰恰不在于他得到了群众授权，而在于他长期深度嵌入了伊朗神权国家的核心权力结构，被视为与革命卫队关系最紧密的强硬派人物之一。这样一种统治结构，从头到尾都同劳动群众无关；



它所维护的，是伊朗国家资本、教士官僚和军事集团的统治利益，而不是伊朗工人、贫民和普通士兵的利益。而美国一边则更加不必多说。美国及其盟友从来不是为了什么“和平”“民主”或“安全”才在中东不断发动战争。公开报道已经写得很明白：此次打击直接瞄准伊朗领导层和国家核心设施，并迅速引发了地区战争升级、油价飙升、平民死伤增加和更广泛的国际紧张。美方真正要维护的，是它在中东的霸权体系，是石油运输线、军事部署、盟友网络以及对整个地区政治秩序的支配权。凡是会动摇这一体系的力量，不论其性质如何，只要妨碍了美国霸权，就会成为美国打击和重组的对象。因此，美国方面所谓“清除威胁”“恢复稳定”的说辞，不过是老牌帝国主义给自己涂上的道德油彩；它真正关心的，从来不是中东人民能否摆脱苦难，而是中东是否继续服从它的战略安排。

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如果只反对美国，而把伊朗统治集团描绘成某种天然“进步”的、天然“反帝”的力量，那就会落入另一种资产阶级宣传的陷阱。伊朗现政权确实同美国霸权发生尖锐冲突，但同美国发生冲突，并不自动等于代表人民，更不自动等于代表无产阶级。一个国家是不是站在人民立场上，不取决于它反不反美，而取决于它的阶级性质，取决于国家机器掌握在谁手里，取决于它究竟是依靠群众的自觉政治组织，还是依靠宗教权威、军警机器和官僚统治来维持自身。伊朗政权长期以来依靠教士集团、革命卫队和安全机关维系统治，靠宗教意识形态约束群众，靠地区代理人网络推进本国影响力，这种国家不可能因为挨了美帝的打，就突然变成人民的国家。它与美国的矛盾，不是劳动人民同压迫者之间的矛盾，而是两个反动国家集团之间的矛盾。所以，这场战争的根本性质就必须讲清楚：这不是被压迫民族在革命政党领导下进行的民族解放战争，也不是无产阶级为摆脱剥削压迫而进行的革命战争，而是两个统治集团把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拖入战火的战争。美国要借战争巩固霸权，伊朗统治集团要借战争巩固内部控制、强化强硬路线、压制国内不满；两边都在用“国家利益”“安全威胁”“历史使命”“宗教尊严”之类的词句包装自己的统治需求，两边都试图把普通人变成自己战略算盘里的筹码和炮灰。这样的战争，

归根到底，不是人民的战争，而是统治阶级之间重新分配势力范围的战争，是彻头彻尾的狗咬狗。真正付出代价的，不是统治者，而是最广大的劳动群众。帝国主义战争有一个最虚伪、也最残酷的地方：发动战争的人，往往并不亲自承担战争的主要代价；真正死去、流离失所、失去生活来源的，永远是最广大的普通人民。这一次围绕伊朗展开的大战也是如此。无论华盛顿的将军、政客和军火资本，还是德黑兰的教士官僚、革命卫队高层和国家机器操盘者，他们都不会像普通工人、贫民、妇女、儿童和基层士兵那样，直接暴露在轰炸、断水断电、物资短缺、房屋毁坏和逃难流离之中。公开报道显示，战争爆发后，伊朗的平民伤亡已经超过 1,300 人，近 8,000 套住房被毁；与此同时，冲突外溢到黎巴嫩等地，单在黎巴嫩就已造成超过 667,000 人流离失所。这就是所谓“国家利益”的真实面目。美国和以色列方面把袭击包装成“定点清除”“精确打击”“削弱威胁”，但落到地面上，炸毁的不是抽象的“威胁”，而是具体的学校、住宅、道路、油库、供水系统和城市生活本身。美联社日前援引卫星图像和专家分析指出，2 月 28 日伊朗米纳卜一所小学遭到的致命爆炸，很可能是一次美军空袭所致，造成 165 人以上死亡，其中多数是儿童。即便附近存在革命卫队设施，这也丝毫不能改变一个事实：在帝国主义的战争逻辑中，平民生命总是可以被当作“附带损害”而一笔带过。

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如果只反对美国，而把伊朗统治集团描绘成某种天然“进步”的、天然“反帝”的力量，那就会落入另一种资产阶级宣传的陷阱。伊朗现政权确实同美国霸权发生尖锐冲突，但同美国发生冲突，并不自动等于代表人民，更不自动等于代表无产阶级。一个国家是不是站在人民立场上，不取决于它反不反美，而取决于它的阶级性质，取决于国家机器掌握在谁手里，取决于它究竟是依靠群众的自觉政治组织，还是依靠宗教权威、军警机器和官僚统治来维持自身。伊朗政权长期以来依靠教士集团、革命卫队和安全机关维系统治，靠宗教意识形态约束群众，靠地区代理人网络推进本国影响力，这种国家不可能因为挨了美帝的打，就突然变成人民的国家。它与美国的矛盾，不是劳动人民同压迫者之间的矛盾，而是两个反动国家集团之间的矛盾。

所以，这场战争的根本性质就必须讲清楚：这不是被压迫民族在革命政党领导下进行的民族解放战争，也不是无产阶级为摆脱剥削压迫而进行的革命战争，而是两个统治集团把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拖入战火的战争。美国要借战争巩固霸权，伊朗统治集团要借战争巩固内部控制、强化强硬路线、压制国内不满；两边都在用“国家利益”“安全威胁”“历史使命”“宗教尊严”之类的词句包装自己的统治需求，两边都试图把普通人变成自己战略算盘里的筹码和炮灰。这样的战争，归根到底，不是人民的战争，而是统治阶级之间重新分配势力范围的战争，是彻头彻尾的狗咬狗。



真正付出代价的，不是统治者，而是最广大的劳动群众。帝国主义战争有一个最虚伪、也最残酷的地方：发动战争的人，往往并不亲自承担战争的主要代价；真正死去、流离失所、失去生活来源的，永远是最广大的普通人民。这一次围绕伊朗展开的大战也是如此。无论华盛顿的将军、政客和军火资本，还是德黑兰的教士官僚、革命卫队高层和国家机器操盘者，他们都不会像普通工人、贫民、妇女、儿童和基层士兵那样，直接暴露在轰炸、断水断电、物资短缺、房屋毁坏和逃难流离之中。公开报道显示，战争爆发后，伊朗的平民伤亡已经超过 1,300 人，近 8,000 套住房被毁；与此同时，冲突外溢到黎巴嫩等地，单在黎巴嫩就已造成超过 667,000 人流离失所。这就是所谓“国家利益”的真实面目。美国和以色列方面把袭击包装成“定点清除”“精确打击”“削弱威胁”，但落到地面上，炸毁的不是抽象的“威胁”，而是具体的学校、住宅、道路、油库、供水系统和城市生活本身。美联社日前援引卫星图像和专家分析指出，2 月 28 日伊朗米纳卜一所小学遭到的致命爆炸，很可能是一次美军空袭所致，造成 165 人以上死亡，其中多数是儿童。即便附近存在革命卫队设施，这也丝毫不能改变一个事实：在帝国主义的战争逻辑中，平民生命总是可以被当作“附带损害”而一笔带过。

而且，战争对群众的打击并不只体现在尸体和废墟上，还体现在日常生活被全面摧毁。路透报道提到，以色列空袭伊朗油库和炼厂后，德黑兰上空出现大片有毒烟云，公共健康和环境风险急剧上升；美联社则指出，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战事已经让这一关键油气通道事实上陷入瘫痪，全球能源运输受阻，汽油价格和保险成本飙升。换句话说，战争不仅杀人，还会通过通胀、停工、停运、物资紧缺和生活成本上升，继续慢慢地压榨普通人的生存空间。最值得强调的是，这种代价并不是“全民平等承担”的。统治阶级总能把自己的痛苦转嫁下去。美国战争机器第一周开支就被估算为 113 亿美元，军工企业、承包商和霸权体系的附属资本会从中获得巨额利润；而普通纳税人则要在未来通过通胀、财政紧缩和社会支出被挤压来为战争买单。

伊朗方面也一样，国家机器会优先保障其军政核心、强力机关和统治装置，而普通群众 则要承担失业、物价上涨、基础设施受损和政治高压加剧的后果。统治者一边高喊牺牲、抵抗、荣誉、国家，一边却总有办法 让别人去承担牺牲。

因此，我们必须把这场战争的阶级图景看清楚：前线死的是普通士兵，废墟里埋的是普通家庭，逃亡路上挤着的是妇女儿童，物价上涨后吃不起饭的是工人和贫民，战后背负债务和重建成本的也是劳动群众。相反，那些真正决定战争的人，要么借战争 巩固统治，要么借战争扩张势力，要么借战争发财。战争的口号属于统治者，战争的苦难却属于人民。这正是为什么革命者不能跟着任何一方资产阶级宣传去选边站队：因为在这种狗咬狗的战争中，人民从一开始就不属于赢家，他们只是被牺牲、被动员、被利用的对象。民族主义、宗教与“安全”话语——统治集团怎样把自己的战争包装成人民的事业 任何一场帝国主义战争，都不只是导弹、军队和财政拨款的问题，它同样也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统治阶级很清楚，单靠暴力 机器固然可以强迫人民服从，但要想让大批群众在相当长时间内忍受牺牲、接受征召、容忍物价上涨、默认基础设施被毁，甚至主动为战争鼓掌，他们还必须制造出一套能够让人“听上去有道理”的说辞。换句话说，战争不仅要在军事上被组织起来，也必须在观念上被正当化。而在这场围绕伊朗展开的大战中，美国及其盟友一边、伊朗统治集团一边，虽然彼此厮杀，却在这 一点上极其相似：他们都在用不同形式的意识形态，把统治集团的战争伪装成人民的战争。美国及其盟友最惯常的办法，是把自己的战争包装成“维护安全”“遏制威胁”“保护盟友”乃至“维护国际秩序”。特朗普 在 2 月 28 日的袭击后就把行动说成是为了消除“安全威胁”，而美国国内的政治运作也迅速跟上：3 月 5 日，美国众议院否决 了限制总统对伊朗动武权限的决议，表明美国统治集团内部的主流力量，仍然愿意以“国家安全”的名义继续为这场战争背书。这种话语的妙处就在于，它总是把帝国主义主动发动的打击，说成一种“不得不采取”的防御性行动。于是，原本是为了维持 霸权、控制地区秩序、巩固军事—金融—能源支配体系而发动的战争，就被说成了“负责任的领导”“必要的预防”甚至“为世界稳定承担义务”。在这种叙事之下，普通民众被迫站在国家机器后面，把自己同军工资本、地缘战略和霸权秩序捆绑在一起，仿佛只要反对战争，就是在纵容“威胁”，就是不顾“国家安全”。



但这种说法的虚伪恰恰在于，它故意抹去了“谁定义威胁、谁决定开战、谁从战争中受益”这三个根本问题。

对美国统治阶级

来说，所谓“安全”从来不只是美国普通民众免遭伤害的意思，更重要的是美国霸权体系的安全，是其盟友网络、能源航道、

军事存在和全球支配地位的安全。只要某个国家、某股力量、某种局势会冲击这一整套支配结构，它就会被迅速归入“威胁”

的范畴。于是，“安全”这个词看上去中性，实际上却是帝国主义重新分配暴力合法性的工具。它让侵略看起来像防御，让先

发制人的打击看起来像谨慎克制，让统治集团的意志看起来像全民共识。

伊朗统治集团的动员方式则是另一套外衣。它并不像美国那样主要诉诸“民主”和“国际秩序”，而是更依赖宗教合法性、民

族主义和殉难叙事。哈梅内伊死后，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被迅速推上最高领袖位置；路透称其被国家媒体包装为这场所谓“斋月

战争”的“负伤老兵”，而美联社也指出，他之所以被选中，正是因为他与革命卫队的紧密关系以及强硬路线的象征意义。

这说明什么？说明伊朗现政权并没有把这场战争呈现为一次需要人民冷静审视、理性判断的政治灾难，而是在极力把它转化成一种带有宗教色彩和民族激情的“抵抗叙事”。在这种叙事中，国家不是一个阶级统治的机器，而被说成一个神圣共同体；领

袖不是具体统治集团的代表，而被说成殉道者、守护者；战争不是国家集团之间的血腥争夺，而被说成民族与信仰的试炼。这种动员方式的作用极其明显。它能够把人民对失业、贫困、压迫和官僚统治的不满，暂时转移到对外部敌人的愤怒上；它能够把统治集团的连续性包装成“民族不能屈服”；它还能够把对战争的质疑说成不忠、不敬、甚至是背叛。于是，在战争环境下，内部压制、社会管控和对异议的打击，就更容易被合理化。路透关于穆杰塔巴继位的报道就明确提到，分析人士认为这次权力交接将进一步强化强硬派控制、加深国内镇压。也就是说，战争不仅是对外的，也是对内的；它不仅打向敌国，也打向本国群众。统治集团借助外部冲突，把自己塑造成“民族生存的屏障”，从而为内部高压赢得更多空间。更要命的是，这两套话语虽然表面上互相敌对，实际上却在做同一件事：把阶级问题抹掉，把国家说成全民共同体，把统治集团的利益说成全体人民的利益。美国一边说“我们是在维护安全”，伊朗一边说“我们是在保卫尊严”；美国一边说“必须消除威胁”，伊朗一边说“必须复仇与抵抗”。

词不一样，结构却一样：都是要求普通人放弃自己的阶级立场，忘掉自己在生产和生活中的真实处境，转而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抽象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工人不再首先被当作工人，而被当作美国人、伊朗人；贫民不再首先被当作受压迫者，而被当作宗教共同体或国家共同体的一员。这样一来，真正的剥削关系、统治关系和国家机器的阶级性质，就都被淹没在“民族”“信仰”“安全”“尊严”这些巨大而模糊的词语里。马克思主义恰恰要求我们在这里把问题重新翻过来。我们要问的不是“谁会更讲道理”，而是：谁掌握国家机器？谁定义战争目标？谁在战争中发财？谁在战争中送命？一旦这样问，民族主义和宗教主义的迷雾就会立刻散开。因为不论美国怎样高喊安全，不论伊朗怎样高喊抵抗，真正被炸死的不是华盛顿的政客和董事会成员，也不是德黑兰的教士官僚和卫队高层；真正被征召、被迫逃亡、被通胀吞噬生活、被废墟埋葬的，始终是最广大的劳动群众。统治集团发动战争，意识形态则负责让群众相信：自己不是在为别人牺牲，而是在为自己牺牲；自己不是在替统治者买单，而是在履行某种崇高使命。战争之所以能持续，靠的恰恰就是这种颠倒。

因此，反战立场绝不能只停留在“战争太惨了”这种人道主义哀叹上，而必须进一步揭露：战争之所以能被维持，正是因为资产阶级和反动统治集团掌握了定义现实的喇叭。谁控制媒体、学校、宗教讲坛、官方叙事和国家机器，谁就能不断把自己的暴力说成正义，把人民的苦难说成必要代价，把服从说成爱国，把沉默说成成熟。革命者的任务，正是在这里把这套遮羞布一层一层扯下来，让人民重新看见：这不是“我们的战争”，而是他们的战争；不是人民的事业，而是统治集团拿人民做燃料的事业。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劳动人民不属于任何帝国主义阵营 当帝国主义战争爆发时，统治阶级总是试图迫使人民在两个阵营之间选择立场。美国政府要求本国民众支持军事行动，伊朗统治集团则要求人民在民族与宗教旗帜下团结起来抵抗“外敌”。在这种环境中，普通人似乎只剩下两种选择：要么站在美国一边，要么站在伊朗统治集团一边。然而，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立场来看，这种选择本身就是一种陷阱，因为它把劳动人民绑在了不同统治集团的战车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非常清楚：工人阶级没有祖国。这并不是说工人没有生活的国家或社会，而是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国家机器主要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利益，而不是劳动人民的利益。当战争由统治阶级发动时，国家的旗帜往往成为掩盖阶级利益的工具。于是，工人被要求为“国家荣誉”牺牲，贫民被要求为“民族尊严”流血，而真正从战争中获得利益的，却是那些控制国家机器和资本力量的集团。因此，对于劳动人民来说，支持任何一个帝国主义阵营都不会带来自由或解放。如果美国的战争目标是维持其全球霸权体系，那么伊朗统治集团的战争目标则是维护自身的权力结构和地区影响力。两者的冲突并不会自动转化为人民的胜利。

相反，战争往往会加强国家机器的力量，使得社会更加军事化，政治控制更加严密，经济资源更加集中于战争机器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劳动人民不仅不会获得更多权利，反而可能失去原本已经有限的社会空间。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提出的恰恰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立场：劳动人民之间没有根本利益冲突。美国工人、伊朗工人以及中东各国的劳动群众，在现实生活中面对的是类似的问题——生活成本上升、就业不稳定、政治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战争并不会解决这些问题，反而会使这些问题变得更加严重。正因为如此，国际主义的核心思想不是让人民为不同国家的统治集团而互相仇恨，而是让他们意识到彼此之间的共同处境。从这个角度看，真正的反战立场并不是简单地呼吁“和平”，而是要揭示战争背后的社会结构。只要帝国主义体系和资本统治继续存在，大规模战争就会不断重复，因为战争本身就是这种体系的一部分。统治集团需要通过战争来维护利益、重塑力量格局并转移内部矛盾。因此，反对战争不仅意味着反对某一次具体冲突，也意味着反对让战争不断产生的制度基础。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许多历史上的反战运动，往往不仅反对战争本身，还反对统治阶级利用战争压制社会。战争时期，政府通常会扩大警察权力、加强宣传控制、限制政治反对声音，同时把社会资源集中到军事领域。这些措施表面上是为了“国家安全”，但实际上往往会进一步削弱普通人的社会权利。因此，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上的反战观点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劳动人民不应该成为任何帝国主义战争的工具。无论战争是以“民主”“安全”“民族尊严”还是“宗教使命”的名义出现，只要它服务于统治集团的利益、以人民的生命和生活为代价，那么劳动群众都没有理由为此流血。在这种意义上，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不仅是对战争本身的反对，更是一种对统治阶级政治逻辑的拒绝。它提醒人们：真正需要改变的，不只是战争的形式，而是让战争不断产生的社会结构。

结语——让统治者去打他们的战争，让人民走自己的道路 哈梅内伊之死并没有给中东带来和平，反而把整个地区进一步推向了战争与动荡；而这场战争越是升级，就越清楚地暴露出它的真实面目：它不是人民争取解放的战争，不是被压迫者反抗压迫者的战争，而是帝国主义与地区霸权集团之间围绕权力、资源、通道和秩序展开的血腥争夺。美国一边用“安全”“稳定”“国际秩序”包装自己的侵略，伊朗统治集团一边用“抵抗”“尊严”“信仰”包装自己的统治延续，但无论说辞如何不同，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的——让最广大的劳动群众去流血、去忍受贫困、去承担废墟与高压的后果。因此，真正的反战立场，绝不是在两个反动阵营之间挑选一个“较好”的支持对象，也不是跟着任何一方统治集团的宣传机器摇旗呐喊。凡是要求人民为统治者的战争牺牲的政治，凡是把国家机器、宗教权威、民族主义神话凌驾于人民现实生活之上的政治，归根到底都不是人民的政治。今天的美国不是人民的美国，今天的伊朗政权也不是人民的伊朗政权；这场战争不是人民对人民的战争，而是统治集团拿人民生命做赌注的战争。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要求我们看见这一点：美国工人、伊朗工人以及整个中东地区的劳动群众，并不是彼此的敌人。他们真正共同面对的敌人，是压在他们头上的国家机器、资本势力、军事集团和一切把战争变成常态的反动统治秩序。谁想让人民忘掉这一点，谁就是在替战争服务；谁想让人民在帝国主义之间选边站队，谁就是在把人民重新送上祭坛。所以，我们必须坚决反对这场战争，坚决反对一切帝国主义战争，坚决反对任何打着“民族”“安全”“信仰”旗号来欺骗群众、驱使群众为统治集团送命的政治骗局。人民不需要替任何帝国主义者哭丧，也不需要替任何反动统治集团尽忠。人民真正需要的是认清战争的阶级本质，拒绝成为任何一方炮灰，在反对战争、反对压迫、反对统治的斗争中，重新走上属于自己的道路。让帝国主义去埋葬帝国主义，让反动派去吞噬反动派；而劳动人民，决不能再替他们的战争买单。



论鸟笼经济

一、引言：鸟笼经济的表象与现实

“鸟笼经济”这一比喻，最早出现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陈云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讨论之中。他把市场比作“鸟”，把计划比作“笼子”，其基本意思是：市场可以活动，但必须被限制在计划所规定的范围之内；鸟可以飞，但只能在笼子里飞。这一比喻之所以一度显得颇有说服力，就在于它披着一种“折中”的外衣：既不像自由放任那样完全否定国家调控，也不像严格的计划经济那样彻底排斥市场机制，仿佛是在“活力”与“秩序”、“效率”与“稳定”之间找到了一条中间道路。

然而，这种看似圆滑、稳健、富有“现实感”的说法，恰恰掩盖了问题的根本。因为经济从来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不是一个“调节工具如何搭配”的抽象命题，更不是几个政策按钮之间的机械组合。经济的本质，首先是生产关系问题，是所有制问题，是阶级权力问题。只要离开了这一点，任何关于“计划”与“市场”的讨论，都注定会落入形式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泥潭。所谓“鸟笼经济”，表面上讲的是如何给市场划定边界，实际上回避的却恰恰是最关键的问题：这个“笼子”是谁造的？由谁掌握？用来约束谁，又用来保护谁？

问题并不在于要不要“控制市场”，而在于控制的阶级性质是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下的计划，和官僚集团手中的计划，绝不是同一种东西；以工人阶级利益为基础的经济组织，和以维持既得利益集团统治为目的的经济调节，也绝不能混为一谈。脱离了阶级分析，所谓“计划高于市场”“笼子约束鸟”的说法，就只剩下一层抽象的行政外壳。它看上去是在限制资本，实际上却可能是在重新分配资本活动的空间；它看上去是在规范市场，实际上却可能是在为官僚特权和资本扩张预留制度化通道。

正是在这里，“鸟笼经济”的迷惑性显现出来了。它并不公开宣称资本的全面复辟，也不直接放弃社会主义的语言外衣；相反，它往往以“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市场”“国家掌握大局”“防止市场失控”等姿态出现，因此比赤裸裸的自由主义更容易迷惑群众。它似乎承认市场有危险，因此需要笼子；但它又默认市场本身是必要的、积极的、不可替代的。于是，问题就从“是否允许资本逻辑存在”被偷换成了“如何管理资本逻辑”，从“是否坚持无产阶级掌握生产和分配”被偷换成了“如何在发展中兼顾各方面利益”。这正是折中主义最典型的手法：不触及根本矛盾，而是在矛盾表面做文章；不解决问题，而是让问题以更加可控的形式延续下去。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这种思路具有深刻的局限性。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已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在于生产的社会化与占有的私人性之间的对立。生产越是依赖广大劳动者的共同协作，资本就越是少数人的私人占有形式来支配这一切；社会劳动创造出的财富越多，劳动者自身就越可能被剥夺得更加彻底。这个矛盾不是靠行政手段在表面上“平衡一下”就能解决的，也不是靠给市场画一个圈、给资本加几道闸门就能消除的。只要资本逻辑仍然被承认，只要利润、交换、价值增殖仍然在经济运行中起支配作用，那么所谓的“笼子”终究只是调节其表现形式，而不是消灭其根源。

更进一步说，鸟笼经济之所以必然滑向新的不平等和新的统治形式，就在于它的“笼子”并不是悬浮在社会之上的中立装置，而是由具体的国家机器、具体的官僚机构、具体的权力关系来实施的。谁来制定边界，谁就拥有了决定资源流向、决定市场准入、决定政策松紧的权力。而这种权力一旦脱离群众监督，脱离工人阶级的直接控制，就极易转化为官僚寻租和特殊利益的来源。于是，市场这只“鸟”并没有真正被关住；真正被关住的，反而是劳动群众对于经济生活的参与权、决定权和监督权。人民群众不能决定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了谁生产，只能在被动接受中承受价格波动、失业风险和分配不公；而官僚与资本则在“计划”的名义下灵活运用政策空间，在“控制”的名义下垄断控制本身。笼子成了权力的笼子，而不是资本的笼子。

因此，所谓“让鸟在笼子里飞”，从来不是一个无害的修辞，而是一种高度意识形态化的表述。它用温和、理性、务实的语言，把一种本质上服务于官僚—资本联合体的经济逻辑包装成全民利益的代表，把一种不敢触动资本根基的制度安排描绘成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道路”。在这种叙事中，社会主义不再意味着劳动群众对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分配的真正掌握，而被降格为一种“国家出面管理市场”的体制技巧；计划也不再意味着无产阶级有意识地组织社会生产，而被削弱为一种给市场划框、给资本设限的行政手段。结果，社会主义的内容被逐步抽空，只剩下一套名词和口号；而市场关系、价值规律和官僚统治，则在这层外衣之下不断膨胀。

历史经验已经反复证明，任何试图长期维持这种折中状态的制度设计，最终都不会停留在“平衡”上。市场一旦被作为一种正当机制引入，并被赋予资源配置功能，它就会不断侵蚀计划的边界，不断重塑企业行为、地方财政、干部激励和社会分配结构；而官僚机构为了维持自身在这一过程中的主导地位，也会越来越依赖市场所带来的财政收益、权力空间和利益交换。于是，笼子不但没有真正限制鸟，反而逐渐变成了鸟生长的温床。到最后，不是市场被计划规定，而是计划反过来为市场让路；不是资本被笼子驯服，而是笼子本身被资本逻辑改造。

这正是“鸟笼经济”的真实含义：它不是社会主义对市场的胜利性驾驭，而是社会主义原则在折中主义框架下的退却；它不是对资本逻辑的根本克服，而是对资本逻辑的一种有限承认和制度性容纳；它也不是群众路线在经济领域的展开，而是官僚权力借助“计划—市场结合”的名义，重新垄断社会经济命脉的一种形式。表面上看，鸟还在飞，经济似乎还有活力；但这种活力早已被设定了方向，被规定了边界，被纳入了既得利益的轨道之中。那不是自由飞翔的生命力，而是被驯养、被利用、被控制的运动。

因此，批判鸟笼经济，绝不能停留在政策成效的层面，不能只是讨论它“效率高不高”“增长快不快”“是否适合某一历史阶段”。真正的问题在于，它究竟服务于哪个阶级，巩固了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培育了什么样的权力结构，又为资本的再生产提供了怎样的制度条件。离开这些问题，一切关于鸟笼经济的赞美都不过是对现存秩序的修饰，一切关于“计划与市场结合”的空洞议论都只是在为后来的资本扩张铺路。

由此，本篇文章将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立场出发，以阶级分析为方法，结合苏联新经济政策、中国改革开放早期的历史经验，以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若干重大争论，对“鸟笼经济”进行系统批判。本文将揭示：所谓鸟笼经济，并不是什么高明的制度创造，而是一种典型的折中主义幻象；它既不能真正克服资本主义矛盾，也不能真正保障无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它在现实中所起到的作用，恰恰是为官僚控制提供合法性，为资本逻辑开辟活动空间，并最终把社会主义的外壳变成资本积累的保护色。

二、鸟笼经济的概念分析与阶级本质

鸟笼经济的核心逻辑，说到底是一种双重操作：一方面，它在口头上承认市场的活力，承认价格、供求、竞争等机制在经济运行中的某种作用，似乎愿意给社会生产留出一定的活动空间；另一方面，它又通过计划指标、行政许可、财政金融控制、资源审批和干部体系，把这种“活力”限制在一个由上层权力预先规定的框架之内。于是，所谓“放活”，



并不是人民群众自主地组织生产和交换，不是劳动者真正掌握经济命脉，而只是被允许在既定边界内活动；所谓“控制”，也不是无产阶级群众对社会生产的自觉组织，而是行政权力对经济过程的上对下规训。表面看，这是“自由”和“秩序”的结合；实质上，这不过是统治阶级重新安排社会经济空间的一种技术形式。

也正因如此，鸟笼经济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中性的经济学概念，而是一个带有鲜明政治性质和阶级性质的制度构想。它并没有触及社会主义经济的根本问题，没有回答“谁掌握生产资料”“谁支配剩余产品”“谁决定社会再生产的方向”这些最本质的问题。它关心的，不是人民作为生产主体如何成为经济生活的主人，而是在不打破既有权力格局的前提下，适度调动市场机制，为整个体制注入活力。于是，问题就从“无产阶级是否真正统治经济”被转换成了“行政机关如何有效驾驭市场”，从“劳动群众如何掌握生产与分配”被偷换成了“国家如何设置市场边界”。这个偷换，正是鸟笼经济全部理论迷惑性的来源。

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鸟笼经济最大的问题，在于它用表面的制度设计掩盖了深层的阶级矛盾。马克思早已指出，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不在于市场失灵、不在于价格紊乱，也不在于调控不足，而在于生产的社会化与占有的私人化之间的对立。现代生产越来越依赖全体劳动者的共同协作，越来越表现为一个彼此联系、彼此依赖的社会总过程；但这一过程所创造的财富和剩余，却被少数占有生产资料的人所攫取和支配。

关于我们：

我们是中国的一个马列毛主义主要毛主义组织，于2024年7月4日在浙江杭州成立，我们的目标就是打倒中修社会帝国主义，恢复无产阶级专政并且组织向共产主义的过渡。

我们的官网：

<https://emancipationoflabour.wordpress.com/>

订阅我们的报纸：

<https://t.me/CPCMarxismLeninism>

有意者可通过以下邮箱来申请加入我们（一旦审核通过，便会成为我们的成员）

投稿邮箱：cpcmlofficial@gmail.com

联系邮箱：CPCMLOfficial@proton.me

这个矛盾，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结构性矛盾，不会因为国家给市场加几道围栏、给资本设几层审批、给价格做若干调节就自动消失。

鸟笼经济恰恰在这里制造了一种幻觉：仿佛只要市场被“关进笼子”，资本主义逻辑就不再危险，阶级对立就能够被技术性地消解，社会矛盾就能够在行政管理中得到平衡。但事实上，笼子的存在并没有消灭资本逻辑，它只是改变了资本逻辑展开的形式。只要交换仍然以价值增殖为导向，只要利润仍然是生产活动的核心动机之一，只要劳动者仍然不能直接决定生产和分配，那么不平等关系就仍然存在，资本关系就仍然在再生产。所谓“笼子”，充其量只是让资本在某种受监管的状态下活动，而不是让人民真正掌握经济。

更进一步说，鸟笼经济的阶级本质，完全可以通过三个问题来揭示：谁造笼子？谁握笼门？谁被限制？这三个问题，足以戳破一切关于“中性调控”“理性设计”的空谈。

首先，造笼子的不是人民群众，而是掌握国家机器、行政权力和资源配置权的上层机构。笼子的大小、形状、松紧，不是劳动者在生产实践中民主决定的，而是由上层政策制定者根据其统治需要划定的。其次，握住笼门的，也不是工人和农民群众，而是那些拥有审批权、财政权、人事权和解释权的官僚体系。市场可以放到什么程度，哪些资本可以进入，哪些行业可以获利，哪些部门能够得到倾斜，最终都取决于掌门者的意志。最后，被限制的恰恰也不是最有力量资本集团和官僚利益，而首先是广大劳动群众。人民的经济活动只能在被许可的范围内展开，任何超出边界的自主组织、自主流通、自主联合，都会被重新纳入管理，或者被视为“不稳定因素”。

所以，鸟笼经济所谓的“控制”，并不是人民控制资本，而是权力控制社会；所谓的“放活”，也不是人民自由发展，而是权力有选择地释放经济活力。换句话说，笼子首先是一种政治装置，



然后才是一种经济安排。它服务的不是劳动群众的解放，而是现存秩序的稳定；它不是要消灭阶级压迫，而是要让阶级压迫以更加灵活、更加隐蔽、更加现代化的形式持续下去。

在改革初期，这种制度安排往往以一种特别容易迷惑人的语言出现。它常常打着“防止市场失序”“避免盲目竞争”“维护国家整体利益”“保障社会主义方向”的旗号，看起来仿佛是在抵御资本主义、捍卫计划性。但问题在于，这种“保护”究竟保护谁？如果所谓“计划”并不意味着工人阶级对生产资料和经济方向的直接掌握，而只是意味着官僚体系对资源分配的垄断，那么这种计划就不是社会主义的计划，而是一种官僚化的统治工具。它并不阻止资本，而是筛选资本；并不消灭利润动机，而是规定谁有资格获取利润；并不废除市场关系，而是把市场关系安排在一个有利于既得利益集团的轨道上。

因此，鸟笼经济绝不是“既反对资本主义，又反对僵化计划”的高明平衡，而是一种典型的折中主义。它既不敢真正把生产资料和管理权交到劳动人民手里，也不敢彻底清除市场关系和资本逻辑；它既想利用市场带来的刺激，又想保持官僚体系对整体局势的控制；既想让资本活动创造财富，又想确保这种财富和权力的流向不脱离统治集团的掌控。这种双重性并不是什么优点，恰恰是它最危险的地方：它使资本在“受控”的名义下发展，使官僚在“调控”的名义下强化，使人民在“稳定”的名义下被排除出真正的经济决策过程。

更深一层看，鸟笼经济对人民创造性和能动性的压制，是其阶级本质的直接体现。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把人民看作等待管理的对象，而是把劳动群众看作历史的创造者，看作真正能够重组生产关系、改造社会生活的主体。社会主义的实质，不是国家替人民管理经济，而是人民自己组织经济；不是上层设计好边界，让群众在边界内活动，而是群众在革命实践中不断扩大自己的支配能力，把社会生产真正变成有意识的共同事业。



而鸟笼经济恰恰反其道而行之。它表面上允许社会活力存在，但这种活力必须经过许可，必须服从边界，必须在上层设定的尺度内发挥。于是，创新不是人民自觉改造生产关系的创新，而是被允许的技术性改良；竞争不是劳动者组织起来改造经济的竞争，而是在既有规则下进行的利益角逐；社会改革也不是群众路线的展开，而是上层根据形势需要做出的有限调整。人民不再是经济发展的主人，而只是制度框架中的活动单位。这样一来，所谓“活力”就被去政治化了，变成了服务于既定秩序的活力；所谓“创造性”也被去阶级化了，变成了不能触碰统治边界的创造性。

这也正是为什么，鸟笼经济必然会孕育出一种特殊的社会结构：一方面，官僚机构掌握“笼子”的设计权和开关权；另一方面，资本力量则在笼中不断寻找扩张空间，逐步学会通过政策、关系、审批和资源配置来积累自身。结果，笼子并没有把资本彻底关住，反而成为资本选择性成长的温床。资本不再以公开的自由放任形式扩张，而是通过与权力的结合、通过政策性倾斜、通过行政性准入，在“受控”的环境中获得更加稳固的发展条件。久而久之，所谓“笼子”就不再是束缚资本的外壳，而是资本和官僚共同占有社会财富的制度化空间。

在这里，必须特别说明一个常被混淆的问题：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不能被拿来为鸟笼经济背书。这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东西。

列宁实行新经济政策，有其极其明确的历史前提和阶级背景。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是一个小农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工业基础薄弱，内战摧残严重，城市与乡村之间、工业与农业之间的联系遭到严重破坏。在这种条件下，无产阶级专政所面对的最大危险之一，不只是旧资产阶级的公开反扑，更是广大小农经济自发势力所带来的离散化、分散化和无政府主义倾向。小生产者每天每时都在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产生投机、倒卖、分化和地方主义；他们不是作为一个统一的阶级有意识地组织起来的，而是在自发交换和个体利益的驱动下，不断把社会拖回市场的、碎片化的、无计划的状态。

因此，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本质上不是对市场的原则性认同，而是在小农国家中过渡性地利用一定范围的商品交换和市场机制，以换取工农联盟的稳定、恢复国民经济、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并通过国家掌握大工业、银行、交通和对外贸易命脉，逐步战胜小农自发性和资本主义萌芽。它是一种策略性退却，是为了更有力量地前进；它承认现实中的落后性，但并不把这种落后性上升为社会主义的常态原则；它暂时容许商品流通和私人经营的有限存在，但从未把它们美化为“社会主义活力”的源泉。

这恰恰说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与鸟笼经济之间存在根本差别。

新经济政策的出发点，是如何在小农汪洋大海中保存、巩固并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鸟笼经济的出发点，则是如何在维持既有权力结构的前提下，把市场机制制度化、长期化地纳入国家框架。

新经济政策面对的是一个尚未完成工业化、工人阶级力量薄弱、小农自发势力极其强大的社会，因此它的任务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这一特定过渡形式，把分散的小生产逐步纳入更高的社会化组织之中；

鸟笼经济则不是为了克服小农无政府状态，而是把市场作为一种持久性的调节原则保留下来，同时用行政权力加以驯化。

新经济政策在理论上从来没有放弃消灭资本主义关系、克服商品经济局限、走向更高程度计划化和社会主义化的目标；

而鸟笼经济恰恰把市场的长期存在合理化，把折中状态本身说成是智慧，把“既不彻底计划、也不彻底市场”的中间形态说成某种稳定模式。

说得更尖锐一点：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无产阶级政权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对小农自发性无政府主义的一种斗争手段；鸟笼经济，则是官僚体制对市场关系和资本力量的一种制度性容纳。前者是过渡性的、被迫的、服务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后者则是折中主义的、常态化的，并最终服务于官僚—资本结构的巩固。



三、历史对照一：苏联新经济政策（NEP）

如果说“鸟笼经济”常常被描绘成一种计划与市场“合理结合”的模式，那么苏联的新经济政策（NEP）则经常被修正主义者和折中主义者拿来充当历史根据，仿佛列宁早就承认：社会主义可以长期建立在市场机制与行政调控并存的基础上。然而，这种解释恰恰是对历史的粗暴歪曲。NEP从来不是一种普遍性的经济模式，更不是什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先声；它是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在极其特殊的社会条件下，为了应付小农占绝大多数、商品经济广泛存在、国内战争破坏严重这一现实，而采取的一种过渡性的、策略性的、带有鲜明斗争性质的政策。

1. 俄国的现实：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在小农汪洋大海之中

理解NEP，首先必须回到1921年前后的俄国现实。十月革命虽然在政治上推翻了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统治，但它并没有神奇地改变俄国的社会结构。俄国仍然是一个以小农为主体的落后国家，工业工人阶级人数有限，工业集中于少数城市，而全国绝大多数人口仍然生活在分散的小农经济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又把这个本已薄弱的经济进一步摧毁：工业产量大幅下跌，铁路运输几近瘫痪，城市严重缺粮，货币体系混乱，城乡交换断裂，整个国民经济处于濒于解体的边缘。

这就意味着，苏维埃政权所面对的，不只是旧资产阶级的残余，不只是白军和外国干涉者，更是一个更深刻、更顽固的结构性问题：无产阶级国家建立在小生产者的海洋之中，而小生产每天每时都在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小农经济天然具有分散性、地方性、私利性和交换冲动，它不是按社会整体的需要来组织的，而是按个体家庭的生存和收益来运行的。只要这种经济基础广泛存在，就会不断滋生囤积、投机、倒卖、贫富分化和资本主义萌芽。

因此，NEP所面对的问题，从一开始就不是抽象的“市场和计划怎么搭配”，而是无产阶级专政如何在小农占多数的现实条件下生存下去、恢复生产、维持工农联盟，并逐步战胜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

2. NEP的本质：不是向市场投降，而是对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策略性斗争

1921年实行的新经济政策，表面上看是“退了一步”：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允许一定程度的自由贸易，允许小规模私人商业和小企业存在，重新恢复一部分商品流通。也正因为这一点，许多人便轻率地把NEP理解成列宁对市场经济的重新肯定，甚至说这是“社会主义也离不开市场”的最好证明。

这种理解恰恰颠倒了问题。NEP的关键根本不在于“允许了市场”，而在于：无产阶级政权在什么条件下、为了什么目的、以什么边界来容忍这种市场关系。

列宁采取NEP，不是因为他在理论上改变了立场，更不是因为他把市场视为社会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是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在内战结束后的俄国，如果继续沿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那种紧急性的直接征集方式，就会彻底破坏工农联盟，使农民经济进一步萎缩，使农村的不满转化为对苏维埃政权的离心力。在一个小农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里，这种后果将是致命的。

所以，NEP首先是一种保存无产阶级专政的政策。它不是原则上的后退，而是战术上的调整；不是向资本主义屈服，而是为了更有效地对付小生产者的自发势力而采取的迂回手段。国家暂时承认一定范围内的商品交换，是为了恢复农业和轻工业生产，重建城乡联系，恢复市场上最基本的流通，使城市与农村之间重新形成物资交换关系，从而给社会主义工业的恢复争取喘息空间。

说到底，NEP不是“赞成市场”，而是在现实落后条件下利用市场，以便不让市场彻底摧毁革命政权。

3. 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的意义：不能靠空想命令消灭小农，必须通过过渡和引导

如果把NEP放到整个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传统中来看，它其实并不突然。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就已经清楚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在面对小农时，绝不能采取简单粗暴的做法，绝不能试图靠行政强迫立刻剥夺小农，更不能把农民一脚踢到反革命阵营里去。马克思主义并不否认小农经济的局限，相反，恰恰是因为它清楚地看到小农生产的分散性和狭隘性，所以才更强调：无产阶级必须通过政治领导、经济帮助和历史上的过渡过程，把农民逐步吸引到更高的社会化生产形式中来。

恩格斯讨论法国和德国农民问题时，始终抓住一个核心：农民尤其是小农，不可能靠空话争取，也不能靠单纯恐吓来改造。小农之所以顽固，不是因为他们天生反动，而是因为他们被自己的生产方式束缚着。他们分散经营、依附土地、害怕失去生计，因此天然会对一切看似要“剥夺他们”的政策抱有恐惧。无产阶级如果不考虑这一现实，不去说明自己的政策如何真正使农民摆脱债务、税赋、高利贷和市场压迫，而是简单宣布“立刻取消一切小私有”，那结果只会把农民推向资产阶级和反动派。

恩格斯实际上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则：对待小农，不能靠命令主义，而要靠过渡；不能靠抽象原则，而要靠阶级领导下的现实组织。无产阶级的任务不是神奇地立刻消灭小农，而是帮助他们看到，大土地所有制、市场压迫和资本关系才是真正毁掉他们的力量；同时，通过合作社、信贷支持、减轻负担、先进工具和共同劳动的示范，逐步把他们引导到更高的生产形式上去。

这正好为理解NEP提供了重要理论背景。列宁面对的俄国，并不是一个可以立即全面社会化农业的成熟资本主义国家，而是一个小农人口压倒多数的落后国家。在这种国家里，若无产阶级政权无视小农现实，强行用意志代替历史过程，那结果不是“更快进入社会主义”，而是把自己孤立起来。因此，NEP并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农民政策的背离，反而恰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处理农民问题时的现实主义和斗争性：既不向小农自发性投降，也不对小农采取幼稚的命令主义，而是在无产阶级国家领导下，通过过渡形式去战胜小生产。

4. NEP斗争的对象，正是恩格斯所说的那种小生产局限在俄国条件下的全面爆发

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所分析的小农局限，在俄国革命后被放大到了一个极端程度。因为俄国不仅农民占多数，而且内战和崩溃还让原本有限的社会化联系几乎断裂。农民更加依附地方、更加依附家庭生产、更加倾向于交换自己的剩余以换取个体利益。在这种环境下，小农自发性、小资产阶级倾向和市场无政府状态不是偶然现象，而是整个社会基础中不断再生的趋势。

因此，NEP真正斗争的对象，并不是某几个私人商人，而是整个小生产经济所不断生成的资本主义倾向。列宁允许一定范围的市场流通，不是因为他不再反对这种倾向，而是因为只有先恢复最基本的交换，才能让国家经济重新运转；只有先稳住农民，才能让工农联盟不至于破裂；只有掌握大工业、银行、交通运输和对外贸易这些制高点，国家才能在恢复过程中逐步压制小生产的离散化趋势，把它重新纳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向之中。

换句话说，NEP不是放任小农自发性，而是在承认其暂时不可避免的前提下，对它进行统治、利用、限制和改造。这和“鸟笼经济”里那种把市场本身视为长期合理存在、把折中状态制度化的逻辑，根本不是一回事。

5. 为什么NEP不能给鸟笼经济背书

把NEP和鸟笼经济混为一谈，至少犯了三重错误。

第一，混淆了特殊时期的过渡政策和长期制度原则。NEP是战争废墟、小农多数、经济崩溃条件下的临时策略，是为无产阶级国家争取时间和空间的办法；鸟笼经济则试图把“计划加市场”的折中状态长期化、正常化，仿佛这本身就是一种稳定形态。

第二，混淆了无产阶级专政对小生产的斗争和官僚体系对市场的管理。

NEP的核心，是无产阶级国家在保有经济制高点的前提下，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作斗争；鸟笼经济的核心，则往往是上层官僚以“调控”之名长期掌握资源分配权，同时允许资本在被许可的范围内发展。

第三，混淆了利用市场作为手段和承认市场作为原则。NEP中的市场，是不得不暂时利用的对象；鸟笼经济中的市场，则越来越容易被说成一种长期必需、甚至值得歌颂的机制。

这就决定了两者的历史方向完全不同。NEP的方向，是在巩固政权和恢复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社会主义组织程度，逐步克服小商品生产的局限；鸟笼经济的方向，则往往是让市场关系制度化，让资本逻辑在行政框架内重新生长，最后反过来侵蚀计划和公有制的内容。

6. 从NEP和恩格斯那里得到的真正启示

NEP和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共同告诉我们的，不是“市场很有用”这种浅薄结论，而是一个更严肃的马克思主义原则：

在小农广泛存在的社会里，无产阶级不能靠主观主义跳过历史阶段，也不能靠折中主义把小生产永久保留下来；它必须在阶级斗争中，通过过渡形式、国家领导和经济组织，一步步战胜小资产阶级自发性。

恩格斯反对对小农采取幼稚的强制剥夺，因为那会把农民赶到反革命一边；列宁实行NEP，也不是为了赞美市场，而是为了在不丢掉农民的情况下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并为更高程度的社会主义组织创造物质前提。二者在精神上是一致的：都承认现实的复杂性，但都没有把这种复杂性神圣化；都允许过渡，但都不把过渡变成原则；都重视农民问题，但都没有向小生产自发性投降。

因此，NEP的历史地位，绝不是为“鸟笼经济”提供合法性。恰恰相反，它说明：只有在明确的无产阶级政治统治之下，市场和商品交换的有限利用才可能具有过渡意义；一旦失去这种阶级内容，所谓“计划与市场结合”就极有可能沦为官僚控制与资本积累的结合。

综上所述，苏联新经济政策是俄国特殊社会现实的产物，是无产阶级政权在小农汪洋大海中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斗争的一种策略形式。它既不是对市场的原则性认同，也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常态模型，更不是后来折中主义“鸟笼经济”的历史来源。相反，NEP与恩格斯关于农民问题的分析一起表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从不神化市场，也不迷信行政命令，而是在阶级斗争中寻找把小农引向社会主义、把分散生产引向社会化组织的现实道路。

四、历史对照二：中国改革开放早期（1980s）

中国改革开放早期的“鸟笼经济”，如果从马克思主义立场来分析，最值得指出的一点，并不只是它在形式上如何安排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而是：它在实质上迁就了小农的偏见，迁就了小生产者的自发性，也迁就了由商品交换所不断滋生出来的无政府主义倾向。表面上，它讲的是“计划为主，市场为辅”，讲的是“让鸟飞，但只能在笼子里飞”；但如果深入到其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就会发现，这个所谓“鸟笼”的真正功能，并不是用社会主义原则去压倒和改造小生产，而是承认小生产现实，容纳小生产逻辑，并试图在这种现实之上重新组织经济运行。

这里首先要把问题说清楚：所谓“小农的偏见”，并不是单指农民个人的道德缺陷，更不是一种简单的身份标签，而是小生产条件长期作用下形成的一整套社会意识和经济习惯。它的核心特征，就是眼界狭小、注重眼前、偏重局部、缺乏整体观念和长期组织观念。在这种意识支配下，人们更容易从家庭、小团体、小地方、小买卖的角度来理解经济活动，而不是从社会化大生产和整个社会共同利益的角度来看问题。他们天然地倾向于自由交换、灵活经营、自己支配、各自谋利，倾向于把“能不能多卖一点、能不能多留一点、能不能自己说了算”看得比整体计划、统一组织和长远改造更重要。

这并不是偶然的思想偏差，而是小商品生产方式本身不断再生产出来的结果。只要劳动仍然主要以分散的、个体的、家庭式的形式存在，只要生产者还主要围绕自己的小块土地、小份财产、小本经营来安排生活，那么这种偏见就会一再出现。它不是靠几句口号就能消失的，也不是靠简单命令就能克服的。但也正因为如此，真正的社会主义建设才必须把它视为一个需要长期斗争和改造的问题。社会主义的任务，不是去顺着这种偏见走，不是把它包装成“积极性”，更不是承认它的合理性然后想办法“管理好”它；社会主义的任务，恰恰是通过集体化、社会化、统一计划和群众组织，把劳动群众一步步从这种小生产眼界中提升出来，使他们由分散的个体经营者，逐渐变成能够掌握社会化生产的主人。

但鸟笼经济恰恰没有走这条路。它没有把小农意识和小生产自发性放在一个必须被逐步克服的位置上，反而在相当程度上承认了这些东西的现实合理性，并把这种承认转化成制度安排。所谓“搞活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承认地方可以更灵活一点、经营可以更自主一点、交换可以更自由一点、局部利益可以在不冲破总体边界的前提下得到更大释放。于是，表面上看是“经济活了”，实际上则是小生产的逻辑重新活了，小农的眼界重新活了，商品交换的冲动重新活了。

这里最关键的问题就在于：这种“活”，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活？

如果一种所谓的活力，主要表现为各自找门路、各自算小账、各自追求局部利益、各自围绕交换和利润来调整自己的行为，那么这种活力本身就不是社会主义意义上的活力，而是小生产自发性的活力。它不是劳动群众作为一个整体自觉组织社会生产的活力，不是以社会整体利益为尺度来安排经济活动的活力，而是分散的、局部的、交换性的活力。它当然会带来一定的流动性、弹性和刺激作用，但它同时也会把整个社会重新拖向碎片化、地方化和逐利化的轨道。

这也正是“鸟笼经济”真正危险的地方。它表面上仍然保留了“计划”的名义，似乎并没有完全放弃社会主义原则；但实际上，这个“计划”已经不再是压倒小生产、改造小生产、组织全社会生产的决定性力量，而越来越变成一个外在的边界装置。它不是要把小生产自发性一步步纳入更高层次的社会化组织之中，而只是要让这种自发性不要完全失控。也就是说，它并不是在消灭问题，而是在管理问题；不是在改造小农偏见，而是在给小农偏见划一个合法活动范围。

因此，所谓“笼子”的存在，并不能证明这种制度是社会主义的。恰恰相反，它只能证明统治者承认：这只“鸟”已经不能不飞了，只能设法让它在自己划定的范围里飞。这样一来，计划和市场的关系就发生了根本变化。计划不再是社会化生产压倒商品交换的力量，而成了商品交换活动的边界管理者；国家不再是组织劳动群众改造社会生产关系的工具，而成了调节各种局部利益、分散冲动和交换欲望的总裁判。这个变化的本质，不是社会主义的成熟，而恰恰是社会主义方向的退却。

从这个角度看，鸟笼经济并不是在真正意义上“平衡计划与市场”，而是在平衡两种根本不同的社会逻辑：一边是社会主义要求的统一性、组织性、集中性和整体性，另一边则是小生产不断再生出来的分散性、自发性、地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式交换冲动。问题在于，这种平衡本身就是一种让步。因为社会主义不可能把小生产偏见长期当作合理基础，不可能一边宣布要走社会化大生产的道路，一边又长期容纳“自己算自己的账、地方搞地方的、谁灵活谁得利”的逻辑。只要后者不被逐步压倒，它就一定会反过来侵蚀前者，把计划变成形式，把社会化目标变成空话。

也正因为如此，鸟笼经济常常用“调动积极性”来为自己辩护，但这个说法本身就是含混的。什么叫积极性？如果所谓积极性，主要是追逐交换利益的积极性，是地方分利的积极性，是围绕利润和价格波动展开行动的积极性，那么这种“积极性”本身就带有深刻的小生产性质。它不是社会主义劳动热情的提高，不是劳动者作为主人翁自觉参与社会管理的表现，而是小商品生产者受市场刺激下的活动增强。这样的积极性，

当然可能在短期内带来某种繁荣景象，但它不会自动导向社会主义；相反，它更可能不断巩固人们对小生产方式的依恋，不断强化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对整体组织的冲击。

所以，鸟笼经济的根本错误，不仅仅在于某些政策设计不够周密，也不仅仅在于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偏差，而在于它在方向上就已经放弃了一个关键问题：社会主义必须教育群众、组织群众、改造群众，使他们摆脱小生产习惯，而不是把小生产习惯本身当作制度设计的出发点。鸟笼经济并没有坚持从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出发去重塑经济关系，而是在既有的小农偏见和商品交换冲动之上寻找一个可运转的折中方案。它不要求人们从“小日子、小算盘、小买卖”的世界中走出来，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承认这些东西，并试图通过行政管理把它们纳入总体秩序。

这就使得它天然带有鲜明的折中主义性质。它既不敢彻底放弃社会主义的语言，因为那样会丧失自己的合法性；又不愿真正坚持社会主义改造，因为那就必须同小生产的自发性和偏见展开长期而艰难的斗争。于是，它只能在两者之间徘徊：一方面讲计划、讲控制、讲整体，另一方面又给小生产逻辑留出空间，给商品交换冲动留出余地，给地方主义和局部利益留出合法渠道。结果，计划越来越像一个外壳，市场越来越像实际的驱动力；社会主义越来越停留在名义上，而小生产自发性却越来越成为现实中的重要基础。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改革开放早期的鸟笼经济，不能被看作一种真正的社会主义探索，而应当被看作一种在社会主义名义下对小农偏见、小生产习惯和商品经济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制度性迁就。它并不是去克服小生产，而是在管理小生产；并不是去压倒商品交换的自发性，而是在承认这种自发性的前提下给它设边界；并不是把劳动群众一步步提升为社会化生产的主人，而是在既有的分散意识基础上重新组织秩序。

因此，这一阶段最值得批判的，不是个别政策得失，而是它背后的根本逻辑：没有把小农的自发性视为社会主义必须克服的对象，反而把它当作经济活力的重要来源；没有把商品交换中的无政府主义倾向视为需要压倒的力量，反而试图通过一个行政性的“笼子”去长期调和它。这样的制度安排，注定不可能真正导向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只能建立在不断提高社会化、集中化、组织化程度的基础上，而绝不可能建立在对小生产偏见的长期迁就之上。

综上所述，中国1980年代早期的“鸟笼经济”，其本质并不只是“计划与市场结合”，而是在社会主义外衣之下，对小农偏见、小生产习惯和商品经济自发势力所作出的制度性让步。它不是克服小生产的道路，而是对小生产的一种有管理的迁就；不是压倒无政府主义式交换逻辑的道路，而是在国家边界内承认并安置这种逻辑。正因为如此，它从一开始就带有深刻的折中主义性质，也从一开始就埋下了资本逻辑不断扩张的基础。

五、鸟笼经济的现实危害

鸟笼经济的危害，不仅仅在于它在理论上表现出折中主义的暧昧和软弱，更在于它在现实中对社会结构、阶级关系和人民主体性造成了深远而持久的破坏。它看上去像是一种“既保持秩序、又释放活力”的制度安排，仿佛是在僵化计划和自由放任之间找到了一条务实道路；但实际上，这种表面的平衡恰恰掩盖了最本质的问题：人民并没有成为经济生活的真正主人，反而被限制在制度边界之内；而真正能够自由活动、自由扩张、自由操控资源流向的，恰恰是权力阶层与资本力量。表面上飞翔的是“市场之鸟”，实际上被关在笼中的却是人民群众，而那些设计笼子、掌握笼门的人，则在“调控”和“管理”的名义下重新支配整个社会。

也正因为如此，鸟笼经济绝不能被看作某种无害的制度实验。它的现实危害，是多层次的、结构性的，是贯穿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各个层面的。它不只是某些政策偏差的总和，而是一条清晰的历史方向：把社会主义的外壳保留下来，把资本主义的内容一步步填充进去；把无产阶级的名义挂在墙上，把资产阶级专政的现实安置在制度深处。从这个意义上说，鸟笼经济正是资本主义和平演变在经济领域中的典型形式，是修正主义最具迷惑性的制度表达。

第一，鸟笼经济压缩了人民的能动性，把群众从历史主体降格为制度附庸

鸟笼经济最直接、最深刻的危害之一，就是它压缩了人民群众的自主性和创造性。社会主义的根本意义，不在于国家替人民管理一切，而在于劳动群众真正成为社会生产和分配的主人，真正有能力、有权力去决定“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了谁生产”。而鸟笼经济恰恰把这一切重新收回到上层设计者和资源控制者手中。它一方面在口头上说要“搞活”，说要“调动积极性”，说要给经济以活力；另一方面又通过计划指标、行政许可、审批制度、资源配给、财政边界和政策限制，把群众的活动牢牢圈定在既定轨道内。

于是，人民群众并不是作为主人去掌握经济，而是作为被管理对象去适应经济；他们不是去主动塑造制度，而是被迫在制度许可范围内寻找缝隙求生存、求发展。所谓“自主权”，往往只是局部的、次级的、可撤销的自主权；所谓“活力”，

往往只是上层允许释放出来的一部分活力。工人不能真正掌握企业，农民不能真正决定国家经济方向，普通劳动者也不能真正支配社会财富的流向。他们最多只能在有限空间内“发挥作用”，而不能从根本上决定整个社会如何运行。

这就意味着，鸟笼经济表面上承认人民有某种活动能力，实际上却否定了人民的主体地位。它承认群众可以“动”，但不承认群众可以“主”；承认群众可以在规则内发挥聪明才智，但不承认群众有权去改变规则本身。这样一来，群众的创造性就被削减成了一种被利用的资源，而不是一种改造社会的力量。毛泽东曾经指出，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常常是幼稚可笑的。如果从这个标准看，鸟笼经济恰恰做了相反的事情：它不相信群众能够组织社会化生产，不相信群众能够掌握经济命脉，不相信群众能够真正成为社会主人，于是它用一个“笼子”去规范群众的行动，把他们的英雄性限制在被批准、被许可、被管理的狭小空间之内。

第二，鸟笼经济扩大了官僚寻租空间，使权力成为资本增殖的中介

鸟笼经济的第二个现实危害，是它必然扩大官僚寻租空间。因为所谓“笼子”，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制度装置，而是由具体的人来设计、解释和执行的。谁掌握计划，谁决定边界；谁握住笼门，谁就决定哪些资源可以流动、哪些项目可以获批、哪些企业可以发展、哪些利益可以被照顾。只要经济活动并不是由劳动群众直接掌握，而是由一套脱离群众监督的行政—官僚体系居中控，那么这个“笼子”就天然会变成权力寻租的工具。

鸟笼经济看起来像是在限制市场盲目性，但实际上它更常见的效果，是把市场活动导入一个必须经过权力筛选和许可的通道。这样一来，资源不再主要按社会需要配置，而是越来越按权力关系、审批关系、地方关系和利益网络来配置。谁接近权力，谁就更容易进入“笼内”合法活动；谁掌握更多行政杠杆，谁就更能够利用“计划”和“市场”的双重结构，为自己和自己所代表的集团攫取超额利益。

这不是个别人品败坏的问题，也不是某几个干部腐败的问题，而是制度本身的逻辑问题。因为当市场被承认有活力，而这种活力又必须通过“笼子”来放行时，那么“笼子”的看门人就必然成为最有权势的一群人。计划越不是人民群众直接掌握的计划，而越是官僚机关的计划，笼子就越不是束缚资本的笼子，而是权力与资本交易的场所。于是，本来应当被压制的资本逻辑，并没有被真正消灭，反而借助权力的保护和筛选，找到了更安全、更隐蔽、更稳固的生长方式。权力成了资本增殖的中介，资本则反过来强化了权力的特殊地位。

所以，鸟笼经济并不是在防止资本主义，而是在培育一种与官僚体制相结合的资本主义。它不是在克服资产阶级法权，而是在用行政形式重新分配资产阶级法权；不是在消灭剥削条件，而是在让剥削条件通过政策、许可和制度外衣获得更加稳定的存在。这里的修正主义，不只是几句理论上的模糊话，而是在整个制度结构中，把社会主义的管理形式变成了资本积累的保护形式。

第三，鸟笼经济掩盖阶级矛盾，把深层冲突伪装成“发展中的问题”

鸟笼经济的第三个危害，是它极其善于掩盖阶级矛盾。它总是以“稳定”“发展”“搞活”“平衡”“协调”的语言出现，把根本性的阶级问题包装成技术性的问题、阶段性的问题、局部性的问题。于是，本来属于生产关系和统治关系的矛盾，被说成是改革中的阵痛；本来属于资本积累和阶级分化的后果，被说成是发展中的代价；本来属于人民失去主体地位的问题，被说成是体制不够完善的问题。

这种掩盖非常危险，因为它让人民群众难以直观看见问题的根源。表面上看，鸟笼经济似乎维持了秩序，也推动了增长，仿佛一切冲突都只是“前进中的波折”。但实际上，它并没有消灭社会矛盾，而只是把矛盾压抑起来、推迟爆发、改变形式。资本积累在加深，贫富分化在扩大，权力和财富在集中，劳动群众在承担改革成本、市场风险和制度不公，而这些现实却被“活力”“效率”“发展”这样的词汇遮蔽了。

更重要的是，由于人民群众并没有真正的制度性主导权，他们也就难以通过现有框架去充分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于是，矛盾不能通过群众对经济的直接掌握来解决，而只能不断积压、不断异化、不断转移。表面上的稳定，不是矛盾被克服了，而是矛盾被压住了；表面上的繁荣，不是阶级对立消失了，而是阶级对立被增长数据、消费扩张和局部改善掩盖了。可是被掩盖的东西不会因此消失，相反，它只会在更深处积累，最终以更加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

因此，鸟笼经济最具迷惑性的地方就在于：它一边制造矛盾，一边又遮蔽矛盾；一边推动资本逻辑扩张，一边又用计划和国家的语言掩饰这种扩张；一边削弱人民主体性，一边又宣称自己是在为人民谋利益。这种结构，本身就是修正主义最典型的特征：不公开反对社会主义，却在实际上抽空社会主义；不公开宣布资产阶级专政，却在制度运行中不断巩固资产阶级专政。

第四，鸟笼经济强化资本逻辑，使社会主义原则退化为装饰性的口号

鸟笼经济最根本、最致命的现实危害，在于它最终强化的是资本逻辑，而不是社会主义原则。它虽然保留了计划、保留了国家调控、保留了公有制语言，甚至还可能保留大量看似“社会主义”的形式，但只要资源配置越来越围绕利润、价格、增长、竞争和积累来展开，只要劳动群众不能真正控制生产资料和经济方向，那么制度运行的实际核心就不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本逻辑。

资本逻辑的本质，不只是私人企业赚钱，而是整个社会生产越来越围绕价值增殖而组织，越来越把人当作积累过程中的手段。鸟笼经济表面上说“笼子还在”，似乎计划仍然高于市场，但实际上，只要市场机制被承认是活力来源，只要小生产自发性被承认是积极因素，只要权力与资本之间的结合不断加深，那么“计划”就会越来越多地变成一种为积累服务的管理手段，而不是为人民共同需要服务的社会组织原则。

这时，社会主义原则就会发生严重退化。全民所有制的实质内容被空洞化，变成名义上的“国家掌握”；劳动者的主体地位被削弱，变成口头上的“主人翁”；共同富裕的方向被模糊，变成增长之后再说的遥远目标；阶级斗争的视角被压制，变成不合时宜的旧话。最后，制度表面上仍然可以说自己是社会主义，但它的实际运转，却越来越符合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逻辑：少数人控制资源，多数人服从安排；权力与财富相互支撑，劳动者不断适应市场；社会化劳动所创造的成果，不是由人民整体支配，而是越来越被权力集团和资本力量所攫取。

因此，鸟笼经济绝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市场”的中性经验，而是社会主义内容向资本主义内容让位的现实过程。它不是简单的政策偏差，而是路线问题；不是短期的权宜之计，而是和平演变的制度渠道。所谓“和平演变”，正体现在这里：不必公开宣布改旗易帜，不必立刻废除一切社会主义名号，只要一步步把资本逻辑引入进来，把群众地位边缘化，把权力—资本结构制度化，那么社会主义就会在外壳不变的情况下逐渐丧失其真实内容。这正是修正主义最危险的地方：它不靠公开背叛，而靠不断“调整”；不靠突然翻盘，而靠持续侵蚀；不靠一次性推翻无产阶级专政，而靠把它一点点改造成资产阶级专政。

第五，鸟笼经济的阶级实质：不是“国家调控市场”，而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制度形式

归根到底，鸟笼经济的现实危害之所以如此深刻，正是因为它的阶级实质根本不是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对市场的合理调控”，而是资产阶级专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种制度形式。这里说的资产阶级专政，并不一定意味着所有资本家都赤裸裸地坐在台前，也不一定意味着马上完全私有化；更根本的标准在于：国家机器究竟服务于哪个阶级，经济运行究竟围绕哪个阶级的利益来组织，劳动群众究竟是作为主人参与其中，还是作为被支配对象被整合进去。

如果一个制度在名义上仍讲社会主义，但在实际上却不断削弱劳动群众的主体地位，不断扩大权力—资本结合，不断把经济活力建立在商品交换、小生产自发性和利润刺激的基础上，不断用行政管理为资本扩张保驾护航，那么它的阶级内容就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资产阶级专政。鸟笼经济正是这样一种东西。它用“计划”的外壳掩护“市场”的核心，用“国家”的名义保护“资本”的运动，用“稳定”的口号压制“群众”的主动性。

所以，鸟笼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的一种失误性尝试，而是修正主义路线的现实展开；不是对社会主义的补充，而是对社会主义的蛀空；不是简单的制度创新，而是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经济形式。它的危害，不在于某些指标好坏，不在于一时一地的政策得失，而在于它把整个社会一步步从“群众掌握命运”的方向，拉向“权力与资本共同统治”的方向。

总体来看，鸟笼经济的现实危害，是全面的、深层的和结构性的。它压缩人民能动性，把群众从主人变成附庸；它扩大官僚寻租空间，使权力成为资本增殖的中介；它掩盖阶级矛盾，把统治问题伪装成发展问题；它强化资本逻辑，使社会主义原则沦为装饰；它最终所推动的，不是什么真正的社会主义建设，而是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修正主义的制度化和资产阶级专政的稳固化。正因为如此，鸟笼经济绝不能被看作一种“聪明的折中”，而应当被看作一种具有明确阶级后果的历史错误。它不是让群众真正展翅高飞，而是把群众关进笼中，再把笼外的世界交给权力和资本去支配。

六、马克思列宁主义视角下的批判

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则来看，所谓“鸟笼经济”，绝不是什么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高明权宜之计，也不是什么可以长期维持的“计划与市场平衡术”。它的本质，是一种典型的折中主义方案：一方面不敢公开放弃社会主义的名义，另一方面又不愿真正按照社会主义原则去改造生产关系、压倒商品逻辑、限制资本关系，于是便试图在计划与市场之间、在社会主义语言与资本主义内容之间、在人民名义与权力—资本支配之间，维持一种暧昧而不稳定的中间状态。可是，马克思主义恰恰告诉我们，凡是在根本方向上暧昧不清的制度设计，最后都不会停留在中间地带，而只能倒向占支配地位的阶级力量。鸟笼经济之所以必须被批判，不在于它“控制得不够好”，而在于它从出发点上就不是无产阶级解放的道路。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谈“自由人联合体”时，写下过一个极重要的设想：未来社会应当是“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这不是一句单纯的伦理愿望，而是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核心特征的概括：生产资料必须是公共的，劳动必须是社会化地组织的，生产者必须是自觉地、联合地支配整个生产过程的。换句话说，社会主义并不是国家替人民把市场关进笼子，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自己掌握生产资料和社会劳动的配置。如果离开了这一点，哪怕还保留“计划”“公有”“国家调控”之类的名词，也已经偏离了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方向。

从这个标准反观鸟笼经济，它的问题就非常清楚了。它表面上允许市场活动，似乎是在“搞活”经济；但实质上，它并没有把生产过程真正交到劳动群众手里，也没有把社会化生产建立在生产者联合控制的基础上。相反，它把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压缩在行政许可和制度边界之内，把真正的经济主导权保留给掌握政策、审批、资源和资本运作权的上层力量。于是，人民群众不是作为社会生产的主人出现，而是作为笼中被许可活动的对象出现；他们可以“动”，却不能“主”；可以在划定的轨道内奔忙，却不能决定轨道本身。这样的制度安排，不是对生产力的解放，而是对生产力的扭曲，因为它压制的恰恰是劳动者作为主体的历史主动性。

列宁对这个问题看得更尖锐。列宁从来不把社会主义理解成一种抽象的“国家管理市场”的技术体系，而始终把它理解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对旧社会力量的压制、改造和战胜。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列宁明确指出，资产阶级之所以顽强，不仅在于国际资本和旧习惯的力量，更在于“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这句话极其重要，因为它把问题一下子从一般的“市场活力”拉回到了阶级斗争的地面上：真正危险的，不只是几个现成的资本家，

而是小商品生产、小私有倾向和分散交换每天都在重新生产资本主义关系。

因此，在列宁那里，社会主义建设绝不是去迁就这种自发势力，而是必须同它作长期斗争。1921年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文献中，列宁直接把这种倾向称作“小资产阶级的即无政府主义的自发势力”，并指出它“利用自由贸易的口号，无时无刻不在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这句话的锋芒非常明确：只要小生产逻辑还在，自由贸易、地方分散、各自为政、灵活经营这些口号，就会天然地成为反对无产阶级集中领导和反对社会化生产的思想通道。也就是说，列宁不是把这种自发势力看作值得长期保留的“经济活力”，而是把它看作无产阶级专政必须警惕和压制的对象。

这恰恰是鸟笼经济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本冲突的地方。鸟笼经济的逻辑，不是去压倒小生产自发性，而是去管理它；不是去改造商品交换的无政府主义倾向，而是给它划一块合法活动空间；不是要求劳动群众逐步摆脱“小买卖、小算盘、小地方”的眼界，而是在这种眼界之上重新组织经济秩序。它表面上讲“计划”，实际上却承认市场必须活、交换必须松、地方必须灵、局部利益必须有活动余地。于是，计划就不再是无产阶级组织社会劳动的武器，而是变成了对小生产自发势力的一种外在约束和行政调节。这样的“笼子”，从列宁的眼光看，根本不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桥，而是修正主义对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制度性让步。

列宁关于 NEP 的原文，更能把这个区别照得很亮。在《论粮食税》中，他不是把新经济政策写成某种永久公式，而是明确说：这“就是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为反对小私有者的（宗法式的和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而和国家资本主义订立的一种合同、同盟或联盟”。这句话必须抓住两个要点。第一，列宁说得很清楚，NEP 的背景不是抽象的“经济调整”，而是反对小私有者的自发势力；第二，它之所以能够采取这种过渡形式，是因为前提仍然是“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也就是说，市场、贸易、租让、国家资本主义这些东西在列宁那里并不天然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它们之所以还能被暂时利用，只是因为无产阶级国家还握着政治统治和经济命脉，并且把这些东西当作对付小生产汪洋的特殊武器。

列宁甚至在更早的文本里就把这个问题挑明了。在《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中，他说：“小私有者的和私人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会“通过很多渠道来破坏法律上的规定”，因此“国家资本主义将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这句话常被人拿去替市场辩护，但实际上它的逻辑恰好相反：列宁不是在赞美国家资本主义本身，而是在说，在一个被小生产和投机冲动包围的落后国家里，受无产阶级国家控制的、更高程度集中和有监督的经济形式，总比任由小私有者和自由交换的自发势力四处泛滥要“进步”。

这里的“进步”，不是向社会主义终点更近的完成态，而是相对于小商品无政府状态而言的一种更可控的过渡形式。把这种论断偷换成“社会主义应该长期搞市场”，正是对列宁最粗暴的歪曲。

所以，真正从列宁主义出发，就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凡是把小生产自发性、自由交换冲动和地方分散倾向长期制度化的方案，哪怕还套着计划的外壳，也已经偏离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向。因为列宁始终把问题理解为“谁战胜谁”的问题，而不是“如何温和协调各方面利益”的问题。对列宁来说，无产阶级专政不是摆设，不是礼仪性的名词，而是必须在经济领域里真正压倒资本主义关系及其社会基础。鸟笼经济的问题就在于，它把这种“谁战胜谁”的尖锐问题，化解成了一个行政管理问题，把本来应当被斗争和改造的对象，变成了被承认和安排的对象。这样一来，市场不再是暂时利用的手段，而逐步成了合理化的原则；计划不再是决定性的统治形式，而退化成边界管理和风险控制。

如果再从毛泽东那里看，这个问题同样说得通。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开宗明义提出，革命首先要解决“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的问题，这实际上就是把一切政治和经济问题都放回到阶级分析上去。用这个标准看鸟笼经济，问题便不在于它是否“有效率”，而在于它究竟服务谁。若一种制度安排的结果，是人民群众不能真正掌握生产和分配，而权力层和资本力量却能够借“计划—市场结合”的结构操控资源、塑造规则、攫取利益，那么这种制度无论口头上怎样自称社会主义，它的阶级效果都不是向人民倾斜，而是向新的统治者倾斜。也就是说，离开阶级分析来称赞鸟笼经济，恰恰是最不马克思主义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鸟笼经济折射出的，不仅仅是某种政策失误，而是折中主义、官僚主义和资本逻辑结合起来之后形成的制度危险。它既不真正解放生产力，也不真正推进社会主义；它所释放出来的，不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力量，而是小生产的冲动、市场逐利的刺激和权力筛选资源的能力。它对群众的态度，不是发动群众掌握命运，而是允许群众在既定边界内“发挥积极性”；它对资本的态度，也不是从根本上限制和压倒，而是在“有计划地利用市场”的语言中给资本逻辑留下了生长空间。这样的制度一旦稳定下来，社会主义就只剩下语言，修正主义则进入了结构本身。

因此，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出发，鸟笼经济绝不能被当作社会主义的“经验”加以歌颂。它的本质，不是什么社会主义的灵活形式，而是一种修正主义的经济路线：它在名义上保留社会主义，在现实中迁就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在口头上讲计划，在实践中给市场和资本逻辑以稳定空间；在形式上说国家调控，在结果上却让劳动群众失去真正的经济主导权。沿着这条路线走下去，所谓“鸟笼”就不可能长期压住“鸟”，

反而会让笼子本身逐步成为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通道。因为只要小生产的自发势力被长期承认，只要商品交换和逐利机制被长期制度化，只要人民不再是生产资料和社会劳动的真正主人，那么制度的阶级内容就必然不断右转，最终表现为资产阶级专政对社会生活的重新支配。

归根到底，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只能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劳动人民是生产的主人，生产资料掌握在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手中，社会劳动在自觉的、统一的、面向共同利益的原则下被组织起来。马克思讲“自由人联合体”，列宁讲无产阶级专政同小生产自发势力的斗争，指向的都是这个方向。鸟笼经济则恰好相反：它不是让人民成为主人，而是让人民在笼中活动；不是让社会劳动接受生产者共同控制，而是让它接受权力与资本共同塑造的边界控制。所以，对鸟笼经济的批判，不能停留在“效率高不高”“管理好不好”的层次，而必须上升到路线和阶级性质的层次：它不是社会主义的偏差修补，而是修正主义在经济制度中的集中表现。

七、结论

综上所述，所谓“鸟笼经济”，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一种在计划与市场之间求得平衡的“现实智慧”，似乎既能避免自由放任的混乱，又能克服僵化体制的停滞；但只要从阶级分析出发，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生产关系、国家性质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则出发，就不难看出，这种所谓“智慧”不过是一种极具迷惑性的折中主义。它既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也不是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中运用的革命性策略，而是官僚主义、修正主义与资本逻辑相互结合之后所形成的一种制度外壳。

鸟笼经济最根本的问题，不在于它“有没有笼子”，也不在于它“放得多一点还是收得紧一点”，而在于这个笼子的阶级内容究竟是什么。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承认脱离阶级内容的抽象制度形式。计划本身不是神圣的，市场本身也不是天然邪恶的；关键在于，谁在运用计划，谁在容纳市场，谁从这种制度安排中获利，谁又在这种制度安排中被剥夺。只要经济的实际主导权不在劳动人民手中，只要群众不能作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去支配社会劳动和社会财富，只要生产资料并未真正成为人民整体有意识掌握的工具，那么无论制度表面上保留多少“计划”“公有”“宏观调控”的名词，都不能改变其根本性质。

也正因为如此，鸟笼经济表面上允许经济活动显得活跃，实际上却并没有真正解放社会生产力。因为真正的生产力解放，从来不是让市场多飞一点、价格多动一点、地方多灵活一点，而是让劳动群众真正成为生产和分配的主人，让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创造性和组织性不再被压缩在权力设定的边界之内。鸟笼经济恰恰做了相反的事情：它承认“活力”，却不承认人民掌权；它承认“活动空间”，却不承认群众能够决定整个社会经济的方向；它承认“放活”，却把这种放活限定在官僚与既得利益集团所设定的轨道中。于是，表面上是鸟在飞，实际上是人民在笼中；表面上是经济有活力，实际上是群众的创造力被制度性地“许可化”、碎片化和驯化了。

历史经验已经非常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无论是从苏联新经济政策的特殊历史背景来看，还是从中国改革开放早期“鸟笼经济”的具体实践来看，决定政策性质的，从来不是它有没有承认某种市场因素，而是它服务于哪个阶级、朝着什么方向、在什么国家性质之下展开。这里必须再次把那个关键问题说死：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绝不是鸟笼经济的历史根据。这一点不能有半点含糊。

列宁实行新经济政策，是在一个小农人口占压倒多数、工业极端薄弱、内战破坏严重、城乡关系濒临断裂的国家中进行的。它的出发点，不是把市场合理化，不是把折中主义制度化，更不是对所谓“市场活力”的欣赏，而是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建立的前提下，稳住工农联盟，恢复国民经济，并在现实条件下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作斗争。你前面反复提醒的那个点，必须在结论里再次钉牢：NEP 是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自发性斗争时期的特殊产物，是在小农国家中为反对小农的偏见、分散性、商品交换冲动和无政府主义倾向而采取的一种过渡性策略。它不是社会主义常态，更不是修正主义拿来美化市场的护身符。它的全部意义都在于：利用某些让步，去争取条件以便最终战胜小生产，而绝不是向小生产屈服，更不是把小生产自发性永久安置进社会主义制度内部。

正因为如此，中国改革开放早期的鸟笼经济，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不仅不是同一种东西，而且在历史方向上恰恰相反。NEP 的核心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对小农自发性和资本主义萌芽进行特殊形式的斗争。鸟笼经济的核心则是：在修正主义路线支配下，对小农偏见、小生产习惯和商品交换的无政府主义冲动作制度性迁就。NEP 中对市场的容忍，是出于斗争和过渡的需要；鸟笼经济中对市场的容纳，则是折中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制度选择。NEP 面对的是“如何在不丢掉政权的前提下战胜小生产”；鸟笼经济面对的却不是这个问题，它恰恰是在承认小生产逻辑的基础上，用行政性的“笼子”去管理、安排、利用这种逻辑。前者是战术性的退却，为了重新进攻；后者则是方向性的让步，并最终使资本逻辑在制度之内获得稳定生长空间。

这也就说明，鸟笼经济的现实效果，绝不是什么无害的“中间道路”，而是一条清晰可见的历史路径：它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名义下承认商品交换、利润刺激、地方灵活性和局部利益冲动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又利用国家和官僚体系来为这些东西划边界、定秩序、配资源。结果，劳动人民并没有真正获得经济主导权，反而是在“活力”“发展”“改革”的话语中被继续排除在真正的决策权之外；而官僚体系和资本力量则在“计划与市场结合”的缝隙中不断壮大。于是，鸟笼经济不是在限制资本主义，而是在以一种更隐蔽、更和平、更带有社会主义外衣的方式推进资本主义关系的恢复和扩张。

从这个意义上说，鸟笼经济并不只是政策失误，也不只是某些干部的坏心或腐败行为，它本身就是修正主义经济路线的制度化表现。修正主义最危险的地方，恰恰不在于它直接举起反社会主义的旗帜，而在于它总是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来抽空社会主义的内容。它不公开反对公有制，却把公有制变成官僚和权力结构所垄断的形式；它不公开反对人民当家作主，却把人民的作用缩减为被动服从和有限参与；它不公开称赞资本主义，却把资本逻辑、利润原则和交换冲动一步步嵌入制度运行的核心。鸟笼经济正是这样一种修正主义形式：它表面上保留“计划”的语言，实际上却让市场逻辑和资本逻辑逐步侵蚀计划；它表面上讲“社会主义”，实际上却不断削弱劳动群众作为统治阶级的地位。

因此，如果把问题说得更彻底一点，那么鸟笼经济就不是别的什么“探索”，而是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一种经济形式。所谓和平演变，不是一定要公开宣布改旗易帜，不是一定要一夜之间完成私有化，而是可以通过一整套渐进的、折中的、看似温和的制度安排，在不改变名义的前提下改变实质，在不放弃社会主义语言的前提下恢复资本主义内容。鸟笼经济恰恰就是这样：它一边说“控制”，一边让市场飞；一边说“计划”，一边让商品经济的无政府主义冲动获得合法空间；一边说“为了人民”，一边把人民排除在真正的经济主导权之外。久而久之，社会主义就只剩下词句，资本主义则以增长、效率、灵活和活力的名义不断回潮。于是，所谓“笼子”并没有真的压住资本主义之“鸟”，反而逐渐变成这只鸟的孵化器。

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所指出的社会主义道路，恰恰与此相反。马克思讲的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掌握公共生产资料，自觉组织社会劳动；列宁讲的是无产阶级专政同小生产自发势力、小资产阶级偏见和资本主义萌芽进行长期斗争；毛泽东讲的是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让人民群众在阶级斗争和生产实践中真正掌握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主动权。这三者所共同指向的，不是什么“让市场在笼子里飞”，而是让劳动群众走出笼子，成为社会的真正主人。社会主义的关键，不在于有没有一只会飞的“鸟”，而在于谁在决定社会生产的方向；不在于笼子设计得多么精巧，而在于人民是否真正掌握了笼门。

因此，批判鸟笼经济，绝不是一个狭义经济学问题，也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政策争论问题，而是一个关乎路线、关乎阶级斗争、关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根本问题。只要我们承认社会主义不是权力替人民作主，而是人民自己作主；只要我们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不是空洞名词，而是对资本主义关系及其社会基础的现实压制；只要我们承认小生产的自发性、小农的偏见和商品交换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必须被逐步克服而不是被长期迁就，那么我们就不能把鸟笼经济看作什么值得赞扬的“经验”，而只能把它视为必须揭露、必须批判、必须超越的对象。

真正的出路，不是把笼子修得更漂亮一点，不是让鸟飞得更有序一点，而是从根本上改变那个让人民只能在笼中活动的制度本身。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必须把劳动人民从被动地位中解放出来，把群众从制度附庸变成制度主人，把社会生产从权力和资本的双重控制中解放出来，重新建立在联合生产者的自觉组织、无产阶级的阶级领导和群众广泛参与的基础之上。只有在这个意义上，生产力的解放才不是一句空话，社会主义才不是一层外壳，人民当家作主才不是被挂在墙上的口号。

所以，鸟笼经济的“活力幻象”必须被打破，而且必须用阶级分析和革命实践去打破。它之所以危险，正在于它把人民困在笼中，却让人误以为这就是自由；它之所以必须被否定，正在于它用社会主义的语言遮蔽了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现实。只有把人民从这种笼中解放出来，把经济权力真正交到劳动群众手中，把制度重新建构为服务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才不再只是口号，而会重新成为活生生的现实。

论罪恶的锡安主义

一、引言：为什么必须批判锡安主义

今天，巴勒斯坦问题常常被故意说成是一场“复杂的民族冲突”、一场“无法调和的宗教仇恨”，或者一场“两边都有错误”的长期争端。然而，只要稍微撕开这些模糊叙述的面纱，就不难看出，问题的本质根本不在于什么抽象的“仇恨循环”，也不在于两个平等主体之间的偶然冲突，而在于殖民占领、民族压迫和帝国主义支配。如果不抓住这一点，一切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讨论都会被带偏：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区别会被抹平，殖民统治会被包装成“自卫”，被侵略人民的反抗会被歪曲为“无端暴力”，而真正的历史责任与现实罪行则会被掩盖在“安全”“和平”“复杂性”这些空洞词语之下。

而要真正揭示巴勒斯坦问题的本质，就不能绕开对锡安主义的批判。因为锡安主义并不是某种中性的民族文化认同，也不是对犹太人历史苦难的自然回应，更不是一种单纯的“民族自决”思想。它是一种近代形成的政治意识形态，一种建立在殖民定居、民族排斥和帝国主义支持基础之上的国家建构方案。它把巴勒斯坦这片原本已有人民长期生活、劳动和繁衍的土地，视为可以被重新划分、重新占有、重新命名的对象；它把原住民的存在当成障碍，把殖民扩张说成“回归”，把民族压迫说成“建国”，把军事统治说成“安全保障”。正是在这种意识形态之下，巴勒斯坦人民被驱逐、被屠杀、被监禁、被封锁、被剥夺土地与家园，而殖民国家机器则不断以现代化、法治化和国家化的形式巩固其统治。

因此，批判锡安主义，绝不是某种附属的道德表态，而是理解巴勒斯坦问题的理论前提。只要不批判锡安主义，就无法说明为何殖民者能够长期把自己伪装成受害者，无法说明为何一个建立在驱逐和排斥基础上的国家秩序，竟能够长期在国际舆论中被包装成“民主堡垒”，也无法说明为何帝国主义力量总是如此坚定地站在以色列一边。因为锡安主义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有着深刻而内在的联系。它不是脱离世界体系的一种局部民族主义，而是现代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秩序在中东地区的重要政治形式之一。

更进一步说，批判锡安主义，还必须反对两种常见的混淆。第一种混淆，是把锡安主义等同于全部犹太人，把批判锡安主义歪曲成反犹太主义。这样的混淆，本质上是为锡安主义寻找道德盾牌。事实上，锡安主义是一种政治立场，而不是全体犹太人的天然属性；反对一种殖民主义国家意识形态，不等于仇视某个民族或宗教群体。第二种混淆，则是把锡安主义说成犹太人民摆脱迫害的唯一道路，仿佛只要承认犹太人曾遭受严重苦难，

就必须承认锡安主义的正当性。但问题恰恰在于：一个民族所遭受的压迫，绝不能成为压迫另一个民族的权利来源。欧洲反犹太主义的历史罪恶，不能由巴勒斯坦人民来承担；法西斯主义和种族灭绝的历史创伤，也不能被拿来为新的殖民排斥和民族压迫背书。

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任何民族问题都不能脱离阶级问题、国家问题和帝国主义体系来理解。锡安主义之所以必须被批判，不只是因为它造成了巴勒斯坦人民的巨大苦难，更因为它代表了一种反动的政治逻辑：它不是通过推翻压迫制度来争取解放，而是通过建立一个新的排斥性国家机器、通过压迫另一个民族来解决自身的“民族问题”；它不是要消灭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而是主动依附于帝国主义、成为帝国主义在中东的战略前哨；它不是要实现人民之间的平等联合，而是通过民族排他、军事统治和殖民扩张来维持自身存在。这样的意识形态，无论怎样包装，都不可能是正义的，也不可能代表真正的解放。

因此，本文的中心论点非常明确：锡安主义不是犹太人民的解放思想，而是一种以殖民定居、民族排斥和帝国主义支持为基础的反动政治意识形态。它的存在，不是为了结束压迫，而是为了建立新的压迫；不是为了实现民族平等，而是为了维持殖民特权；不是为了摆脱帝国主义，而是为了服务帝国主义。在这样的前提下，批判锡安主义就不仅仅是对某一政策、某一战争行为或某一届政府的批判，而是对整个殖民国家逻辑的批判，是对一种反动意识形态及其历史根基、现实功能和阶级本质的全面揭露。

也正因为如此，真正站在巴勒斯坦人民一边，就不能停留在抽象的人道同情上，更不能停留在空泛的“和平呼吁”上，而必须敢于指出：巴勒斯坦问题的核心，不是双方“误解太深”，不是冲突“太复杂”，而是一个殖民压迫结构仍然存在，一个以锡安主义为意识形态核心的国家秩序仍然存在。只要这一点不被揭穿、不被否定、不被清算，所谓和平就只能是殖民秩序下的和平，所谓谈判也只能是压迫关系中的谈判，所谓安全也只能是压迫者单方面的安全。

所以，批判锡安主义，并不是为了制造新的民族对立，而是为了揭示既有压迫的真实面貌；不是为了鼓吹抽象仇恨，而是为了站在被压迫人民的立场上，恢复历史与现实的真相。只有在彻底揭露锡安主义的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本质之后，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巴勒斯坦人民为何反抗、为何不能屈服、为何他们的斗争不仅是巴勒斯坦的斗争，而且是整个被压迫民族反对殖民和帝国主义斗争的一部分。

二、什么是锡安主义：概念与本质

要批判锡安主义，首先必须把概念本身说清楚。因为锡安主义之所以长期具有迷惑性，恰恰就在于它总是故意把自己包裹在模糊叙述之中：一会儿把自己说成是犹太民族的“自救运动”，一会儿把自己说成是对历史迫害的“防御性回应”，一会儿又把自己说成不过是一种普通的民族自决主张。正是在这些叙述之下，锡安主义的真实政治性质被遮蔽了，殖民压迫被说成建国努力，民族排斥被说成安全需要，帝国主义支持被说成国际保障。因此，只有从概念上首先把它剥离出来，才能谈得上真正的批判。

首先必须明确一点：锡安主义不等于犹太人，更不等于犹太教。犹太人是一个复杂的历史共同体，包含不同阶级、不同政治立场、不同文化传统和不同地域经验的人群；犹太教则是一种宗教信仰体系，有其自身的历史演变与内部差异。而锡安主义则是一种近代形成的政治意识形态，它并不是全体犹太人天然共有的立场，也不是犹太教教义的自然延伸。它是一种具体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国家政治方案，其核心主张是：通过在巴勒斯坦建立并维持一个以犹太民族国家为核心的政治秩序，来解决所谓“犹太问题”。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只有把锡安主义从“犹太人整体”中区分出来，才能防止一切批判都被粗暴地歪曲成“反犹太主义”，也才能让问题重新回到政治、阶级和殖民现实的地面上。

从本质上说，锡安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它的基本逻辑，不是去推翻压迫犹太人的社会制度，不是去和一切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反对种族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秩序，而是接受近代民族国家体系本身的逻辑，试图为犹太人也争得一个排他性的民族国家空间。它不是从阶级解放出发来看待民族问题，而是把民族国家本身神圣化，把国家建构视为解决苦难的终点。在这种逻辑中，最重要的问题不再是如何消灭压迫制度，而是如何建立一个“属于自己民族”的国家机器；不再是如何反对一切形式的民族压迫，而是如何让本民族成为国家权力的中心。

这样一来，锡安主义就天然带有深刻的排他性。因为一旦国家被定义为“某一民族的国家”，那么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其他民族和居民，就必然被置于次要位置，甚至被视为障碍。换句话说，锡安主义不是单纯地主张“犹太人也应当有安全和尊严”，而是主张通过建立一个以犹太民族为核心、以犹太人统治为原则的国家结构，来保证这种安全和尊严。问题就在这里：如果一块土地上本来就有别的人民长期生活，那么这种民族国家方案就不可能是中性的，它必然意味着对原住民权利的压缩、否定、驱逐或统治。正因如此，锡安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民族认同运动，而是一个具有明确殖民指向的国家工程。

也就是说，锡安主义的本质并不只是“一个民族想建国”这么简单，而是通过民族建国的形式，在已有居民存在的土地上建立排他性统治秩序。这就是为什么它不能被理解成普通的民族自决主张。因为真正的民族自决，至少在原则上意味着一个民族摆脱外来压迫、掌握自身命运；而锡安主义在巴勒斯坦的实践，却不是摆脱对本地压迫者的统治，而是由外来定居者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反过来建立起对本地人民的支配。因此，它不是被压迫民族反对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而是殖民主义借民族主义形式展开的一种政治方案。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锡安主义的第二个本质特征：它是一种殖民定居意识形态。

所谓殖民定居，不是简单的军事占领，也不是暂时的海外控制，而是外来人口在原住民土地上长期定居、建立国家、重组法律、改造地理和人口结构，并试图把原住民边缘化、驱逐化、消失化。锡安主义正是这样一种逻辑。它不是去一片无人的土地上建设社会，而是在巴勒斯坦这片本来有阿拉伯人民长期生活、劳动和繁衍的土地上，推动一个外来的民族国家计划。为了让这个计划显得合理，它必须不断抹去原住民的存在，把他们说成落后的、无组织的、可替代的，甚至把他们直接从历史叙述中删掉。于是，殖民占领被说成“回归故土”，土地掠夺被说成“开发建设”，驱逐原住民被说成“国家诞生的必要代价”。

这也说明，锡安主义不是对历史苦难的真正解答，而是对苦难的一种转嫁。欧洲的反犹太主义和种族主义的确给犹太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这是不可否认的。但锡安主义并没有试图从根本上推翻制造这种灾难的制度基础，没有把斗争矛头真正对准欧洲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体系，相反，它接受了“民族必须有自己的国家”“没有国家就无法安全”这套逻辑，并把解决方案建立在对巴勒斯坦土地的重新占有之上。换句话说，它不是从压迫制度中解放出来，而是在另一个地方复制并改造了压迫的结构。欧洲反犹太主义并没有因为锡安主义而被消灭，但巴勒斯坦人民却因此承担了新的民族压迫和殖民暴力。

再进一步说，锡安主义之所以是反动的，还在于它并不只是某种“民族情感”的表达，而是一种非常现实的国家建构意识形态。它的目标，不是抽象地保护一个群体，而是建立一整套以民族排他为基础的国家机器，包括军队、土地制度、移民制度、法律制度、边界制度和安全叙事。也就是说，锡安主义不是停留在“我们是谁”的文化层面，而是必然推进到“谁有权居住”“谁有权返回”“谁有权占有土地”“谁有权支配国家暴力”“谁被视为合法居民、谁被视为威胁”的政治层面。一旦走到这一步，它就不可能不表现出深刻的压迫性。因为任何建立在民族优先原则上的国家结构，都必然会把不属于这个“优先民族”的人降格为次等存在，或者把他们视为必须被控制、隔离和消除的对象。

因此，锡安主义绝不能被说成是一种简单的“民族自救思想”。它的真实本质，应当从三个层次来把握。

第一，它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它不从阶级解放出发，而从民族国家出发；不寻求消灭压迫制度，而寻求建立本民族的国家机器。

第二，它是殖民定居主义。它不是在原有压迫者的疆域内争取平等，而是在他人的土地上建立排他性国家秩序。

第三，它是帝国主义可利用、可依附的一种地区政治形式。因为这样一种建立在军事化、边界化和原住民压制基础上的国家工程，天然需要外部霸权的支持，也天然适合充当帝国主义在中东的支点。

这三个方面缺一不可。只看到锡安主义是民族主义，而看不到它的殖民定居性质，就会把它误认为普通的民族运动；只看到它是殖民主义，而看不到它和现代民族国家逻辑的结合，就会低估它的意识形态力量；只看到它在巴勒斯坦的扩张，而看不到它和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勾连，就会把问题缩小成局部冲突，而看不到它在全球秩序中的位置。

所以，什么是锡安主义？归根到底，它不是某种抽象的“犹太复国梦想”，也不是一个可以脱离现实压迫关系来理解的民族口号。它是一种近代形成的、以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为核心、以殖民定居为实施方式、以排他性国家建构为目标、并依赖帝国主义支持的反动政治意识形态。它不是为了不同民族平等共处，而是为了在已有居民存在的土地上建立特权性统治；不是为了终结压迫，而是为了以新的形式组织压迫；不是为了人民摆脱帝国主义，而是为了与帝国主义结合，成为帝国主义地区秩序的一部分。

正因为如此，对锡安主义的批判，不能停留在道德愤怒上，也不能只停留在对个别战争罪行的谴责上，而必须上升到对其本质的揭露：它是殖民主义、民族排斥和帝国主义相结合的现代政治形式。只有把这一点看清楚，后面我们才能进一步理解它的历史形成、现实功能和必然的反动性。

三、锡安主义的历史形成：从欧洲民族主义到殖民定居计划

锡安主义的形成，绝不能被理解成某种超历史的“民族回归愿望”自然觉醒。它是一个非常现代的政治产物，深深嵌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欧洲历史条件之中。它出现的时代，正是欧洲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高涨、民族国家体系成形、帝国主义瓜分世界不断加深的时代。也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犹太人所遭受的迫害并没有消失，反而在许多地区以新的形式持续存在。于是，一部分犹太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没有把问题指向整个压迫制度本身，而是接受了民族国家时代的逻辑，

转而提出：既然欧洲各民族都在争取或巩固自己的国家，那么犹太人也必须建立自己的国家。锡安主义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作为一种现代政治民族主义而定型的。

这里必须抓住一个根本点：锡安主义并不是对反犹主义最彻底、最进步的回答。它没有选择和一切被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去推翻制造反犹主义的欧洲社会秩序；相反，它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民族必须由民族国家来保障”的资产阶级时代前提。也就是说，它不是要从根本上消灭民族压迫产生的社会基础，而是要在既有民族国家体系中，为犹太人争出一个国家位置。这样一来，锡安主义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性质：它不是反对民族国家逻辑，而是要挤进这个逻辑；不是反对帝国主义世界体系，而是要在其中为自己寻找一块受保护的地盘。

在这一过程中，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具有关键意义。大英百科把他概括为“政治锡安主义”的奠基者；他在《犹太国家》中系统提出建立犹太国家的主张，并推动了1897年在巴塞尔召开的第一届锡安主义大会。也正是这次大会，使锡安主义从分散的文化—宗教愿望，转化为有纲领、有组织、有外交取向的现代政治运动。换句话说，从赫茨尔开始，锡安主义不再只是“某些人想回到圣地”的情感表达，而是明确转向了一个国家建构工程：它要寻找列强支持、组织移民、塑造国际合法性，并最终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民族国家。

这一步非常重要，因为它决定了锡安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单纯的群众性民族自发运动，而是一个高度依赖外交斡旋、国际承认和大国背书的政治项目。赫茨尔及其后继者并不是主要依靠当地人民的联合斗争来实现目标，而是不断寻求欧洲列强的支持，希望通过大国授权来推进定居和建国。这一点已经预示了它日后的发展方向：它不是去打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秩序，而是要借助这个秩序来完成自己的国家工程。正因如此，锡安主义从早期开始，就和帝国主义具有天然的亲和性。

而巴勒斯坦之所以成为这个工程的核心地点，也恰恰暴露了它的殖民性质。因为巴勒斯坦并不是一片“无主之地”，更不是等待谁去“开发”的空白地带。联合国关于巴勒斯坦问题历史的资料明确表明，在英国托管之前，巴勒斯坦是奥斯曼帝国旧领土的一部分，之后于1922年被置于英国托管之下；换言之，它始终是一片已有社会、人口和历史延续的土地。可是，在锡安主义叙事中，这片土地却被不断抽象化、神话化，仿佛它天然属于某种等待恢复的“古老权利”，而现实生活于其上的阿拉伯人民则被边缘化、模糊化、甚至当作不存在。这正是殖民定居意识形态的典型手法：先在叙事上抹去原住民，再在政治上重组土地归属。

1917年的《贝尔福宣言》则标志着锡安主义和帝国主义公开结合的关键节点。英国政府在这份宣言中表示支持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民”建立“民族家园”，而当时巴勒斯坦仍处于奥斯曼帝国统治瓦解与英帝国扩张的历史背景之中。英国帝国在战争时期和战后安排中，把巴勒斯坦纳入自身战略盘算，并在托管时期为锡安主义项目提供了重要政治条件。联合国与英国、美国官方历史材料都表明，1917年宣言与1922年托管安排是后来巴勒斯坦问题结构化的关键环节。也就是说，锡安主义不是靠自身在巴勒斯坦“自然生长”为国家，而是在帝国主义授权、托管和保护之下，逐步完成了自己的政治扩张。

这恰恰说明，锡安主义从历史形成之初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民族避难计划”，而是一个依赖帝国主义世界秩序的殖民定居计划。英国之所以支持它，并不是出于什么纯粹的人道主义，而是出于地缘战略、帝国布局和中东控制的需要；而锡安主义之所以能够推进，也正是因为它愿意充当帝国秩序的一部分。换句话说，锡安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不是偶然联盟，而是一种结构性的相互需要：帝国主义需要一个可靠的地区支点，锡安主义需要一个强大的外部保护者。二者的结合，使巴勒斯坦问题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地方问题，而是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共同塑造出来的现代压迫结构。

同时，还必须看到，锡安主义的发展并不是在“和平共处”的框架内自然完成的。随着托管时期移民增加和国家工程推进，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对锡安主义的反对不断增强。大英百科的概述明确提到，1914年至1933年间，巴勒斯坦犹太人口显著增长，而阿拉伯人口对锡安主义持续抵抗，英国则试图调和但未成功。这表明冲突的根源并不是什么“双方古老仇恨”突然爆发，而是一个殖民定居项目不断扩张，必然与原住民的生存权、土地权和民族权利发生正面冲突。也就是说，反抗并不是问题的起点，殖民推进才是问题的起点。

因此，从历史形成来看，锡安主义的本质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它是近代欧洲民族主义时代的产物，而不是某种超历史的“古老回归”。第二，它从一开始就具有明确的国家建构取向，并依赖大国外交与国际承认，而不是单纯的群众自发认同。第三，它在巴勒斯坦的实现方式，不是普通民族解放，而是典型的殖民定居：在一片已有人民生活的土地上，借助帝国主义支持推进人口、土地和国家结构的重组。正因为如此，锡安主义不能被理解为“犹太民族自然追求安全的结果”，而应当被理解为欧洲民族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相交汇的历史产物。

这一历史形成过程也决定了，锡安主义后来不可能自然发展为某种真正平等的、多民族共居的政治方案。因为它诞生的根基，就不是建立在和原住民平等联合的原则上，而是建立在“国家必须先属于某一民族”“这块土地可以在帝国保护下被重新组织”的前提上。这样的起点，天然就把它推向民族排他、原住民边缘化和军事化国家建构。也正因如此，下一步要真正揭示锡安主义的现实本质，就必须进一步分析：它为什么不是普通建国，而是定居殖民；为什么它的国家逻辑必然导向原住民驱逐、法律不平等和长期军事统治。

四、锡安主义与殖民主义：不是“建国”，而是定居殖民

锡安主义最常见、也最具有欺骗性的说法之一，就是把自己描绘成一种普通的“建国运动”。在这种叙述里，仿佛只是一个长期受迫害的民族，终于在历史的某一时刻实现了自己的国家愿望；仿佛这里发生的一切，无非是近代民族国家形成史的又一个章节。然而，问题恰恰在于：如果所谓“建国”不是在自己的社会空间中摆脱外来统治，而是在他人的土地上、借助帝国主义支持去建立一个排他性的国家机器，那么这就不再是普通建国，而是定居殖民。巴勒斯坦问题的根本，不在于一个民族抽象地“想有国家”，而在于这个国家工程是如何实现的：它是通过取代原住民、重组土地所有、改变人口结构、建立民族等级秩序来实现的。

所谓定居殖民，与一般的占领不同，它不是短期控制一块地方然后离开，而是要在这块地方上长期定居、建立新社会、重塑法律和边界，并把原有居民边缘化、驱逐化、消失化。换句话说，它的目标不是简单地掠夺后撤出，而是取而代之。在这一点上，锡安主义的国家工程具有非常鲜明的定居殖民特征：它不是承认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原本就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并在平等基础上寻求共处；相反，它从一开始就把土地、人口和主权问题都放在一个排他性的民族国家框架中来处理。谁属于这个国家，谁有资格移入，谁能占有土地，谁被视为威胁，谁可以被赶走或边缘化，这一整套问题都被放在“犹太国家必须被建立和维持”的原则之下。

这正是为什么巴勒斯坦问题不能被说成“两边都想建国，结果冲突起来了”那么简单。因为在英国托管时期，双方围绕的核心问题之一，正是人口和土地。大英百科对托管时期的概述写得很直白：到托管末期，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与锡安主义者都意识到，未来将取决于“人口规模和土地所有权”，因此这一时期的中心问题就是犹太移民与土地购买，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则试图减缓或阻止这一过程。也就是说，这不是抽象的民族想象之争，而是非常具体的殖民推进：一方不断增加定居人口、扩大土地控制，另一方则抵抗这种重组。

1948年的“纳克巴”把这种定居殖民逻辑推进到了赤裸裸的层面。联合国关于纳克巴的资料明确指出，纳克巴指的是1948年战争期间巴勒斯坦人的大规模流离失所与财产被剥夺。联合国系统中的历史资料也记载，难民人数至少达到50万以上，其他估计则更高。换句话说，以色列国家的形成，并不是某种真空中的“建国时刻”，而是伴随着大规模驱逐、逃亡、村庄毁灭与财产转移的过程。这里必须把话说清楚：一个以原住民大规模流离失所为代价完成的国家工程，不是普通民族自决，而是殖民清洗式的国家建构。

更重要的是，纳克巴并不是一个已经结束过去事件，而是一种延续至今的结构。联合国新闻和相关巴勒斯坦问题资料都强调，“纳克巴”可以被理解为持续过程，而不是单一历史瞬间；OCHA 关于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资料则显示，强迫迁移、拆毁房屋、定居者暴力和占领政策直到今天仍在制造新的流离失所。仅2026年年初，OCHA 就报告已有1500多名巴勒斯坦人因以色列定居者袭击和通行限制而流离失所。也就是说，定居殖民不是1948年一次性完成的，而是在不同阶段不断通过法律、军队、定居点和行政措施继续推进。

如果我们进一步看今天的现实，就会发现锡安主义的殖民性质并没有因为现代国家形式而减弱，反而变得更加制度化。OCHA 长期记录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的拆毁、没收和迁移情况，这些数据反映的不是偶发冲突，而是一种持续性的空间重组：通过拆毁巴勒斯坦人的房屋和生计设施、限制其建设权、制造生活不可持续的环境，把原住民逐步挤出特定区域。B' Tselem 则从另一个角度指出，整个从约旦河到地中海之间的制度安排，呈现出一种“犹太人至上”的统治原则。无论是否接受该组织使用的全部法律术语，这个判断至少抓住了一个关键现实：国家并不是以所有居民的平等权利为基础组织起来的，而是围绕一个民族的优先地位来设计的。

也正是在这里，“民族家园”这种说法的虚伪性暴露无遗。因为它把一项建立特权国家的工程，说成一种自然、温和、无害的归宿；把原住民的权利压缩问题，伪装成历史修复问题；把现实生活在土地上的巴勒斯坦人，从政治主体降格为历史叙事中的障碍。可事实是，巴勒斯坦并不是等待“民族家园”降临的空白地图，而是一片有人生活、有社会结构、有历史延续的土地。任何在这种土地上建立排他国家的方案，若不建立在真正平等的共同政治体之上，就只能通过压制原住民来完成。锡安主义的问题，不在于它想给某个群体提供安全感，而在于它把这种安全建立在另一个民族的不安全、失地、流离失所和政治被剥夺之上。

因此，锡安主义与殖民主义之间不是偶然相似，而是结构一致。它们共享同一种核心逻辑：
不是与原住民平等共建，而是取代原住民；
不是承认多民族共居的现实，而是试图把国家主权固定在某一民族优先的原则上；

不是终结压迫，而是通过法律、军队和边界把压迫制度化。

只不过，锡安主义用“民族回归”“安全”“历史权利”这些现代话语，把这一切包装得更合法、更道德、更容易被帝国主义接受。

归根到底，锡安主义不能被看作普通的建国工程，而必须被理解为定居殖民工程的现代形式。它的国家形成，不是通过与当地人民共同解放来完成，而是通过土地占有、人口重组、难民制造、法律差别和军事统治来完成。它的延续，也不是靠某种自然共识，而是靠持续的占领、定居点扩张、拆毁和强制迁移来维持。只要这一结构还存在，所谓“和平”就不会是真正的和平，所谓“安全”也只会是殖民者单方面的安全。

所以，到了这里，我们已经可以更进一步地看到：锡安主义不仅是殖民主义，而且是一种带有民族排他和制度性不平等的现代殖民主义。这就引出了下一步必须分析的问题：它为什么不仅是殖民，而且在现实中表现为民族排斥、法律不平等和长期军事化统治；换句话说，它为什么必然走向一种种族化、军事化的国家结构。

五、锡安主义的反动性：民族排他、种族主义与军事统治

如果说前面几部分已经说明，锡安主义不是普通“建国”，而是建立在殖民定居基础上的国家工程，那么接下来就必须进一步指出：这种工程一旦形成国家，就不可能是中性的、普遍公民性的国家，只能是民族排他性的国家。因为它的出发点不是一切居民的平等联合，不是原住民与移民在共同政治共同体中的平等重建，而是某一民族国家必须被优先建立、优先维持、优先保障。这样一来，国家的法律、土地制度、移民制度、治安制度和战争机器，就必然围绕“谁属于这个优先民族、谁不属于”来组织。也正因如此，B' Tselem 将从约旦河到地中海之间的统治概括为一种“犹太人至上”的体制，Human Rights Watch 认为以色列当局实施了“种族隔离和迫害”的犯罪，国际特赦组织则把这种体制概括为对巴勒斯坦人的“系统性支配和压迫”。这些表述虽来自不同机构，但都指向同一个核心现实：这里运转的不是一个对全体居民平等开放的政治秩序，而是一个建立在民族统治差序上的国家结构。

锡安主义的第一重反动性，就在于它的民族排他性。它总是把国家说成“一个民族的避难所”“一个民族的历史家园”“一个民族生存的保障”，但恰恰在这种说法中，国家已经被预先规定为某一民族优先享有的装置，而不是全体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的共同政治体。于是，巴勒斯坦人哪怕是原住民，也不再被当作平等的国家主体，而是被视为人口问题、安全问题、边界问题、管理问题。对锡安主义来说，原住民不是国家的真正主人，而是必须被压缩、被隔离、被防范、被控制的对象。这种排他性不是附带现象，

而是其国家逻辑本身的必然结果。若国家的合法性被建立在“必须维持某一民族的绝对优先地位”之上，那么对其他民族的平等只能成为口号，而不可能成为现实。

这种民族排他性进一步发展，就表现为种族化和制度化的不平等。这里说的“种族主义”，并不只是街头仇恨言论意义上的偏见，而是国家制度如何系统地把不同民族、不同出身的人置于不同权利位置上。国际特赦组织总结其报告时，强调其所分析的是一套“分裂、隔离、歧视和剥夺”的制度；Human Rights Watch 则明确指出，其结论依据的是一项“维持犹太以色列人对巴勒斯坦人支配”的总体政策；B’Tselem 也强调，整个制度的组织原则是推进犹太人至上的统治。也就是说，问题不只是个别军人、个别定居者或个别政府的过激行为，而是制度本身按照民族差序来分配土地、行动自由、住房、建设许可、政治地位和安全保障。

而这种制度化不平等，在被占领土上的现实表现尤其赤裸。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和联合国系统相关材料一再指出，以色列定居点在被占巴勒斯坦领土上是非法的，且定居点扩张、兼并推进和相关暴力正在持续；OCHA 则长期记录拆毁、强迫迁移、定居者袭击和通行限制所造成的现实后果。2025年联合国人权高专办指出，以色列必须停止新的定居活动、撤出定居者并作出赔偿；而 OCHA 2026 年初的资料也显示，大量巴勒斯坦人因定居者袭击和限制措施而被迫流离失所。换句话说，国家权力在这里不是抽象地“维持秩序”，而是在持续为一种殖民—民族优先秩序制造空间：扩张定居点，压缩原住民生存条件，改变土地和人口格局。

锡安主义的第三重反动性，是它必然走向军事统治和永久安全国家化。因为一个建立在殖民定居和民族排他基础上的国家，不可能通过真正平等来获得稳定，它只能通过武装隔离、监控、惩罚和战争来维持自己。于是，“安全”就成了这个国家最核心的意识形态词汇：凡是原住民的抗议、反抗、组织、回归要求，都会被放进安全框架中解释；凡是殖民压迫带来的冲突，都会被说成国家不得不采取更强硬措施的理由。这样一来，军事化就不再只是政策选择，而成为国家存在方式本身。殖民统治需要军队，民族排他需要边界与检查站，土地掠夺需要警察和行政命令，定居点扩张需要武装保护；因此，军事机器不是锡安主义国家的外壳，而是它的骨架之一。

从马列毛主义的立场看，锡安主义的这种结构绝不是偶然的道德堕落，而是有其鲜明的阶级和世界体系根源。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把民族问题当作脱离历史条件的抽象权利问题，而是始终把它放在阶级统治、国家机器和帝国主义体系中来理解。列宁反复强调，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不是一回事；前者在帝国主义时代往往同统治、扩张和特权结合在一起，后者则属于反压迫斗争的范畴。

锡安主义恰恰属于前一种：它不是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而是一个依赖帝国主义支持、以压迫另一个民族为存在条件的殖民民族主义。它的国家形式越稳固，就越意味着巴勒斯坦人民被压迫得更深；它的“安全”越被强化，就越意味着原住民被更严密地军事化管理。

从毛主义的角度看，这一点还必须说得更尖锐：锡安主义不是人民战争的立场，而是镇压人民的立场；不是民族解放的立场，而是殖民统治的立场；不是依靠群众的立场，而是依靠军队、边界、监狱和帝国主义支援来维持统治的立场。它所代表的，不是人民群众起来反抗压迫的历史方向，而是一个殖民国家机器如何把群众压回去、如何把反抗者碎片化、如何用“反恐”“安全”“秩序”这些话语把自己的暴力合法化。对于马列毛主义者来说，衡量一个政治力量，关键不在它怎样自我歌颂，而在它站在哪一边：站在被压迫人民这一边，还是站在殖民军队、定居者和帝国主义这一边。锡安主义显然属于后者。

也正因为如此，锡安主义不能被简单理解为一种“有问题的民族主义”，更不能被自由派那种“双方都要克制”的语言所稀释。它的反动性是结构性的：它在政治上，把国家建成某一民族的特权机器；它在法律上，把不平等制度化；它在空间上，通过定居点、拆毁和迁移不断重塑土地归属；它在意识形态上，用“安全”掩盖殖民压迫；它在军事上，把永久战争状态变成国家常态。这不是普通国家失误的集合，而是殖民主义国家形式在帝国主义时代的集中表现。

因此，从马列毛主义视角出发，对锡安主义的批判绝不能停留在一般人道主义层面，也不能只满足于谴责某次屠杀、某轮轰炸或某项政策。真正的批判必须上升到路线和性质的层面：锡安主义本身就是反动的，它不是偏离了解放，而是从一开始就站在反解放的一边；它不是因为被“右派利用”才走向压迫，而是其国家逻辑本身就要求压迫；它不是偶然和帝国主义合作，而是天然适合充当帝国主义在中东的桥头堡。只有抓住这一点，才不会被“和平谈判”“安全焦虑”“复杂历史”这些说辞带偏，才不会把压迫者的国家逻辑误认为某种可以修补的普通矛盾。

归根到底，锡安主义的反动性就在于：它把一个殖民国家的存在，建立在另一个民族持续被剥夺、被隔离、被军事化管控的基础上。这样的制度，无论多么现代、多么高科技、多么擅长外交宣传，都不可能代表真正的正义与解放。对巴勒斯坦人民来说，它意味着流离失所、失地、封锁、检查站、监狱和轰炸；对整个中东地区来说，它意味着帝国主义秩序的长期插桩；对一切相信民族平等和人民解放的人来说，它意味着必须被揭露、被反对、被历史清算的反动政治形式。

六、锡安主义与帝国主义：以色列的侵略性本质与美帝、中修的共谋

如果说前面几部分已经说明，锡安主义不是普通民族主义，而是一种建立在殖民定居、民族排斥和军事统治基础上的反动意识形态，那么进一步就必须指出：在今天的世界体系中，以色列不仅仅是一个殖民国家，而且已经具有鲜明的帝国主义性质。从马列毛主义的立场看，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具有帝国主义性质，不能只看它领土大小，也不能只看它是否拥有传统殖民地，而要看它是否已经形成了以垄断资本、军工体系、技术控制、对外侵略和地区压迫为特征的统治结构。沿着这一标准来看，以色列绝不是什么单纯“求生存的小国”，而是一个高度军事化、深度嵌入全球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网络、并持续对巴勒斯坦人民和周边地区实行武装压迫的侵略性国家。它长期维持占领、推动定居点扩张、拆毁巴勒斯坦人的房屋和基础设施、制造流离失所，并以此不断重组地区现实，这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安全防护”，而是一种现实的殖民—扩张秩序。

从马列毛主义角度看，以色列的帝国主义性质首先表现在：它不是被动守成，而是主动通过战争机器、殖民政策和国家暴力来塑造周边秩序。它对巴勒斯坦土地的吞并、对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长期军事控制、对定居点的系统性扩张，都表明它不是在边界内维持和平，而是在不断推进一套以军事优势、种族等级和国家暴力为基础的统治结构。联合国人权高专办明确指出，以色列在被占巴勒斯坦领土上的定居活动和兼并推进仍在持续；而联合国人道主义机构也持续记录拆毁、强制迁移、定居者暴力和流离失所的现实后果。也就是说，以色列国家机器不是偶尔“过界”，而是把扩张和压迫本身变成了国家运行方式的一部分。

但是，以色列的帝国主义性质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之所以能够长期维持这种侵略性秩序，根本上离不开帝国主义大国的支持。首先必须说清楚：以色列最大的支持者仍然是美国，而不是中国。这一点在军事、外交和安全层面尤其明显。美国国务院2025年资料显示，美以之间现行军售项目多达数百项，总值达到数百亿美元；美国驻耶路撒冷大使馆也在2025年明确表示，美国通过紧急授权加速向以色列提供约40亿美元军事援助。换句话说，美国不是普通盟友，而是以色列最核心、最不可替代的军事—外交靠山。没有美国的军火、政治庇护和战略支持，以色列现有的殖民国家秩序根本无法如此稳固地维持下去。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修可以被洗白。恰恰相反，中修并不是真正站在巴勒斯坦一边的力量，而是以色列极其重要的经济伙伴和现实输血者之一。中国驻以色列使馆2025年公开表示，中国已经成为以色列“亚洲最大贸易伙伴、全球第二大贸易伙伴”，也是其最重要进口来源地之一；以色列方面2026年的报道也指出，2025年中以双边贸易达到历史高位，

中国继续维持其作为以色列第二大贸易伙伴的地位。这说明什么？说明中修嘴上可以高喊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权利，现实中却仍然和以色列保持高水平、结构性的经贸联系。它并没有在物质上真正孤立殖民国家，反而在供应链、市场和贸易层面为其国家机器持续输血。

这就暴露出中修的根本虚伪性：一方面，它在国际场合摆出一副“支持巴勒斯坦”的姿态；另一方面，它又不愿真正切断与以色列的经济联系，更不愿承担反对殖民国家所必需的现实代价。这样的“支持”不是革命的支持，而是机会主义的支持；不是站在被压迫民族一边，而是把巴勒斯坦问题当作国际博弈中的外交筹码。对马列毛主义者来说，这种做法本身就是修正主义的典型表现：口头上反帝，实际上同殖民国家维持稳定合作；嘴上说支持民族解放，现实中却服从于本国官僚资产阶级的贸易和外交利益。

更反动的是，中修不仅在对外问题上搞两面派，在对内也根本不允许人民群众以独立的、战斗性的方式声援巴勒斯坦。Human Rights Watch在2026年中国章节中指出，中国政府系统性压制言论、结社和集会自由；此前关于中国抗议的声明也明确指出，中国当局会错误拘押和平抗议者。也就是说，在中修专制统治之下，真正的问题并不是它嘴上有没有提巴勒斯坦，而是人民群众根本没有独立表达政治立场的自由。在这种体制之下，若人民群众以街头行动、公开集会、独立展示巴勒斯坦旗帜等方式表达支持，就面临被警方阻止、带离、拘押甚至以各类治安与政治罪名打压的现实风险。这不是因为中修“特别反感巴勒斯坦旗”，而是因为它根本不允许任何脱离其控制的群众政治表达。

从马列毛主义立场看，这一点必须揭穿。真正支持巴勒斯坦，不是外交辞令上的“关切”，不是联合国会场里的套话，而必须表现为两点：第一，在物质上切断对殖民国家的合作和输血；第二，在政治上允许并发动人民群众公开地、独立地站到被压迫民族一边。中修两点都做不到。它既不愿同以色列真正决裂，也不愿让中国人民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对巴勒斯坦的战斗性支持。于是，它所谓的“支持巴勒斯坦”，就不过是一种不触动自身利益、不触动外交盘算、更不触动国内统治秩序的空洞姿态。

因此，这一部分的结论必须说得非常明确：以色列本身是帝国主义时代在中东的侵略性国家形式；美国是它最大的军事—外交支持者；中修则是它极其重要的经济伙伴和现实输血者之一，同时在国内用专制手段压制人民独立声援巴勒斯坦的权利。前者说明，锡安主义不能脱离全球帝国主义体系来理解；后者说明，中修所谓“支持巴勒斯坦”带有赤裸裸的虚伪性和机会主义。对马列毛主义者来说，这两者都必须一并揭露：既要反对美帝及其在中东的殖民秩序，也要反对中修这种打着反帝旗号、实际上同殖民国家做交易并镇压人民表达的修正主义政权。

归根到底，巴勒斯坦问题再次证明了一个基本真理：真正站在被压迫民族一边的，不是帝国主义国家，也不是修正主义官僚国家，而只能是人民群众本身以及一切坚持反帝、反殖民、反修正主义斗争的革命力量。锡安主义必须被彻底揭露，美帝国主义必须被坚决反对，中修的伪善也必须被无情撕开。只有这样，对巴勒斯坦的支持才不是空话，而是真正站在被压迫人民立场上的革命实践。

七、为什么反锡安主义不是反犹太主义

在今天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舆论斗争中，最常见、也最恶毒的一种手法，就是故意把反锡安主义说成反犹太主义。只要有人批判以色列国家的殖民性质、批判锡安主义的民族排斥逻辑、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反殖民斗争，立刻就会有人跳出来说是“仇恨犹太人”“否认犹太民族自决”“新的反犹太主义”。这种偷换概念之所以危险，不仅因为它歪曲了批判者的立场，更因为它把真正的反犹太主义问题工具化了：把一个应当被严肃对待的种族主义问题，变成了为殖民国家镇压批评服务的政治棍棒。耶路撒冷反犹太主义宣言之所以提出，恰恰就是为了反对这种混淆；宣言明确说，其目标之一是“保护关于以色列/巴勒斯坦未来问题进行公开辩论的空间”。

首先必须讲清楚，反犹太主义是什么。反犹太主义是针对犹太人的仇恨、歧视、迫害和阴谋化想象。IHRA的工作定义指出，反犹太主义常常把犹太人说成操纵世界、危害人类、阴谋作恶的群体，并使用各种历史上积累下来的邪恶刻板印象。也就是说，反犹太主义针对的是“犹太人作为一个群体”的存在本身，把他们妖魔化、污名化、非人化，把社会灾难和现实问题归咎于“犹太人”。这是一种种族主义、一种民族压迫，也是一种必须坚决反对的反动意识形态。

而反锡安主义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反锡安主义针对的，不是犹太人作为一个民族或宗教群体，而是锡安主义这一政治意识形态和它所建构的殖民国家秩序。它批判的不是“犹太人存在”，而是“一个以犹太民族优先为原则、以压迫巴勒斯坦人民为存在条件的国家结构”；它反对的不是犹太人的安全与尊严，而是殖民统治、定居点扩张、民族排他、军事占领和帝国主义支持。换句话说，反锡安主义是对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和殖民政治工程的批判，而不是对一个民族的仇恨。把这两者混为一谈，就等于说：只要一个殖民国家打着某个民族的名义存在，那么对它的任何批判都等于仇恨那个民族本身。这样的逻辑本身就是反动的。

这一点，连一些主流定义本身也不得不承认。IHRA工作定义虽然经常被政治化使用，但它自己也写得很清楚：“对以色列的批评，如果类似于对任何其他国家的批评，不能被视为反犹太主义。”这句话的意义非常大，因为它承认了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国家不是神圣的，国家可以被批评，而批评国家并不自动等于仇恨某个民族。也就是说，只要批判对象是以色列国家的政策、结构、意识形态和压迫行为，而不是把所有犹太人本质化地说成邪恶群体，那么这种批评本身就不能被随手扣上“反犹”的帽子。

从马列毛主义立场看，这个问题更不能含糊。马克思主义从来反对任何民族压迫，也从来反对把某个民族本质化、妖魔化、集体归罪。列宁反复强调，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问题，必须具体分析；反对大民族沙文主义，反对一切形式的民族仇恨，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本要求。沿着这个原则，我们当然必须坚决反对反犹太主义，因为犹太人作为一个民族群体，不应当因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或锡安主义国家的罪行而被集体归罪。把以色列国家的殖民政策归结为“犹太人的本性”，这本身就是种族主义。

但是，同样地，马克思主义也绝不可能接受另一种反动逻辑：把殖民国家等同于整个民族，把国家意识形态等同于全体人民，然后用“民族受害史”来压制对国家压迫行为的批判。这样做，实际上是把民族苦难变成殖民特权的挡箭牌，把反种族主义变成压制反殖民斗争的工具。

所以，为什么反锡安主义不是反犹太主义？因为它们在对象、立场和历史方向上都根本不同。

第一，对象不同。

反犹太主义针对的是犹太人这个民族或宗教共同体，把他们当作一个有罪的整体；

反锡安主义针对的是锡安主义这一政治意识形态，以及以色列国家的殖民—军事结构。

第二，立场不同。

反犹太主义站在民族仇恨和种族主义的立场上；

反锡安主义站在反殖民、反帝国主义和被压迫人民解放的立场上。

第三，历史方向不同。

反犹太主义服务于压迫与排斥，制造新的民族迫害；

反锡安主义则是要揭露并反对一个建立在压迫巴勒斯坦人民基础上的国家秩序。

这三点不分清，就什么都说不清。

还必须指出，故意把反锡安主义说成反犹主义，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政治功能：为以色列国家争取免于批判的特权。因为一旦这种偷换成立，任何对殖民压迫的揭露都可以被打成“仇恨言论”，任何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支持都可以被打成“极端主义”，任何要求去殖民化、平等权利和结束民族压迫的呼声，都可以被包装成“对犹太人生存的威胁”。这样一来，真正的问题——土地掠夺、定居点、军事占领、集体惩罚、种族化法律秩序——反而被遮蔽了。殖民者不再需要回答自己的制度为什么建立在原住民被驱逐和压迫之上，只要反过来控诉批评者“反犹”就行了。

这正是为什么耶路撒冷反犹主义宣言特别强调，它要澄清哪些关于以色列和锡安主义的批评并不构成反犹主义。因为如果连这一点都不澄清，那么反对反犹主义本身就会被扭曲成维护殖民统治的武器。

当然，这里也必须说清楚：并不是一切打着“反锡安主义”旗号的话都天然正确。如果有人借着批判以色列国家的名义，去散布“犹太人控制世界”“犹太人天生邪恶”“所有犹太人都该负责”之类的说法，那就已经越过了界限，滑向了真正的反犹主义。IHRA 的定义也明确提到，把全体犹太人集体地对以色列国家行为负责，是反犹主义。也就是说，真正的反锡安主义必须保持明确的政治和阶级立场：它批判的是国家、意识形态、殖民秩序和帝国主义结构，而不是把某个民族整体本质化为敌人。

从马列毛主义的角度看，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马列毛主义不是民族仇恨的理论，而是人民解放的理论。它要求我们区分压迫制度和普通人民，区分国家机器和民族共同体，区分统治阶级的政治项目和广大劳动群众的真实利益。就像我们反对美帝国主义，不等于仇恨美国人民；反对中修，不等于仇恨中国人民；反对锡安主义，同样不等于仇恨犹太人民。恰恰相反，真正的国际主义立场要求我们看到：锡安主义国家同样把普通犹太劳动者绑上了殖民国家战车，让他们在民族主义、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体系中被塑造成统治秩序的一部分。反对锡安主义，不是反对某个民族活着，而是反对一个民族被动员去压迫另一个民族的制度安排。

因此，我们必须坚持一个非常明确的原则：

反犹主义必须坚决反对，锡安主义也必须坚决反对；反对前者，是因为它是民族压迫和种族主义；反对后者，是因为它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民族排斥的国家意识形态。

把这两者混淆起来，不仅理论上错误，而且政治上反动。它既伤害真正反对反犹主义的斗争，也伤害巴勒斯坦人民的解放斗争。

归根到底，反锡安主义之所以不是反犹主义，是因为它追求的不是某个民族的毁灭，而是结束一个建立在民族特权和殖民压迫基础上的国家秩序；它争取的不是民族仇恨，而是去殖民化、平等和正义；它反对的不是犹太人作为人，而是锡安主义作为压迫性的政治形式。只有把这个界限坚定地划清，我们才能既坚持反对一切民族仇恨，也坚持站在巴勒斯坦人民一边，反对殖民统治和帝国主义秩序。

八、巴勒斯坦问题的真正出路：反殖民、反帝与人民解放

讲到这里，一个问题就必须正面回答：如果锡安主义是殖民主义、民族排斥和帝国主义秩序在巴勒斯坦的集中体现，那么巴勒斯坦问题的真正出路究竟在哪里？答案首先必须是否定性的：真正的出路绝不可能在锡安主义框架内部找到。因为锡安主义国家秩序的出发点，本身就是某一民族的特权地位、原住民的边缘化以及通过武力和法律维持这种不平等。一个建立在不平等基础上的国家，不可能通过微调不平等来实现真正正义；一个建立在殖民逻辑基础上的秩序，也不可能通过更文明、更温和、更体面的殖民管理，变成解放的道路。只要殖民结构本身仍然存在，那么所谓“和平”就只会是压迫者能够接受的和平，所谓“谈判”也只会是在强制失衡中的谈判。

因此，巴勒斯坦问题的第一层出路，就是必须重新把问题还原为反殖民问题，而不是让它继续被说成抽象的“冲突管理问题”。真正的问题不是双方如何各退一步，不是如何在现有殖民秩序下重新分配一点点空间，不是如何让被压迫者对压迫结构作更现实的适应；真正的问题是：原住民被剥夺的土地、权利、回归权和政治主体地位，必须被重新承认；殖民定居、军事占领、民族特权和制度化不平等，必须被彻底否定。联合国关于纳克巴的材料明确指出，1948年伴随着大规模流离失所与财产被剥夺，而联合国系统对巴勒斯坦问题的长期处理中，难民与回归、自决和占领始终是核心议题。也就是说，任何回避难民问题、回避占领问题、回避定居点问题、回避民族不平等问题的“方案”，都不是真正的出路，而只是让殖民现实换一种说法继续存在。

第二层出路，则在于必须坚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和自决权。这一点不是空泛的道德诉求，而是一个最起码的政治原则。联合国长期重申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联合国人权高专办也持续指出定居点扩张、兼并推进和强迫迁移正在损害这种权利。也就是说，巴勒斯坦问题不是“某些人需要更多人道援助”这么简单，而是一个民族是否能够真正掌握自身命运的问题。一个民族如果不能控制自己的土地、边界、资源和政治前途，那么无论国际社会给它多少“援助”，都无法替代真正的解放。

但同时，也必须把这一点说得更彻底：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不能被理解成在殖民秩序残余之上接受屈辱性安排，不能被压缩成在定居点、隔离墙、检查站和长期军事控制之下拥有某种残缺自治，更不能被简化成由帝国主义安排出来的一纸行政方案。真正的自决，意味着去殖民化，意味着结束民族压迫，意味着原住民不再在自己的土地上被当作次等存在。只要这一点没有实现，任何看似“现实”的方案，本质上都只是让被压迫民族接受一种更稳定的被压迫形式。

第三，巴勒斯坦问题的真正出路，绝不只是巴勒斯坦一地的技术问题，而是同整个中东的帝国主义秩序紧密相连的。前面已经讲过，以色列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长期依赖美国的军事、外交与战略支持，同时也同包括中修在内的重要经济伙伴保持深度联系。美国国务院和美国驻耶路撒冷使馆公开材料都显示，美国持续提供大规模军援；中国驻以色列使馆则公开表示中国是以色列的亚洲最大贸易伙伴、全球第二大贸易伙伴之一。换句话说，锡安主义秩序之所以能够长期维持，不只是因为自身强大，更因为它被整个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物质支持和外交庇护所包围。

所以，真正的出路必须同时是反帝国主义的出路。它不能只是要求殖民国家“收敛一点”，也不能只是呼吁列强“公平调停”；因为正是这些列强，尤其是美帝国主义，一直在为这种秩序提供血液和护盾。即便像中修这样口头上摆出支持巴勒斯坦姿态的修正主义政权，在现实中也仍然通过贸易和经济关系同以色列深度勾连。这样一来，巴勒斯坦解放就不可能单纯依赖外交辞令，而必须被放进整个反帝、反殖民斗争的框架里来理解。只要帝国主义在中东的支点还稳固，只要殖民国家还能从外部世界不断获得军火、资金、市场和合法性，巴勒斯坦人民的苦难就不可能真正终止。

从马列毛主义的立场看，这一点尤其关键。马列毛主义从来不把民族解放看成孤立的国际外交议题，而始终把它看成世界范围内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反对本国买办与反动统治的斗争组成部分。巴勒斯坦问题也必须这样看：它不是单独等待联合国“解决”的问题，不是靠若干大国斡旋就能恢复正义的问题，而是一个被压迫民族在帝国主义重压下争取解放的问题。因此，真正的出路，不是让巴勒斯坦人民接受殖民现实的“优化版”，而是让他们作为政治主体真正站起来，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反帝力量，打破殖民秩序、打破帝国主义庇护网、打破地区反革命同盟。

第四，真正的出路还必须明确：巴勒斯坦问题不能被简化为宗教问题，也不能被简化为民族仇恨问题。这不是“穆斯林和犹太人之间的古老冲突”，更不是某种无法调和的信仰战争。它的本质，是土地、国家、权利、占领、驱逐和殖民统治的问题。只要把它说成宗教冲突，就会天然遮蔽殖民者与原住民之间的现实关系，

就会把政治压迫伪装成文化差异，把军事统治伪装成历史宿怨。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反锡安主义而不是反犹太主义，始终坚持站在被压迫人民一边而不是站在抽象民族对立叙事一边。真正的解决，不是让民族仇恨继续循环，而是从制度上结束制造仇恨和压迫的根源。

第五，巴勒斯坦问题的出路还要求我们重新理解“和平”本身。真正的和平，从来不是压迫者安全、被压迫者沉默的和平；不是殖民国家继续存在、原住民接受现实的和平；不是集中营外面的人宣布“局势终于稳定”那种和平。真正的和平必须建立在正义基础上，建立在去殖民化基础上，建立在平等权利和被压迫民族真正获得政治尊严的基础上。否则，一切“和平进程”都只是在管理冲突，而不是解决冲突；一切“停火机制”都只是让压迫结构暂时降温，而不是让压迫消失。联合国和国际人权机制长期批评定居点、强迫迁移和系统性不平等，也正说明：如果这些结构性问题不被触动，所谓和平就不会有真正内容。

所以，归根到底，巴勒斯坦问题的真正出路，只能概括为三个彼此联系的方向：

第一，反殖民化——结束占领、定居点扩张、驱逐和民族特权秩序；

第二，反帝国主义——打破美帝及一切为殖民国家输血的国际支撑体系，也揭露中修式口头支持、现实交易的修正主义虚伪；

第三，人民解放——承认并实现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回归权和平等政治权利，使被压迫者真正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

从马列毛主义的角度说，这个结论其实并不复杂：一个建立在民族压迫和殖民特权上的国家秩序，不可能成为真正和平的基础；一个依赖帝国主义支持的地区支点，不可能成为人民解放的道路；一个把原住民变成被管理对象的政治结构，不可能自动演化出正义。巴勒斯坦的出路，只能来自反殖民斗争、反帝斗争和人民自己的解放实践，而不是来自殖民者的施舍，也不是来自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国家的外交表演。

也正因为如此，支持巴勒斯坦，绝不能停留在抽象同情上，更不能满足于一些无害的“人道关切”语言。真正的支持，必须是站在反殖民、反帝国主义和人民解放的立场上，公开指出：锡安主义秩序必须被否定，帝国主义支撑网络必须被打破，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必须被无条件承认。只有这样，巴勒斯坦问题才有真正的出路；只有这样，所谓和平才不再是压迫秩序的另一种名字，而会开始具有正义和解放的内容。

九、结论：为什么必须彻底批判锡安主义

综上所述，锡安主义绝不是什么可以被温和修补的“民族国家方案”，也不是什么中性的“安全哲学”或“历史补偿机制”。它从形成之初就是近代殖民主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秩序相结合的政治产物；在现实中，它又通过定居殖民、民族排斥、法律不平等和军事统治，把这种反动性具体化为一个持续运转的国家结构。联合国长期将巴勒斯坦问题与占领、难民、自决和非法定居点联系起来，而国际人权机构则持续指出以色列体制中的系统性支配、不平等和压迫。换句话说，问题早已不是某一届政府“做得过分了”，而是整个锡安主义国家逻辑本身建立在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剥夺之上。毛主义立场看，这一点尤其必须说清。因为马列毛主义从来不把民族问题理解为抽象的身份冲突，而始终把它放回阶级统治、殖民关系和帝国主义体系之中来分析。锡安主义之所以必须被彻底批判，不只是因为它造成了惨烈的人道灾难，更因为它代表了一种反人民、反解放、反革命的政治方向：它不是被压迫民族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而是依赖帝国主义、压迫另一个民族的殖民民族主义；它不是人民起来掌握命运的道路，而是军队、边界、定居者和资本共同维持的统治秩序；它不是为了消灭民族压迫，而是把民族特权和殖民掠夺制度化。这样的东西，和人民解放、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自决权，根本处于尖锐对立之中。

也正因为如此，真正支持巴勒斯坦，绝不能停留在抽象的同情或空泛的和平口号上。只要锡安主义秩序还存在，只要占领、定居点扩张、驱逐、封锁和民族不平等仍然被维持，那么所谓“和平”就不过是殖民者单方面的和平，所谓“安全”也不过是压迫者的安全。真正的和平，必须以去殖民化为前提；真正的安全，必须建立在平等和正义之上；真正的解决方案，必须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回归权和完整的政治主体地位。联合国材料持续强调非法定居点、流离失所和自决权问题，也恰恰说明：如果这些根本问题不被触动，一切“和平进程”都只是在管理压迫，而不是结束压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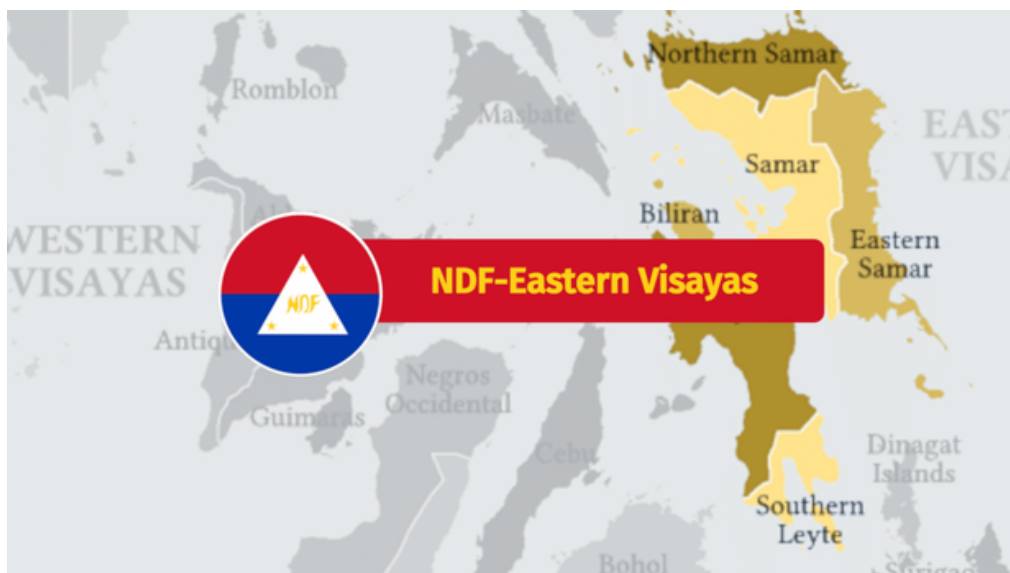
同时，还必须把问题放回今天的帝国主义现实中看清楚。以色列之所以能够如此长期、如此稳定地维持殖民统治，离不开帝国主义国家的全方位支持。美国仍是以色列最核心的军事和外交靠山，长期提供巨额安全援助与军售；而中修虽然口头上谈巴勒斯坦权利，现实中却同以色列维持深度经贸关系，是其重要经济伙伴和现实输血者之一。中国驻以色列使馆公开称中国是以色列“亚洲最大贸易伙伴、全球第二大贸易伙伴”；与此同时，中修在国内又长期压制独立集会、言论和群众政治表达，这意味着它所谓的“支持巴勒斯坦”并不允许人民群众转化为真正自主的反殖民实践。对马列毛主义者来说，这两种力量都必须被揭露：美帝是公开的战略支柱，中修则是伪装成“平衡者”的修正主义合作者。

因此，彻底批判锡安主义，不只是批判一个国家的某些政策，而是批判一种完整的反动体系：批判殖民定居逻辑，批判民族特权国家，批判帝国主义的地区支点，批判一切用“安全”“历史权利”“复杂性”来掩饰压迫的意识形态。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巴勒斯坦问题才不会被缩小成救济问题、停火问题、谈判问题，而会重新成为它本来的样子：被压迫民族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解放问题。

归根到底，巴勒斯坦的出路，不在锡安主义框架内，不在帝国主义调停中，也不在修正主义国家的外交辞令里。真正的出路，只能来自反殖民、反帝国主义和人民解放的斗争本身；只能来自被压迫人民作为历史主体重新站起来，打破民族压迫和殖民统治，争取真正平等、真正正义、真正属于自己的未来。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批判锡安主义才不是抽象道德谴责，而是站在被压迫民族一边、站在革命和解放一边的明确立场。

革命斗争必将推翻法西斯分子和掠夺者

菲律宾革命网络中心



2月25日，菲律宾人民将纪念人民力量革命40周年。1986年，人民推翻了叛国者、独裁者和令人憎恶的掠夺者费迪南德·马科斯。尽管这场革命未能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的根基，但这一历史事件警示世人，唯有革命斗争才能最终推翻法西斯、腐败和令人无法忍受的政权。

四十年前，数百万菲律宾人涌向乙沙大道，起因是马科斯在选举中普遍存在舞弊行为。不仅如此，这场革命也是人民长达14年生死搏斗和牺牲的成果。这场胜利归功于成千上万的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和普通民众，以及新人民军的战士们。他们以各种方式，包括武装和非武装手段，坚持不懈，勇敢地反抗法西斯独裁统治，甚至献出了生命。我们今天享有的自由，都归功于他们。

尽管马科斯家族当时被推翻，但腐败的统治体系依然存在。伪民主的傀儡政权占据上风，对马科斯王朝的罪行视而不见，直到小马科斯最终重返马拉卡南宫。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腐败、残暴和苦难仍然是马科斯家族的标志。小马科斯利用职权，驳回了针对其家族非法所得的指控。面对饱受苦难、饥寒交迫的民众，他们将奢靡的宴会、赤裸裸的裙带关系和任人唯亲以及政府官员的逍遥法外带回了宫廷。如同他的父亲一样，他建造了昂贵的基础设施来掩盖肆意盗窃公款的行为，并主导了前所未有的腐败，其规模甚至超过了独裁时期。当他在腐败中扮演的角色被揭露后，马科斯与所谓的“反腐败”政客（如阿克巴扬）勾结，将公众的注意力转移到2028年的反动选举上，而不是追究他的责任。在未正式宣布戒严令的情况下，法西斯军队和警察围困了那些人民正在与贫困和腐败体制抗争的社区。

在人民力量革命四十年后，菲律宾民众仍在遭受苦难。工资依然低下，农民失去土地，物价高企，没有免费教育和优质的社会服务，环境遭到掠夺，人民的权利受到侵犯。统治政权只是换了面孔，国家本身却毫无改变。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民反抗独裁统治的斗争失败了。相反，EDSA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人民无需等待选举，也无需将希望寄托在更换统治政权的头号傀儡上。人民必须掌握权力才能真正维护自身的利益——而不是美国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地主和官僚资本家的傀儡。他们必须团结起来，通过推进人民民主革命，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最终建立人民民主政府。青年也被号召加入新人民军，参与建设一个公正的新菲律宾社会。

来源: 菲律宾革命网络中心

<https://philippinerevolution.nu/statements/revolutionary-struggle-will-bring-down-fascists-and-plunderers/>

发布通缉令是打击有罪不罚现象的一项措施

菲律宾革命网络中心



最近，南塔加禄地区革命运动发布的通缉令，其中包含民众希望惩罚并绳之以法的个人的姓名和照片，这些通缉令是基于民众提起的合法诉讼而发布的。处理这些案件并发布上述通缉令，均符合人民民主政府作为红色政治势力存在地区公认的权威机构所实施的政策。人民民主政府及其职能符合国际人道主义法。鉴于国家反恐工作组（NTF-ELCAC）发表声明称，这是一种“间谍标记”和心理战手段，危及被标记人员的生命，全国民主阵线-黎刹分部对此予以澄清。埃内斯托·托雷斯二世歪曲事实，声称这些案件缺乏证据，而实际上他却在包庇这些危害普通公民生命、践踏人权的罪犯。

通缉令上的嫌疑人之一埃里克·西莫根（Eric Simogan）身负多项指控，罪名包括背叛革命运动、危害平民生命安全。他已向第80步兵营（80th IBPA）投降并自愿妥协，如今却成为该营和第二步兵营（2nd IDPA）的代言人。自2020年以来，他一直是国家反恐工作组（NTF-ELCAC）散布有关革命运动和黎刹省人民谎言的工具。他恶意地给那些为自身利益和福祉而合法斗争的人们贴上恐怖分子的标签。他曾多次阻挠进步团体的群众行动和示威游行。他的受害者包括农民、杜马加特人（Dumagats）和雷蒙塔多斯人（Remontados）、工人、城市贫民以及黎刹省的青年和学生。事实上，西莫根的所作所为至今仍在危害黎刹省民众的生命安全。这更加凸显了国家反恐工作组（NTF-ELCAC）厚颜无耻地试图颠倒黑白，将危害民众生命的革命运动描绘成罪魁祸首。正是由于这些罪行，人民民主政府才收到民众的投诉，并希望按照正当程序将他绳之以法。

发布通缉令证明了人民民主政府对民众提起的诉讼采取了行动，也表明政府绝不容忍有罪不罚和不问责的现象在社会上盛行。将像西莫甘这样的人的案件公之于众，是伸张正义的正确一步。再次重申，黎刹省民族民主阵线（NDF-Rizal）保证，人民民主政府的法律和程序均符合国际人道主义法。我们鼓励民众继续向人民民主政府提起诉讼，控告那些践踏人权、危害民众生命和生计的人。让我们携手迈向真正的正义，反对有罪不罚！

来源: 菲律宾革命网络中心

<https://philippinerevolution.nu/statements/the-issuance-of-wanted-posters-is-a-step-taken-against-impunity/>

雇佣劳动与资本（第三部分）

德国
K·马克思

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

生产者相互发生的这些社会关系，他们借以互相交换其活动和参与全部生产活动的条件，当然依照生产资料的性质而有所不同。随着新作战工具即射击火器的发明，军队的整个内部组织就必然改变了，各个人借以组成军队并能作为军队行动的那些关系就改变了，各个军队相互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

因此，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 and 改变的。生产关系总和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古典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其中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

资本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这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构成资本的生活资料、劳动工具和原料，难道不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不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内生产出来和积累起来的吗？难道这一切不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内被用来进行新生产的吗？并且，难道不正是这种一定的社会性质把那些用来进行新生产的产品变为资本的吗？

资本不仅包括生活资料、劳动工具和原料，不仅包括物质产品，并且还包括交换价值。资本所包括的一切产品都是商品。所以，资本不仅是若干物质产品的总和，并且也是若干商品、若干交换价值、若干社会量的总和。

不论我们是以棉花代替羊毛也好，是以米代替小麦也好，是以轮船代替铁路也好，只要棉花、米和轮船——资本的躯体——同原先体现资本的羊毛、小麦和铁路具有同样的交换价值即同样的价格，那么资本依然还是资本。资本的躯体可以经常改变，但不会使资本有丝毫改变。

但是，虽然任何资本都是一些商品即交换价值的总和，然而并不是任何一些商品即交换价值的总和都是资本。

任何一些交换价值的总和都是一个交换价值。任何单个交换价值都是一些交换价值的总和。

例如，值1000马克的一座房子是1000马克的交换价值。值一分尼的一张印纸是100/100分尼的交换价值的总和。能同别的产品交换的产品就是商品。这些产品由以交换的一定比例就是它们的交换价值，或者说用货币来表示，就是它们的价格。这些产品的数量多少丝毫不能改变它们成为商品，或者表现交换价值，或者具有一定价格的规定。一株树不论其大小如何，终究是一株树。无论我们拿铁同别的产品交换时是以罗特②为单位还是以公担为单位，这一点难道会改变铁成为商品，成为交换价值的性质吗？铁是一种商品，它依其数量多少而具有大小不同的价值，高低不同的价格。

一些商品即一些交换价值的总和究竟是怎样成为资本的呢？

它成为资本，是由于它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即作为一种属于社会一部分的力量，通过交换直接的、活的劳动力③而保存并增大自身。除劳动能力以外一无所有的阶级的存在是资本的必要前提。

只是由于积累起来的、过去的、对象化的劳动支配直接的、活的劳动，积累起来的劳动才变为资本。

资本的实质并不在于积累起来的劳动是替活劳动充当进行新生产的手段。它的实质在于活劳动是替积累起来的劳动充当保存并增加其交换价值的手段。

资本家和雇佣工人是怎样进行交换的呢？

工人拿自己的劳动力换到生活资料，而资本家拿他的生活资料换到劳动，即工人的生产活动，亦即创造力量。工人通过这种创造力量不仅能补偿工人所消费的东西，并且还使积累起来的劳动具有比以前更大的价值。工人从资本家那里得到一部分现有的生活资料。这些生活资料对工人有什么用处呢？用于直接消费。可是，如果我不利用靠这些生活资料维持我的生活的这段时间来生产新的生活资料，即在消费的同时用我的劳动创造新价值来补偿那些因消费而消失了的，那么，只要我消费生活资料，这些生活资料对我来说就会永远消失。但是，工人为了交换已经得到的生活资料，正是把这种贵重的再生产力量让给了资本。因此，工人自己失去了这种力量。

资本越增长，雇佣劳动量就越增长，雇佣工人人数就越增加，一句话，受资本支配的人数就越增多。我们且假定有这样一种最有利的情形：随着生产资本的增加，对劳动的需求也增加了。因而劳动价格即工资也提高了。

一座房子不管怎样小，在周围的房屋都是这样小的时候，它是能满足社会对住房的一切要求的。但是，一旦在这座小房子近旁耸立起一座宫殿，这座小房子就缩成茅舍模样了。这时，狭小的房子证明它的居住者不能讲究或者只能有很低的要求；并且，不管小房子的规模怎样随着文明的进步而扩大起来，只要近旁的宫殿以同样的或更大的程度扩大起来，那座较小房子的居住者就会在那四壁之内越发觉得不舒适，越发不满意，越发感到受压抑。

工资的任何显著的增加是以生产资本的迅速增加为前提的。

生产资本的迅速增加，会引起财富、奢侈、社会需要和社会享受等同样迅速的增长。所以，工人可以得到的享受纵然增长了，但是，与资本家的那些为工人所得不到的大为增加的享受相比，与一般社会发展水平相比，工人所得到的社会满足的程度反而降低了。我们的需要和享受是由社会产生的；因此，我们在衡量需要和享受时是以社会为尺度，而不是以满足它们的物品为尺度的。因为我们的需要和享受具有社会性质，所以它们是相对的。

工资一般不仅是由我能够用它交换到的商品数量来决定的。

工资包含着各种关系。

首先，工人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取得一定数量的货币。工资是不是单由这个货币价格来决定的呢？

在16世纪，由于在美洲发现了更丰富和更易于开采的矿藏^②，欧洲流通的黄金和白银的数量增加了。因此，黄金和白银的价值和其他各种商品比较起来就降低了。但是，工人们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所得到的银币数仍和从前一样。他们的劳动的货币价格仍然如旧，然而他们的工资毕竟是降低了，因为他们拿同样数量的银币所交换到的别种商品比以前少了。这是促进16世纪资本增长和资产阶级兴盛的原因之一。

我们再举一个别的例子。1847年冬，由于歉收，最必需的生活资料（面包、肉类、黄油、干酪等等）大大涨价了。假定工人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所得的货币量仍和以前一样。难道他们的工资没有降低吗？当然是降低了。他们拿同样多的货币所能换到的面包、肉类等等东西比从前少了。他们的工资降低并不是因为白银的价值减低了，而是因为生活资料的价值增高了。

我们最后再假定，劳动的货币价格仍然未变，可是一切农产品和工业品由于使用新机器、

年成好等等原因而降低了价格。这时，工人拿同样多的货币可以买到更多的各种商品。所以，他们的工资正因为工资的货币价值仍然未变而提高了。

总之，劳动的货币价格即名义工资，是和实际工资即用工资实际交换所得的商品量并不一致的。因此，我们谈到工资的增加或降低时，不应当仅仅注意到劳动的货币价格，仅仅注意到名义工资。

但是，无论名义工资，即工人把自己卖给资本家所得到的货币量，还是实际工资，即工人用这些货币所能买到的商品量，都不能把工资所包含的各种关系完全表示出来。

此外，工资首先是由它和资本家的赢利即利润的关系来决定的。这就是比较工资、相对工资。

实际工资所表示的是同其他商品的价格相比的劳动价格，反之，相对工资所表示的则是同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价格相比的直接劳动价格，是雇佣劳动和资本的相对价值，是资本家和工人的相互价值。

实际工资可能仍然未变，甚至可能增加了，可是尽管如此，相对工资却可能降低了。假定说，一切生活资料跌价三分之二，而日工资只降低了三分之一，比方由3马克降低到2马克。这时，虽然工人拿这2马克可以买到比从前拿3马克买到的更多的商品，但是他的工资和资本家的利润相比却降低了。资本家（比如，一个工厂主）的利润增加了1马克，换句话说，资本家拿比以前少的交换价值付给工人，而工人却必须生产出比以前多的交换价值。资本的份额与劳动的份额相比提高了。社会财富在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配更不公平了。资本家用同样多的资本支配着更大的劳动量。资本家阶级支配工人阶级的权力增加了，工人的社会地位更低了，比起资本家的地位来又降低了一级。

究竟什么是决定工资和利润在其相互关系上的降低和增加的一般规律呢？

工资和利润是互成反比的。资本的份额即利润越增加，则劳动的份额^②即日工资就越降低；反之亦然。利润增加多少，工资就降低多少；而利润降低多少，则工资就增加多少。

也许有人会驳斥说：资本家赢利可能是由于他拿自己的产品同其他资本家进行了有利的交换，可能是由于开辟了新的市场或者原有市场上的需要骤然增加等等，从而对他的商品的需求量有所增加；所以，一个资本家所得利润的增加可能是由于损害了其他资本家的利益，而与工资即劳动力的交换价值的涨落无关；或者，资本家所得利润的增加也可能是由于改进了劳动工具，采用了利用自然力的新方法等等。

导师语录

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它像空气一样包围着我们，并很厉害地渗进了无产阶级队伍。无产阶级则失掉了阶级特性，也就是说，它失去了本阶级的生活常态。

列宁-新的时代和新形式的旧错误

正是如此。并且正因为如此，要“每一个罢工者”都能自称为党员是不正确的，因为假使“每次罢工”都不只是强大的阶级本能和必然引向社会革命的阶级斗争的自发表现，而是这个过程的自觉表现，那么……那么，总罢工就不会是无政府主义的空话，那么我们的党就会立刻一下子包括整个工人阶级，因而也就会一下子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消灭掉。为了真正成为自觉的表现者，党应当善于造成一种能保证有相当的觉悟水平并不断提高这个水平的组织关系。

列宁-进一步，退两步

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

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大工业把大批互不相识的人们聚集在一个地方。竞争使他们的利益分裂。但是维护工资这一对付老板的共同利益，使他们在一个共同的思想（反抗、组织同盟）下联合起来。因此，同盟总是具有双重目的：消灭工人之间的竞争，以便同心协力地同资本家竞争。反抗的最初目的只是为了维护工资，后来，随着资本家为了压制工人而逐渐联合起来，原来孤立的同盟就组成集团，而且在经常联合的资本面前，对于工人来说，维护自己的联盟，就比维护工资更为重要。下面这个事实就确切地说明了这一点：使英国经济学家异常吃惊的是，工人们献出相当大一部分工资支持经济学家认为只是为了工资而建立的联盟。在这一斗争（真正的内战）中，未来战斗的一切必要的要素在聚集和发展着。一旦达到这一点，同盟就具有政治性质。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

